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7卷 第2期 | (总第24期) | 2023年6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7卷 第2期 | (总第24期) | 2023年6月 |

主 编：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 行 主 编：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众议 湖南师范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聂珍钊 浙江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Editorial Board

Zhongyi Ch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 管：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QR9393
编 辑：《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1536/H 国内发行：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jflc@hunnu.edu.cn 印 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42-380
地 址：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2023 年 6 月 28 日 整体设计：周基东
电 话：0731-88873041 定 价：28.00 元 排版制作：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CNKI）收录，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CN43-1536/H*2023*q*16*160*zh*P*¥28.00*1500*14*2023-06

目次

赵一凡《中国与美国》专栏

- 001 美国魔力，聚散之际 赵一凡

当代新西兰文学专栏

- 013 安娜玛丽·雅戈斯《缓流》中的性别政治与后殖民书写 谭敏
023 布干维尔内战在异域的文学映射——新西兰小说《皮普先生》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刘略昌 吴乐

文学文化研究

- 034 不可言说的情爱——论《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道德焦虑 郭艳雯
044 “奈保尔谬误”的再审视——以《河湾》中的后殖民书写为例 华雨晨
054 从“非黑即白”到世界主义——杰西·福赛特《葡萄干面包》的界限研究 王丁莹
065 论吴宓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 刘争气

翻译研究

- 076 新知·国故·教科·译名——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实践及优良举措考察 朱含汐 冯全功
088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建构 皮伟男 赖春梅 蓝红军

课程思政研究

- 099 ESP课程思政实践路径探索——以“商务英语阅读”为例 周虹 鲁巧巧

语言学研究

- 110 基于语料库概率模型的与格交替多因素分析——以send为例 袁咏雪 李健雪
122 中国英语专业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that从句的引述特征研究 刘应亮 杜凤双 裴宇雨
135 基于COCA语料库的动词keep的扩展意义单位研究 骆雅莹 陈婵
146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语义认知研究 李华丽

Contents

- 001 **Zhao Yifan** American Magic: From Brilliance to Darkness
- 013 **Min Tan** Gender Politics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 in Annamaria Jagose's *Slow Water*
- 023 **Lvechang Liu, Le Wu** The Oversea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Bougainville Civil War: On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New Zealand Novel *Mister Pip*
- 034 **Yanwen Guo** Ineffable Desire: On Ethical Anxiety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 044 **Yuchen Hua** A Review of "the Naipaul Fallacy": Post-colonial Writing in *A Bend in the River*
- 054 **Dingying Wang** From "Black/White" to Cosmopolitanism: A Study of Limits in Jessie Fauset's *Plum Bun*
- 065 **Zhengqi Liu** On Wu Mi's Acceptance of Irving Babbitt's Literary Thought
- 076 **Hanxi Zhu, Quangong Feng** Western Knowledge, Chinese Classics, Textbooks, and Terminology: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and Good Practices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088 **Weinan Pi, Chunmei Lai, Hongjun Lan**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Concept and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ion
- 099 **Hong Zhou, Qiaoqiao Lu**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ESP: Taking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as a Sample
- 110 **Yongxue Yuan, Jianxue Li** A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of Dative Alternation Based on Corpus-based Probabilistic Models: An Example of "Send"
- 122 **Yingliang Liu, Fengshuang Du, Yuyu Pei** A Study of Reporting Features of Evaluative-*that* Clauses in MA Thesis Abstract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 135 **Yaying Luo, Chan Chen**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 of the Verb "Keep" in COCA
- 146 **Huali Li** A Cognitive Study of Calligraphic Concepts "Fei" (fat) and "Shou" (thin) a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FLC

赵一凡《中国与美国》专栏

美国魔力，聚散之际

◎ 赵一凡

内容提要: 2008年，挪威作家约翰·加尔通出版了《美帝国的崩溃》。该书宣称美国与罗马帝国一样，自有一股神奇“魔力”。但是，正如罗马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美帝国的“魔力”消失，它就注定会崩溃。加尔通教授关于“魔力”的预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马克思、韦伯、本雅明等早期学者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让我们听听他们美国帝国为什么以及如何从辉煌走向黑暗，这是一个真正的明显命运。

关键词: 魔力 幻象 祛魅 光晕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01-012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1

Title: American Magic: From Brilliance to Darkness

Abstract: Johan Galtung, a Norwegian writer published in 2008 a book entitled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This book declares the USA enjoys its “magic” Power, just as the Roman Empire did before. But the US Empire is bound to collapse, so long as its “magic” Power is gone, as the Roman history tells us. Professor Galtung’s prediction about “magic” Power is not something new. Earlier scholars like Karl Marx, Max Weber and Walter Benjamin, have talked over this topic one after another. Let’s listen to them why and how the US Empire went from Brilliance to Darkness, as its true manifest destiny.

Keywords: magic, illusion, Entzauberung der Welt, aura

Author: Zhao Yifa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导读：中国的现代化故事

读书向导：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

作者按：2009年，挪威政治学教授加尔通（Johan Galtung），发表《美帝国的崩溃》。他说美国与罗马帝国一样，自有一股神奇“魔力”（magic）。其共同特征，是确信自己道德优越，武功盖世，故而要向外扩张，主宰人类发展。然而历史证明：一旦魔力消散，帝国随之灭亡。^[1]

加尔通所说的魔力，与马克思的“幻象”（illusion）、韦伯（Max Weber）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晕”（aura）一脉相承。若以“魔力”为纽带，我们便不难窥见美帝国的兴衰逻辑。

1788年，德国诗人席勒写下《希腊的众神》，称神迹消退，人类迷茫，美丽世界从此变得粗鲁无情。^[2]席勒启发了韦伯。1904年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称现代社会带来科学昌明，宗教式微，我们目睹“世界的祛魅”。^[3]

韦伯生命的转折点

1883年马克思在伦敦去世，韦伯正在德国服兵役。1884年小韦考入柏林大学。赵按：马克思与韦伯都是犹太人，同为柏大博士。1841年卡尔拿到博士学位，很想留在柏大教书。不料反动势力猖獗，进步讲师多遭驱逐，卡尔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韦伯的家庭悲剧 韦伯儿时，目睹德意志帝国崛起。韦伯读博，正值俾斯麦对外出兵镇压巴黎公社，对内封杀社会党人。有专家称，“韦伯的生活就是一部弗洛伊德情节剧”。此话怎讲？原来韦伯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典型的普鲁士政客。他专横跋扈，贪图享乐。母亲却是虔诚新教徒。她勤俭持家，好善乐施。

1897年夏，母亲跑去海德堡大学看儿子，父亲尾追而来。小韦护着母亲，将父亲赶出家门。其后老爸猝死，小韦继承大笔遗产。此事让他患上失眠症，继而面部抽搐，无法上课。^[4]

马克思留下一道难题：资本主义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韦伯与桑巴特，都想回应马克思。1902年老桑发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称它来自个人贪欲。老桑让韦伯写书评，韦伯拖着不写。直到1904年春，他才写下《新教伦理》第一部分。^[5]

韦伯访问新大陆 1904年秋，韦伯访美3个月。据其夫人回忆，他们先后游历了纽约、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以及新奥尔良。

纽约：灯火辉煌的海湾，自由女神像。纽约庞大而壮观，粗鄙又野蛮。摩天大楼簇拥着城堡一般的曼哈顿，那里聚集了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其中的金钱和资本统治着无数臣民。

芝加哥：丑陋的移民城市，可怕的大杂烩。欧洲穷人在此疯狂竞争，迸发出巨大活力。凶杀、纵火、抢劫，吓着了夫人。韦伯却在肉联厂目睹无数头生猪，通过屠宰线，变成肉罐头。

圣路易斯：韦伯来到圣路易斯，观摩世界博览会，赴西北大学讲演，又住进德国移民的豪宅，体验中西部的富饶。不料某日在报社，编辑与人拔枪相对。这让韦伯大惊失色，迅速逃离。

韦伯回到德国，发表《新教伦理》第二部分。围绕他的美国之旅，英美专家啧啧称奇。譬如科林斯称：《新教伦理》是韦伯生命的转折点。为此他酝酿了整整七年。当他转向美国时，这个命题便呼之欲出了。他治愈了神经疾病，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6]

韦伯：资本主义起源

在韦伯眼里，美国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新教伦理则在暗中支配美国的成功。^[7]众所周知，梵蒂冈垄断《圣经》解释权，教皇与主教骄奢淫逸，欺压信众。马丁·路德钻研《圣经》，忽有顿悟，于是鼓吹“自主信教，因信得救”。

从新教，到清教 新教教义引爆尼德兰革命。英国教会也脱离梵蒂冈，自称新教（Protestantism），却有清教徒（Puritans）要求清除腐败。他们惨遭镇压，一部分流亡北美。

赵按：上述宗教改革，展示了一条罗马天主教的裂变轨迹。而韦伯所谓“祛魅”，即不断破除迷信、消解魔力，直至在北美殖民地，萌生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资本主义精神。

清教徒的荒野使命 第五章第二讲，曾讨论米勒与摩根。他们的清教思想研究，佐证了韦伯的见解。譬如米勒承认，清教徒在荒野中形成了严密组织、虔诚信仰。韦伯也说，殖民地地铁一般的集体主义，说明加尔文教对民众实施一种无法忍受的掌控。^[8]

由于殖民地人口倍增，老人们被迫实行“半契约制”，即允许青年入教，但不得领受圣餐。大批年轻人要求分家产、去西部。长老又发明哀诉布道，即谴责腐败、集中忏悔。这又让韦伯确认：清教领袖拥有掌控经济生活的强大能力。^[9]

1684年，英国在北美设立总督府，清教领袖下野。年轻牧师爱德华兹，发起宗教复兴，清教徒转而鼓吹“发财为公”。波士顿富商霍尔，因向教堂捐献财产，竟被封为圣徒。米勒嘲笑道：霍尔以钱财买得拯救，清教徒深知他们在背弃祖先。

富兰克林的世俗箴言 1732—1758年，富兰克林以“穷理查”为名，接连发表27本年历。这套历书自带日历、气象、菜谱，还有励志格言，譬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韦伯说：当务之急是要寻找理性主义的独特性。而富兰克林，为他提供了完美范本。^[10]

天职，苦行与获救 宗教复兴后，清教徒陷入普遍焦虑：即我将如何获救？答案是恪

守天职，勤奋劳作。韦伯分析说，宗教改革将神父的天职（calling），变作芸芸众生的责任。加尔文提倡禁欲苦行，又将一股道德动力，注入清教徒的日常生活。至1900年，资本主义有了机器和工人，就不再需要宗教动力了。^[11]

赵按：美国人祛除了宗教魅力，开始迷恋资本的魔力。

美国资本主义精神

桑巴特认定，资本主义来自贪欲。韦伯却说它源于一种针对工商业的理性化操作。他相信人类渴求财富，自古有之，从巴比伦到古埃及，再到欧洲。这种贪欲导致非理性，例如罗马帝国穷兵黩武，西班牙海盗挥霍无度，路易十四极尽奢华。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才将工业机器、雇佣劳动，升级为一整套“理性组织”。^[12]

清教徒的工作伦理 加尔文鼓吹选民获救。韦伯说这给清教徒带来“一种空前的内心孤独感”。^[13]于是他们自称选民，然后多多行善，又将禁欲苦行视为天职及其获救的途径。韦伯下结论：清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营者提供了道德活力与动力”。^[14]

韦伯承认，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但儒教提倡万物和谐，故而无法产生西方人的精神动力。现代资本主义却对贪欲“加以约束”：进而将传统商人导入一种条理化轨道。^[15]

美国 vs 欧洲 马克思从未去过美国，韦伯却有幸目睹其工业化成就。20世纪初，美国生产力成功登顶。它在钢铁、铁路、石油化工、电话电报诸领域形成了一批工业巨头，从中产生了证券交易、股市融资、托拉斯垄断、泰勒制管理。韦伯感慨：欧洲人因循守旧，美国的穷理查，却在残酷环境中白手起家。他们出身微贱，敢于反抗贵族秩序。他们集腋成裘，成了资本主义暴发户。^[16]

有专家称，韦伯一生都在同《资本论》（*Das Kapital*）对话。晚年的他，陆续写下几千页手稿，题名《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1920年韦伯去世，夫人整理其手稿，出版时改称《经济与社会》。其中包括两大核心概念：理性主义、现代官僚机构。

何谓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 即不单单以奢侈消费为目标，而是采取系统规划、纪律约束，并以科技为动力，将赢利手段与官僚体制结合为一。其中包含两大要素：1. 有纪律的劳动力；2. 有规则的资本投入。韦伯指出传统商人只想赚钱，过上好日子。美国资本家则相信规模制胜、技术领先，故而持续投资、做大做强。^[17]

何谓现代官僚机构 韦伯将权力分为三类。首先是帝王与酋长的传统权力，他们讲血统，重世袭。其次是超凡权力，即少数极富个人魅力（Charisma）的宗教领袖。上述两种权力，属于非理性权力。最后，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权力应该是理性权力，其特征为：

1. 一切权力都要合法，并受法律制约。韦伯指出，罗马法典作为基础，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复式簿记、成本核算、工资制度。

2. 打破世袭与裙带关系，设置现代机构（institution）或一种基于理性的官僚系统，以便兼顾经济与社会。

3. 新官僚制强调专业能力，注重职业素养（professionalism），目的是优胜劣汰，大幅提高效率。

4. 现代机构囊括学校、军队、公司与法庭。它们都要由上到下，设置科层化的等级、职位、权限与薪酬。

19世纪欧洲贵族当道，任人唯亲。美国内战后，北方企业家压倒南方贵族。他们蔑视血统与头衔，看重才干和业绩。韦伯深知德国人的迂腐，所以大声疾呼：美国已为人类展示一种高效管理体系。而合法合理的权力，正是提升效率的不二法门。^[18]

美国成功，理性变异 美式资本主义优势明显，韦伯却一再悲叹：世界已被祛魅，那些高贵的终极价值，也会销声匿迹。”1914年大战爆发，韦伯又称工具理性暗藏一套唯利是图的商业程序，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规律。其制度化特征，即专家分工、严密核算、非人化管理。韦伯警告：那将是一座囚禁精神的铁笼。^[19]谁也没料到，韦伯死前的各种吐槽，几乎都在美国应验了。

本雅明：光晕与附魔

韦伯死后，美国博士生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来到海德堡大学。他征得韦伯遗孀的同意，开始翻译《新教伦理》。小帕1927年回哈佛，1930年出版《新教伦理》英译本，由此暴得大名，成为美国现代化理论大师。小帕强调韦伯看重美国，尤其赞赏美国资本主义的合理合法。赵按：误读严重啊。

韦伯在德国，一直处境尴尬。1908年他邀集胡塞尔（Edmund Husserl）、西美尔（Georg Simmel），创立《逻各斯》学刊，培养社会学人才。众多弟子中，韦伯最赏识卢卡奇。不料“一战”爆发，小卢加入德共。韦伯敦促小卢申请海大教职，惨遭校方拒绝。小卢愤而投身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小卢被捕。韦伯出面斡旋，免其一死。小卢逃去苏联，苦读马列，成为西马理论大家。他在《理性的毁灭》（*Destruction of Rationality*）中，痛批理性主义，并指责韦伯掩饰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精神异化。^[20]赵按：卢卡奇象征那一代犹太精英的宿命。布洛赫、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紧随其后，集体哗变，加入左翼。

犹太神童本雅明 1920年韦伯去世，又有一个犹太神童本雅明，申请海大教职失败。小本跑去巴黎卖文为生，继而钻研马克思手稿，写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此文称古典艺术来自神话，故而带有“光晕”。现代机器大批复制赝品，摧毁了神秘“光晕”。1924年，小本阅读阿拉贡（Louis

Aragon)的《巴黎乡下人》，赫然发现，巴黎歌剧院的拱廊街，也有神奇“光晕”！

马克思说过，劳动变商品，形成现代拜物教，其中“充满神学的怪诞，体现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他又说，资产阶级建立一套上层建筑，它“由各种幻象、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所构成”。但“这种遮蔽阶级斗争与时代本质的幻象”，并非一无破绽。^[21]

如何打破资本幻象 法国作家布勒东(André Breton)，也在现代派小说中描绘资本主义的读神本质：阴暗酒吧、熙攘人群、闪烁信号灯、疯狂旋转门。这一派五光十色，魔力四射，反复提示小本：它们在扫荡传统光晕之际，也在制造资本幻象！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催生了现代政党。而政党的孕育，又同巴黎游民有关：其中有趁乱夺权的波拿巴，也有策划工人起义的布朗基。马恩说“正是他们筑起第一批街垒，并进行指挥”。小本捧读至此，血脉贲张。然而在他眼前，没有工人暴动，只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这个巴黎纨绔子弟，大张旗鼓地描写妓女、酒鬼、革命党。小本总结：笼罩巴黎的商品光晕，成全了老波的讽喻想象。^[22]

从祛魅，到附魅 小本抨击韦伯，指其偏爱理性的冷峻务实，忽略其阴险、油滑与狡诈。小本力挺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打着理性的幌子，炮制诱人幻象，目的是为资本重新附魅(reenchantment)。在他看来，西方上层建筑已落入商品的掌控。其整体文化价值表现为一种怪诞幻象(phantasmagoria)。赵按：1940年本雅明自杀。后人整理“拱廊街计划”，发现他利用辩证法，揭示西方社会矛盾：一面是醉生梦死的浮华之都，一面是地火穿行的革命中心。^[23]

从拱廊街，到费尔蒙 如前述，小本目睹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巴黎拱廊街。街上声色犬马、极尽奢华。可叹小本死得早，未及欣赏旧金山的费尔蒙(Fairmont)大饭店。1967年，黑利(Arthur Hailey)《大饭店》(*Hotel*)被搬上银幕。费尔蒙作为取景地，为亿万观众提供一个梦幻世界。

1995年9月27日，费尔蒙迎来一场高层研讨会，资助方是华尔街，主办方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议邀请了500名全球精英，其中有老布什、布莱尔、撒切尔夫人，以及索罗斯、比尔·盖茨。

赵按：费尔蒙雄踞美国西海岸，俯视欧亚大陆。各国代表登上观光电梯，徐徐升至楼顶套房。宽大玻璃窗外，一面是蓝色海湾、金门大桥、美军航母，另一面是硅谷、伯克利、斯坦福。

全球化的陷阱 研讨三天，都说了什么？外界一片茫然。1996年，德国《明镜周刊》的两位记者，发表《全球化的陷阱》。其中披露的会议内容，远超韦伯、帕森斯的各种预期！

1.全球化刮起一场飓风。首先是高科技挤压实体，制造业大量外迁。岗位流失，工资冻结，加剧了失业与犯罪。其次是激烈的跨国竞争，加速资本流动，刺激风险投资。IT产业全线飘红之际，政府债台高筑，社会福利锐减，中产阶层朝不保夕。

2.到会代表一致同意：全球化与民主双双掉入陷阱。而当下的最大难题，是人口过剩、贫富对立。占比20%的全球精英，足以生产全人类所需的商品。其余八成人，贫困、愚昧，

毫无用处。如何处理社会“垃圾”？代表们提议如下。

方案一是以高技术手段消灭“垃圾”。赵按：这不是开玩笑。方案二是布热津斯基发明的奶头乐（tittytainment）。其中titty是塑胶奶嘴，entertainment是消遣，诸如大麻、赌场、好莱坞大片、迪士尼乐园等，以便让民众沉浸其中，安于现状。^[24]

赵按：拱廊街与费尔蒙，作为象征性地标，双双提示我们：资本主义从它的自身附魅，到势不可当的全球扩张，再到魔力消散，迅速祛魅，只用了短短55年。其间发生了什么？

米尔斯：美国权力精英

1821年黑格尔发表《法哲学》，青年马克思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三大错误：1. 漠视经济，迷恋精神；2. 市民社会催生了国家，但老黑吹嘘理念与法治，打压市民社会；3. 资产阶级国家并非以人为本，而是“完成了的异化”。^[25]

马克思的丰功伟绩 韦伯尾随黑格尔，迷恋理性，肯定西方国家的合理合法。相反，马克思从商品入手，破解资本秘密。具体说，商品作为细胞，包含经济与社会的一切内因。由于资产阶级将雇佣劳动偷换成了特殊商品，《资本论》第1卷，即遵照商品—劳动—资本—剩余价值的逻辑顺序，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

《资本论》第2卷，改为以资本为中心，区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化资本，进而针对其内部循环，厘清资本主义生产、交换与流通关系。提醒大家：此乃一个封闭循环圈，即从商品、货币、商品交换，再到资本形成、原始积累、持续再生产。

第3卷没写完，可它锁定剩余价值的形态变化，即从利息、地租、企业利润，演变为债券、抵押品、控股权。恩格斯明白，最大困难在于物与物的交换背后，隐藏一种二重性，即商品生产的所有权，如何膨胀为资本主义鲸吞天下的历史趋势？^[26]

马克思的英明洞见，迄今散发真理的光辉。比方说，桑巴特受其影响，强调资本主义来自贪婪牟利。皮凯蒂发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公然将矛头指向欧美国家的非理性、非人道。

韦伯身后评价 1990年，华盛顿德国研究所举办研讨会，评估韦伯遗产。专家们承认，韦伯的命题已经过时。他从观念类型入手，论证清教徒的禁欲苦行，也导致不少争议。^[27]赵按：尽管欧美分歧严重，韦伯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诸多预见依然延续下来，成为西马、新马的理论爆观点。其中包含影响深远的4个问题，即精英统治、理性变异、科技强权、世界体系。依次评点如下。

美国官僚机构 我们已知，韦伯围绕美国工业化组织，作出精细的机构分析。1959年，纽约哥大社会学教授米尔斯（Charles W. Mills）出版《权力精英》。新左派学生提问：美国是民主社会，人人享有自由，岂可由权贵操纵？米老师称关键不在于个人或社会，而在于阻

断二者联系的新式官僚机构。如今在美国，一座由政府、企业、军队构成的金字塔，已成为国家权力中枢。而少数上层精英，得以在民主自由大旗下，主宰国家、支配全球。

美国精英来自何方？早期美国治理，仰仗殖民地乡绅。内战后，工商寡头挤入上层社会，其财富、教育与人脉关系，合成权力精英的渊藪。“二战”前罗斯福推动军改，将美军打造成高效战争机器。“二战”后，美国扮演世界领袖，又形成政、军、经三足鼎立的权力中枢。这个新帝国规模庞大，支配近四成的国家财富。

何谓权力精英 第二次工业革命，优化美国的企业管理，促进其金融创新、科技进步。韦伯对此高度关切，并在《经济与社会》中缜密考察官僚机构、经济系统。“二战”后，欧美学界发展出一门机构研究（institutional study），又称制度研究。

作为制度研究的急先锋，米尔斯锁定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即政府、军队、银行的决策人。他们的权势与财富，取决于各自在机构中的位置和能力。由于利害攸关，精英团结协作。又因决策程序交错，他们建立协商机制，以期消除摩擦，强化统治。米尔斯确认，精英统治令国家高度集权，日趋帝国化。而三大机构效益高超，组织严密，既能支配毁灭性武力，亦可控制舆论、钳制异议。

理性战士，疯子专家 2008年美国出版《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指1947年美军审讯日本731部队专家，并以25万美元交换日本细菌战的全套数据，继而在德特里克堡组建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此事引起米尔斯的关注。他着手调查帝国化、极权化倾向，痛斥美国精英的道德沦丧。米老师的结论，即部分美国学者已从“理性战士”（sodiers of reason），变成性格扭曲的“疯子专家”。^[28]

赵按：韦伯怎么说？他在《新教伦理》结尾处，引用歌德名言，称“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29]

马尔库塞：美国科技强权

1962年米尔斯猝死，西马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随之发表《单向度的人》，震撼美国高校。小马遭解聘，新左派学生攻占校园。此书为何震撼？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凭借先进技术，能显著提升生产力，造成某种“生存缓和”。小马据此宣布：美国普及了专家管理，淘汰了血汗工场，又将残暴的工资奴役，转化为体面的白领生涯。一旦美国能以技术而非恐怖征服社会，技术理性也就膨胀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理性蜕变，单面思维 战后美国学界，吹捧科技万能。小马却说启蒙理性丧失了批判功能，蜕变为单面思维。美国人成为巨婴般的单向度人：他们思想肤浅，拒不反思。其生产力越先进，破坏力就越大。而美国的繁荣昌盛，需要持续不断的战争来维持。^[30]

赵按：1979年，马尔库塞突发中风去世。新左派翻检遗物，发现他频繁征引韦伯，称理

性分裂为价值与技术。其中的技术理性精打细算，效率惊人，足以让人利令智昏、否定传统价值。

美国科技强权 韦伯赞赏美国科技，但美国人笃信实用主义。“二战”中美国大批接纳欧洲难民。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等，争相投入曼哈顿工程。1945年原子弹炸响，曼哈顿大总管布什（Vannevar Bush）发表《科学，无尽的前沿》。此书描绘科学蓝图，明确科技政策，其要点：1. 科技进步乃强国之本；2. 政府务必重视科技；3. 要确保基础科学的自由探索。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惊恐万状，国防部奉命组建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8年又成立国家宇航局（NASA）。军工体制一经确立，便开始周密部署，广开财源，罗致英才。艾森豪威尔时期，军工复合体急速膨胀。然而依照布什设定的科技重点，第一是信息技术，第二为生物技术。^[31]

美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早。它在电脑、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方面，全面领先苏联。冷战结束，老布什发布“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克林顿上台，硅谷爆发IT革命，虹吸大量资本。互联网泡沫破灭，资本反向回流。至2006年，美国十大科技突破中，生物科技独占七席。^[32]赵按：作为既定国策，生物科技涉及生命科学、医药健康、生化武器，还有孟山都高度垄断的种子、化肥与农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霸主

米尔斯与马尔库塞，不敌主流学派。1960年帕森斯发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推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料亚非拉爆发反帝运动，欧美涌现一批新马学者，其中有埃及的阿明（Samir Amin）、智利的弗兰克（Andre G. Frank）、巴西的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美国的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赵按：他们都是帝国罪行的目击者，例如德国青年弗兰克，曾在芝加哥大学读博。他与导师弗里德曼发生冲突，后去智利，经历血腥政变，继而写出《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阿明：第三世界代言人 与小弗相似，阿明生于开罗，父亲是埃及医生，母亲是法国女郎。阿明成了经济学博士，一面为埃及政府工作，一面加入法共。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阿明遭清洗。他逃回巴黎，在大学教书，继而当上联合国非洲经济所所长。1973年，阿明推出《不平等发展》，1976年英文版面世。

此书指控美国联合西欧与日本，施展五大优势，即高科技、大众传媒、金融霸权、资源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针对欧美现代化，阿明指控资本主义乃一全球系统：它以富国为

核心，穷国为边缘。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实质是“统治与依附”。

发达与欠发达 欧美自由派习惯将穷国的不发达，归咎于基础残缺、民众愚昧、政治不民主。阿明却指发达与不发达，构成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体两面。援引各国数据，阿明披露实情如下：

1. 富国主导国际分工，逼迫穷国提供资源与劳力；2. 富国制定贸易规则，掌握分配权、制裁权，这导致不平等交换，民族资本肥水外流；3. 富国向穷国提供援助，但援助条件苛刻。穷国要么社会冲突、内乱不止，要么负债累累，成为朝贡国。

1980年阿明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非洲战略局。他发现，资本主义天生就是帝国主义。其扩张意志、掠夺本性，与全球化并驾齐驱。故此，第三世界必须放弃依附，转而抵制帝国剥削。^[33]

阿明在纽约结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沃勒斯坦。沃老师是新马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他费时30年，完成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何谓世界体系(Global System)? 这同韦伯有关。

韦伯视美国工业化为一种“经济系统整合”。^[34]受韦伯影响，沃老师也很看重系统论。比方说，阿明提出依附论，注重民族国家的定性和分类。老沃更进一步称：1. 穷国富国，千差万别，它们之间不存在普世价值，也没有统一发展模式；2. 帝国体系天网恢恢，不仅支配各国命运，也决定其生死荣辱。

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 在沃老师看来，资本主义从16世纪开始，逐步形成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500年来，该体系共产生3个霸主国，即16世纪的荷兰，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赵按：沃老师的世界体系，包含马克思的革命总体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说，也有阿明的依附论、法国年鉴派的长时段。如此大手笔、全覆盖，令欧美学界耳目一新，继而热议如下：

1. 民族国家标志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工业革命催生一批欧洲强国。强国竞争，推动海外殖民，形成霸主国与依附国。

2. 阿明区分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沃老师提出一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所谓半边缘，是指澳大利亚一类仆从国。它们受美国霸主支配，也会狐假虎威、欺压穷国。

3. 帕森斯突出结构功能，沃老师却看重革命运动。他指责资本全球扩张，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弱国对强国的不满，一再引发反体系斗争。每隔40—50年，世界体系就会破裂一次。破裂来源于革命、战争、大萧条，也会受气候、瘟疫、高科技的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也从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升级为全球帝国。沃老师据此认定：美国猛烈扩张30年，现已进入停滞期，这为全球体系的重组与改造，提供了动力与机遇。^[35]

最后回到加尔通。他说“一旦魔力消散，帝国随之灭亡”。看来他与沃老师不谋而合，都在眺望那一天。

注释 [Notes]

- [1] 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4-5,10-11页;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 And Then What? Transcend UP, 2009。
- [2] Frederick Schiller, "The Gods of The Greece." *The Poems of Schiller*, Dodo Press, 1996; 参见歌德:《歌德名诗精选》,钱春绮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 [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73,303页;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Talcott Parsons;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科林斯导读,第49-52页。
- [5] 莱曼、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阎克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第338-53页;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German Historic Institute, 1993;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思·韦伯传》,闫克文、姚中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55-86页。
- [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科林斯导读,第50页。
- [7] 同上,科林斯导读,第41页。
- [8]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rvard UP, 1983, p. 513; 摩根:《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张瑞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第66页; *The Puritan Dilemma: The Story of John Winthrop*. Longman, 200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尼前言,第19页。
- [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5-79页; 参见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 [1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18-21页。
- [11] 同上,吉登斯导言,第25-30页。
- [12] 同上,科林斯导言,第47-48页。
- [13] 同上,第262页。
- [14] 同上,吉登斯导言,第27页。
- [15] 同上,卡尔贝格导论,第95页。
- [16] 同上,托尼前言,第14页。
- [17] 同上,吉登斯导言,第25-26页。
- [18]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324-29,444-56,719-30页;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J. C. B. Mohr Tubingen, 1976; *Economy and Society: A New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Harvard UP, 2019。
- [1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26页;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P, 1994, p. xxiv, 154。
- [20] 参见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21]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3,14,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186-8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149页。
- [22] 本雅明:《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66,97页;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Hary Zohn, New Left Books, 1997。
- [23] 参见 Rolf Tiedeman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lated by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Belknap Press,

2002.

- [24] 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3,5-6,7-12,19-21页;Hans-Peter Martin and Schumann, *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Der Angriff auf Demokratie und Wohlstand*. Rowohlt Verlag GmbH, 1996。
- [2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阳、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Philosophy of Right*. Prometheus Books, 199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97-105页。
-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47页。
- [27] 莱曼、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编者前言,第viii页。
- [28] 米尔斯:《权力精英》,李子雯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第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十五章;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P, 1959; 参见阿贝拉:《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梁筱芸、张小燕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Alex Abella,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8。
- [2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26-27页。
- [30]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7-11,14-16,20-28,43-45,124-27页;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8。
- [31] 布什、霍尔特:《科学,无尽的前沿》,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17-21页;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Princeton UP, 2001。
- [32] 格鲁伯、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穆凤良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36,38,57,120,131,236页; Johnathan Gruber and Simon Johnson, *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ublic Affairs, 2019; 参见霍克菲尔德:《生物科技:无尽的前沿》,高天翔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第六章; Susan Hockfield, *The Age of Living Machines: How Biology Will Build the Next Technology Revolution*. W. W. Norton, 2019。
- [33]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三、四章;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Oxford UP, 1979。
- [3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帕森斯新版序言,第8页。
- [35]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罗荣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四、五章;《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二、三章;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1-4. U of California P, 2011。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当代新西兰文学专栏

安娜玛丽·雅戈斯《缓流》中的性别政治与后殖民书写

◎ 谭敏

内容提要: 安娜玛丽·雅戈斯的小说《缓流》是以英帝国在新西兰的殖民历史为依托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雅戈斯从当代人的立场出发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一段隐秘历史进行重现和重构,以后殖民书写的方式呈现了英帝国借助性别政治让男女两性共同参与殖民事业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为“超男性气质”所定义的帝国殖民文化对殖民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与重塑,以及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造成的不可治愈的心理创伤。

关键词: 《缓流》 后殖民 性别政治 “超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1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

作者单位: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2

Title: Gender Politics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 in Annamari Jagose's *Slow Water*

Abstract: Annamari Jagose's novel *Slow Water* is a neo-Victorian novel based on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New Zealand. As a modern novelist, Jagose presents and reconstructs an eclipsed historical event which happened in Victorian age, revealing how the British Empire applied gender politics to bring men and women together in the colonial endeavors. More importantly, the novel reveals how imperial colonial culture defined by “hyper-masculinity,” influenced and reshaped the inner world of the people during colonial period, inflicting incurable psychological trauma on both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Keywords: *Slow Water*, post-colonial, gender politics, “hyper-masculinity”

Author: Min T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China.

安娜玛丽·雅戈斯 (Annamarie Jagose) 是出生于新西兰的学者型作家, 目前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任教。除了在酷儿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之外, 雅戈斯迄今为止创作了三部小说, 《缓流》(Slow Water) 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该小说出版翌年即获得蒙大拿新西兰图书奖 (Montana New Zealand Book Awards) 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 (Victorian Premier's Literary Award), 被认为是由新西兰最优秀的小说家所创作的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缓流》取材于英国在新西兰殖民史上的真实事件。1836年, 英国传教士耶特 (William Yate) 在前往新西兰旅途中, 被指控与船上其他男性发生“不当行为”, 继而在没有经过合法调查和法庭判决的情况下, 被英国圣公会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解除教职。根据亚马逊和好读网等读书社区的读者评论, 小说在普通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 但目前关于该小说的研究成果不多, 或许是因为雅戈斯集小说家和学者于一身, 其作为小说家的一面因其出色的酷儿理论研究而遭到遮蔽。目前, 关于《缓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献, 其中凯利 (Frances Kelly) 从“新维多利亚文学”框架分析该小说, 认为“对耶特故事的重写, 突出了与帝国史和殖民史相交织的性史”(45), 但对于帝国殖民史如何与性史交织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穆雷 (Alistair Murray) 认为, 既然《缓流》回顾的是白人定居者到达新西兰之前的历史, 那么小说呈现的是历史档案的乌托邦(45), 因此遑论对其进行后殖民批判。笔者认为, 考虑到故事的殖民历史背景与作者雅戈斯作为酷儿理论研究专家之间的联系, 该小说为后殖民文学研究者洞察性别认同与帝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文本。雅戈斯在《酷儿理论简介》(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中表达了身份认同和性别认同受到政治干预的观点, 认为“酷儿理论, 作为一种思想模式, 并非单纯地产生于同性关系的性别政治理论, 而是受到构成20世纪晚期思想的某些历史知识的影响。这种转变也见诸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和实践[……]性别运动也致力于身份政治的理念, 认为身份是有效干预政治的必要前提”(web)。

基于雅戈斯对酷儿理论的阐述, 并从凯利的论点受到启发, 本文拟从后殖民理论视角解读《缓流》, 探讨帝国性别政治与殖民事业的同谋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颠覆和重构、“超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ity) 对帝国殖民事业的干预, 解读帝国如何借助性别政治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论性别、阶级、种族差异, 共同服膺于帝国内部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 以此论证帝国殖民文化通过性别政治重塑殖民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 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造成了不可治愈的心理创伤。

一、从“家庭”到“帝国家庭”：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重构

本文赞同凯利从“新维多利亚文学”框架出发分析《缓流》。沙特尔沃斯(Sally Shuttleworth)等评论家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三类,该小说属于其中第二类,即“以女权主义、后殖民等新视角对19世纪某部特定作品的改写或重写,从而将‘声音’重新赋予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边缘人群”(金冰 123)。《缓流》对历史人物耶特故事的重写,是对维多利亚历史和文化思潮的反思性再现,折射出当代观察者的观点和思考。维多利亚的时代精神和宏大叙事体现在彼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宗教观中,其中以中产阶级女性道德为核心形成的意识形态力量不可小觑。“屋子里的天使”是维多利亚传统叙述中不可或缺的固化面孔,正是通过这种对性别角色的限定,帝国社会内部的秩序化和道德化得到保证,帝国外部的“勤勉、节制、严谨”的维多利亚社会形象得到宣传。《缓流》的叙述表层似乎在复现这种主流文化面貌,但通过细读我们发现,文本中多处隐匿着针对维多利亚性别观的颠覆性话语。本部分拟从小说主人公耶特的妹妹萨拉对两性角色的评论为切入点展开分析。

叙述者以自由间接引语形式转述了萨拉对两性特点的观察:

女性不为其他事瞎操心,而是更精通于处理社交事务。在摆着杯盘碗盏和三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地摆平了一切事情。但可怜的男人们,除了聊具体事务、牲口、天气、法国革命,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在这一点上,威廉[耶特]不像他们,但他是她哥哥,他和其他男人的共性模糊了她对他的特别看法。(Jagose, *Slow Water* 191)

萨拉的话语似在重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安于家庭,甘当“屋子里的天使”的刻板印象。不过,这些话语却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叙述者对主流话语的质疑和颠覆,因为萨拉所说的女性“在摆着杯盘碗盏和三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地摆平了一切事情”中的“一切事情”当然不只是家务,而是对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事业“不动声色”的参与。

有学者对新西兰早期殖民地岛屿湾(the Bay of Island)的圣公会传教站(真实历史和小说《缓流》中耶特在新西兰的传教驻点)进行考古学调查,结果证明英国女性在19世纪对帝国殖民事业发挥过重要作用。基于此,米德尔顿(Angela Middleton)的两篇论文论证了以下观点:家庭文化是构建不列颠帝国身份的中心。米德尔顿引用多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虽然一般认为妇女不适合参加公共事务,但在社会改革和基督教事业上,女性是能在公共领域发挥一定作用的。‘家庭’成为延伸至传教站,或超越家庭本身而进入‘帝国家庭’的转喻”(“Missionization” 173)。从后殖民视角细读《缓流》,我们发现该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是对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刻板形象的戏仿,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揭示“温柔贤良的女性形象”所包含的悖论。小说开篇介绍耶特从英国将妹妹萨拉接往新西兰的原因是希望“妹妹在新西兰能增添一些女性特质”(Middleton, "Silent Voices" 4)。为何要在新西兰培养女性特质?新西兰殖民地果真是培养女性特质的地方吗?

马斯登(Samuel Marsden)是19世纪早期英国圣公会在新西兰的传教先驱。小说中,马斯登的三个女儿作为随行女眷一同移居新西兰,并对她们做了如下描述:“伊丽莎白·马斯登小姐像是个老姑娘,名随其母;玛丽·马斯登小姐一股紫罗兰爽身粉的味道;玛莎·马斯登小姐像个男孩一样瘦削,手臂上肌肉粗壮。”(Jagose, *Slow Water* 113)“老姑娘”“男孩一样瘦削”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对维多利亚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虽然雅戈斯在小说“致谢”中提到“《缓流》的创作基于大量历史材料,包括档案和出版物”(341),但此处的人物形象塑造无疑是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暗示海外殖民地并非培养名媛淑女之所。

那么女性在殖民地传教站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小说中有清楚的阐述:“在崑梅特,当地女孩肯定得上学,克拉克夫人教她们阅读、写字、算数、教义和缝纫。”(66)如果这些只是帝国世俗生活和文化的输出,那么叙述者通过传教士泰勒之妻的心理独白,则表现了米德尔顿所说的女性殖民者将“家庭”延伸至“传教站”,或超越家庭本身而成为“帝国家庭”的转喻:“我在前往锡安山,永生的上帝之城,天朝般的耶路撒冷,那儿有无数天使成为我们的陪伴。”(218)接着叙述从自由直接引语滑入自由间接引语“如果她不能管住自己的孩子们,她就别想能和新西兰人相处成功”(218)。自由间接引语既保留人物角色主体者的意识以保持故事的连贯性和生动性,同时也流露出叙述者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和评论,意在揭露:在殖民地定居者潜意识中,殖民地土著就如同孩子,而殖民者则是家长,帝国的“家庭文化”通过帝国女性在殖民地进行构建和传播,以将殖民地纳入“帝国家庭”。泰勒夫人的心理活动和萨拉所说的女性“在摆满杯盘碗盏和三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地摆平了一切事情”,皆体现了维多利亚女性卷入帝国性别政治的事实,彰显其与帝国男性共同致力于殖民事业的野心。

小说以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后现代视角将“声音”重新赋予被宏大叙事边缘化的女性人物,使女性形象从传统的“天使”与“恶魔”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但是不同于女性主义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解构,雅戈斯对维多利亚女性形象的重塑,旨在揭示殖民者通过性别政治将女性纳入殖民事业并使其发挥重大作用的奥秘。

二、“超男性气质”:帝国性别政治的本质

《缓流》中对维多利亚性别观的挑战和颠覆不仅体现在女性经典形象的解构上,也体现

在对帝国男性气质的揭露、批判和颠覆上。上文提到，萨拉认为耶特在性别气质上不像船上其他男性，但仍然具有“男人的共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特身上这种矛盾的统一？这个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帝国性别政治编码的思考。

印度政治心理分析学家南迪（Ashis Nandy）在其专著《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中引入了“超男性气质”的说法，认为殖民者将前殖民地社会原本赖以运行的文化符号（家庭、教育、医疗等）从其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移出，而代之以殖民者的文化符码（剥夺、创造财富等），而殖民者强加于人的这套新符码的本质就是“超男性气质”。南迪对其定义是“超男性气质是文化的同谋，它对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力量予以象征化表现，描述了男性和男性气质对女性、儿童、老人，以及一切被认为带有女性气质的事物的支配性统治”（转引自Hamman 810）。当“超男性气质”成为帝国性别政治赖以运行的规则时，男性殖民者由此获得性别认同，这就是萨拉所说的耶特“和其他男人的共性”。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开往新西兰殖民地的“摄政王号”上，男人们都有共同的爱好：带有帝国色彩的博物学。“这种热情激发了竞争意识，在科学的范围内，这种竞争意识具体表现为对地理地貌和动植物优先发现荣誉的争夺活动、以命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占领’的活动以及相关博物学实作高效的生产活动”（刘炫松 314）。小说开篇便介绍耶特携带一个大箱子登上轮船，里面有“番红花的根、雪花莲、郁金香、虎皮百合、孤挺花、金凤花，以及一切他父亲能为他收集来的球茎”（Jagose, *Slow Water* 3），更重要的是他带了一箱蜜蜂，幻想着像马斯登先生为新西兰引入第一匹马那样，成为在新西兰引入蜜蜂的第一人。而小说中其他人物也都体现了这种博物学爱好。苏格兰绅士戈登先生带了12只金丝雀，传教士泰勒先生在船上用望远镜观察岩石，佛尔思医生捕杀并解剖信天翁。在热爱科学的表象下，这些殖民者追逐的是在殖民事业中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荣光。小说叙事者采用自由间接引语，保留主人公耶特的主体意识，对这种热情进行反省：“他为了在威梅特建立一座以耶特先生命名的教堂而拼命筹款，甚至不顾教会总委会的反对，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还是为了上帝。”（114）这段话与其说是在呈现一段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内心独白，不如说是折射一种来自人物之外的旁观者的眼光，批判充满恶性竞争的殖民活动和传教事业的自私性和虚伪性。

在殖民者内部为个体名誉而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耶特的命运悲剧与帝国性别政治宣扬的“超男性气质”息息相关。耶特的人生悲剧不仅是由19世纪不正当同性关系引发的悲剧，更是被“超男性气质”所鼓动的男性殖民者之间的竞争悲剧。宾利（Judith Binney）在其研究中就提到克拉克（George Clark）对耶特的行为很愤恨，因为以耶特署名的著作《新西兰概述》（*An Account of New Zealand*）中“汇集着许多默默无闻的教会兄弟们的成果，（耶特）却以一己之名博世人眼球”。宾利接着解释道：“殖民定居者们总是为自己的名声和成就而彼此忌恨，这样的评论不足为怪。”（120）既然雅戈斯在“致谢”中提到该小说创作参考了宾

利的上述论文，不难理解作者为耶特的指控者阿米斯泰德设计这样的心理独白：“嫉妒是一种罪恶，但不构成犯罪。”（Jagose, *Slow Water* 313）

耶特被驱逐出定居者殖民地，不仅是被“超男性气质”驱动的殖民者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也是耶特对“超男性气质”所定义的帝国殖民体系挑战失败而导致个体毁灭的悲剧。哈曼（Jaco J. Hamman）描述了“超男性气质”男子的一系列表征：“不流露情感、害怕亲密关系、排斥非男子气的依恋和认同、尚争、好斗、强壮、独立、强大、理性、性感、对同性依恋者的惧怕。”（799）小说中，不仅萨拉发现耶特具有矛盾的性别特质，耶特的教会同行、“摄政王号”上的旅行同伴泰勒先生对耶特的表现也疑窦丛生：“耶特先生对所有人都冷冰冰。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但他竟然与一个船员三副关系亲密，那家伙根本不配当耶特的朋友啊！”（Jagose, *Slow Water* 288）泰勒的质疑一方面证明耶特身上具有冷漠的“超男性气质”，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耶特对“超男性气质”的颠覆与挑战：漠视阶级区别、表现出非男子气的依恋，甚至发展成同性吸引。对同性的依恋尤其为帝国性别政治所不容。据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者裘德洛（Nancy Chodorow）分析，女性从事生育是帝国劳动分工的中心，因为这样才能有男性气质的再生，由母亲养育的男孩由于与父亲保持疏离，更加激发了对男性角色和父亲的男子气想象（转引自Hamman 804）。《缓流》中“摄政王号”上的男孩虽然由母亲照料起居，但作者不惜笔墨描述他们观看成年男性们捕鲸、猎杀鲨鱼、解剖海鸟的经过。不以生育和男性气质再生为目的的同性依恋显然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政治，被主流社会视为瘟疫和毒瘤。

临近故事结尾，作者发挥小说家的想象，让不畏流言蜚语的耶特与绯闻恋人丹尼森及妹妹萨拉在等待被遣返回国时组成了一个短暂的乌托邦共同体，但这毕竟是小说家的虚构。作者在故事结束后加上“历史附注”（“Historical Note”），揭示真实历史中的耶特回国后几乎失业、孤独而终的悲惨结局。但无论是乌托邦想象，还是真实历史的揭露，耶特皆因其与同性的不当行为而成为帝国文化的“他者”。人们把他用过的物品烧毁，将他骑过的马匹射杀，社会也拒绝给他任何职位，此即强烈的“恐同”。根据斯卢特马克斯（Koen Slootmaeckers）等学者的观点，“恐同”不是个体对同性依恋者的偏见，而是一种政治工具，目的是为了强调一种“集体身份政治”。同时，“恐同”也是一种“他者化技术”，让人们惧怕与同性依恋者产生联系，以此来组织和维系国家内部的性别等级，确保国家的生物性延续（Slootmaeckers 242）。正如斯卢特马克斯论文标题《国家主义是一种充满竞争的男子气质》（“Nationalism as Competing Masculinities”）所示，性别政治与国家政治相互交织，通过运用“他者化技术”，进行彼此重构。在《缓流》中，帝国以“超男性气质”为中心建立帝国性别政治，在征服殖民地人民的同时，也在殖民者内部进行规训，让同属殖民者的耶特“被夹在了他发誓效忠的历史铰链中，在具体生活和狭隘文化中，他自己也受到了创伤，成为受害者的一员”（Hamman 809）。性别政治如此便成为殖民事业的同谋。

三、创伤叙事：性暴力和殖民暴力的后殖民书写

创伤记忆成为连接定居者殖民经验和新西兰当代多族群文化共存现状的纽带，而创伤叙事则成为解构殖民历史的后殖民书写策略。陶家俊将创伤的当代核心内涵描述为，“人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117），并认为其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重复”三大特征。但汉松也强调了创伤理论“体现在心理分析中所说的‘延后性’（belatedness）”（33）。虽然《缓流》取材于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但通过反复呈现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的暴力体验，“通过殖民主体抗争性的自我表述”（阿希克洛夫特 196）对 19 世纪早期英国在新西兰的殖民经验进行了后殖民重现。本部分以被殖民者托西和殖民者耶特对种族暴力和性别暴力记忆的重复闪回为分析对象，探讨该小说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对维多利亚历史和维多利亚时代边缘人的隐秘性史进行想象和重构，以挑战和颠覆前殖民话语。

小说开篇是新西兰毛利人托西 1836 年 11 月从新西兰崑梅特的英国圣公会传教站写给耶特的信件，写信时间是耶特被指控与同性发生“不端行为”，被解除教会职务，并被遣返回国之时。与之呼应，小说结尾是托西在 1840 年 11 月从崑梅特写给隐居英国乡间的耶特的信件。这两封信件时隔四年，是托西所代表的“被殖民他者”仅有的两次正式发声。信件的表层话语洋溢着毛利人对殖民者的“感恩”，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殖民创伤叙事才是小说叙事的深层。托西的信件充斥着一种矛盾张力——对殖民传教士的“感恩”和对殖民者文化施暴的“恐惧”，后者才是小说叙事的真实意图。

英国殖民者在新西兰发动的殖民战争、对毛利人的种族屠杀、耶特对托西的性侵犯，都隐藏在托西对疾病和死亡的指涉中。不仅如此，书信中的内容与小说的某些情节出现了明显矛盾，托西在前一章充当了遭受耶特性侵犯的证人，而在书信中却屡表“感恩”。这种叙事的不一致性，表面上是耶特传教成功、受殖者被成功洗脑的结果，实质上暴露的是在遭受帝国宗教、政治、军事、文化殖民暴行后，殖民地人们已失去了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的结果。托西在书信结尾和众多给耶特写信的毛利土著一样，都称呼自己为“您的孩子”，称呼耶特为“父亲”。这也是帝国性别政治和宗教政治产生合力对殖民地人民的个人和种族身份进行摧毁的结果。

殖民传教的后果是土著语言的式微、土著文化的消亡和土著集体文化身份的遗失，这体现了帝国文明的暴力本质。在小说结尾的信中，当托西用殖民者的语言稚嫩地表达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感恩时，叙述者以被殖民者的视角还原了最初签订《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的历史现场：“威廉酋长死了，但是维多利亚女王给威廉姆斯先生和巴斯比先生写了本书，说她愿意成为新西兰人的朋友。所有的酋长参加了在怀唐伊举行的宴会，

在书上签了名，并三次欢呼。”（Jagose, *Slow Water* 338）信中指涉签订《怀唐伊条约》的历史事件是有深刻后殖民寓意的。首先，作者采用不可靠叙事策略有力揭开了被殖民者创伤记忆的面纱。且看作为殖民受害者的托西在信中的表达：“耶特先生，听听我的想法吧！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是我们的朋友和保护者，克拉克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现在住在伦敦，那是女王住的地方，请向女王表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们这儿很和平。”（338）该叙述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史实证明，当时在缔结条约过程中双方地位极不平等，因为一些关键术语的释义差异导致英国人与毛利人的战争不断。这样的不可靠叙事反而强化了定居者殖民地人们的历史创伤记忆。其次，信件中叙述者以毛利人的口吻，用殖民者的语言进行书写，揭露了殖民过程中语言在摧毁土著文化、建构所谓的真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托西所说的“书”实际上是指由英国驻扎官巴斯比（James Busby）草拟，由传教士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将英文版本翻译成毛利语版本的《怀唐伊条约》。英国殖民者正是利用毛利人不会纯熟地运用英语的劣势，模糊“主权”一词的翻译，使毛利酋长在条约上欣然签字，从而为后世埋下争夺领土主权的祸根。《怀唐伊条约》既是英国在新西兰殖民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成为新西兰独立后的立国之本，对当今新西兰社会文化和族群关系仍有重要影响。从后殖民的视角重审相关殖民历史，了解签订《怀唐伊条约》的来龙去脉，以唤起对各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尊重，对全球化时代构建多元、和谐的多民族族群关系极为重要。

小说另一重要创伤叙事是传教士耶特关于性史的创伤记忆。耶特与其乘坐的“摄政王号”的三副船员丹尼森之间的同性关系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与这一情节主线紧密相连的是耶特运送女囚前往殖民地的往事。小说两次以耶特的回顾性视角叙述七年前，26岁的耶特乘坐“君主号”轮船，以牧师身份协助将80位女囚运往澳大利亚的霍巴特镇（Hobart Town）的经历。耶特的回顾性叙事中充满了对这段经历的厌恶和恐惧。令他厌恶和恐惧的不是她们的囚犯身份——“这些女人们虽然声名狼藉，但其实她们并没有那么坏”（209）——而是弥漫在整个事件中的殖民暴力、阶级暴力、性暴力和资本主义暴力。

耶特隐晦地提到了女囚之间的同性性行为：“她们坐在一起，脸色粗糙，咧嘴大笑，好像她们知道某些不能说出口的玩笑。”（209）“一开始他被这些女人们给吓坏了，比她们的罪行，更可怕的是她们扎堆在一起时那种看上去很粗暴的女子气”（252）。他还清楚地回忆起自己无意间撞见船上两名军官轮奸女囚波莉后将其卖给殖民地某男子为妻的过程。更为吊诡的是，受害者波莉在被施暴过程中“以一种享受的满足盯着天花板”（253）。事后被当成商品卖给殖民地的陌生男子时，她完全没有反对，叙述者多次使用“快活地”（cheerily）一词描述施暴者和受害者。这里的创伤主体与其说是波莉，不如说是目击者耶特。如卡普兰（E. Ann Kaplan）所认为的，“创伤主体不仅包括施暴者和直接遭受创伤的受害者，而且包括旁观者”（转引自陶家俊 124）。

根据耶特的叙述,当时 26 岁的他“和艾德温 [艾德温·丹尼森] 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但在人情世俗上却不及艾德温一半”,“他还为离开伦敦而哭泣,尽管他都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伦敦”,“一开始他被这些女人给吓坏了”(Jagose, *Slow Water* 252)。如此描述下的耶特显然具有“弱者”“受创者”的形象。从此,他目睹的性施暴经历成了他记忆深处的秘密,并时不时从记忆密穴中冒出,体现了“创伤”具有的“入侵、后延和强制重复”三大特征。这与其后来在性别气质和性爱取向上的畸变不无关系。文化殖民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前殖民地社会文化造成灾难的同时,也改变了殖民者的精神世界,如陶家俊所说:

文化心理殖民 [……] 不仅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殖民者的精神世界,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从吉卜林到奥威尔,从布鲁姆斯伯里小组到剑桥牛津才子,弥漫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精英群体的帝国感伤情绪、思想反叛、精神异化、女性气质和同性恋癖等,都是殖民文化的创伤症候。(122)

阿希克洛夫特在《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指出,“后殖民术语也许能提供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殖民关系:它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如被殖民的黑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对立,或第三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而是包括定居者殖民地在内的殖民势力的多重表现形式”(190)。《缓流》以后殖民书写方式揭开殖民文化的经典伪装,瓦解了殖民主义的表意系统,通过透视帝国文化的性别政治本质,管窥性别政治如何成为殖民事业的同谋,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论性别、阶级、种族差异,共同服膺于帝国内部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引发的思考是:小说作者雅戈斯,作为来自前定居者殖民地的当代新西兰作家,为何继续关注帝国经验?为何在对帝国经验的虚构性重现时突出帝国史、殖民史与性史的交叉?其内在的颠覆性潜质是否与“殖民遗产给社会肌理留下的经久创痛有关”(谭彦纬 120)? 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shcroft, B.,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Translated by Yiming Ren. Peking UP, 2014. [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Binney, Judith. “Whatever Happened to Poor Mr Yat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vol. 9, no. 2, 1975, pp. 111-25.
- Dan, Hansong. “Post-9/11 Mourning in Louise Glück’s *Averno*.”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21, pp. 30-42. [但汉松:《“暴力改变了我,然后呢?”——格吕克〈阿弗尔洛〉中的后“9·11”悲悼》,载《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第30-42页。]

- Hamman, J.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Hypermasculine Male: Select Subaltern Views." *Pastoral Psychol*, vol. 66, 2017, pp. 799-818.
- Jagose, A. *Slow Water*. Victoria UP, 2003.
- .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ww.Doc88com/p-0886899017994.html?r=1, 2021-08-29.
- Jin, Bin. "Neo-Victorian Fiction: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22, pp. 119-28. [金冰:《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第119-28页。]
- Kelly, Frances. "Antipodean Victoriana: History and Fiction in Annamarie Jagose's *Slow Water*."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vol. 46, 2011, pp. 45-61.
- Liu, Xuansong. "A Discussion about the Thought Foundation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3, 2018, pp. 310-19. [刘炫松:《试论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思想基础》,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3期,第310-19页。]
- Middleton, A. "Silent Voices, Hidden Lives: Archaeology,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CMS Missions, Bay of Islands, New Zealand, 1814-184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 11, no. 1, 2007, pp. 1-31.
- . "Missionization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 14, 2010, pp. 170-87.
- Murray, Alistair. "Archival Utopics: Annamarie Jagose's *Slow Water*." *Journal of New Zealand Studies*, no. 26, 2018, pp. 45-56.
- Nicol, B.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 Cambridge UP, 2009.
- Slootmaeckers, Koen. "Nationalism as Competing Masculinities: Homophobia as A Technology of Othering for Hetero- and Homonation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48, 2019, pp. 239-65.
- Tan, Yanwei. "The Postcolonial Allegory and Its Transcendence: Trauma, Family, and the Future in *The Bone People* and *Disgrace*." *Foreign Literatures*, no. 4, 2020, pp. 117-24. [谭彦纬:《后殖民寓言及其溢出——〈骨头人〉和〈耻〉中的创伤、家与未来》,载《国外文学》2020年第4期,第117-24页。]
- Tao, Jiajun. "Trauma."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11, pp. 117-60. [陶家俊:《创伤》,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60页。]

◇责任编辑:夏开伟

布干维尔内战在异域的文学映射 ——新西兰小说《皮普先生》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 刘略昌 吴乐

内容提要: 在多股外部势力介入和各方利益博弈影响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内战已演变为区域性事件。荣膺英联邦文学奖的新西兰小说《皮普先生》对布干维尔内战进行了文学映射。劳埃德·琼斯在小说中揭示了美拉尼西亚不同人群在战时冲突中身份建构的特点。本文借助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对《皮普先生》进行审视, 发现代表外来移民的瓦兹与代表两代原住民的德劳瑞丝母女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 分别通过嫁接英国文化、保护本土文化和杂糅两种文化三种方式建构各自的文化身份。《皮普先生》从一定程度上隐喻了新西兰的文化发展, 并为全球化时代新西兰不同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思考空间。

关键词: 布干维尔内战 新西兰当代小说 《皮普先生》 文化冲突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2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批评视域下新西兰文学民族主义运动研究”(2022BWY006)

作者单位: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安徽合肥医药卫生学校校长办公室, 安徽 合肥 23001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3

Title: The Oversea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Bougainville Civil War: On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New Zealand Novel *Mister Pip*

Abstract: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external forces, the Bougainville Civil War in Papua New Guinea has evolved into a regional issue.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novelist Lloyd Jones provide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ivil war in *Mister Pip*, reveal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Melane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proposed by Stuart Hal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r. Watts who represents the immigrants on Bougainville Island, Dolores and her daughter on behalf of two generations of aborigines, construct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ies through grafting British culture, protecting native culture and blending the two cultures together. To some extent, *Mister Pip* metaphorizes the cultural trajectory of New Zealand, which provides certain space for reflecting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New Zeal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Bougainville Civil War,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novel, *Mister Pip*, cultural conflict, identity construction

Authors: Luechang Li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Le Wu, Research Assistant, President's Office, Anhui Hefei Medical and Health School, Hefei, Anhui, China.

2019年末,地处南太平洋的布干维尔启动历史性的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巴布亚新几内亚而获得独立。公投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人们不仅再次把目光投向布干维尔分离主义运动及由此引爆的布干维尔内战(1989—2001)。布干维尔内战本来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事,但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其和平进程和未来走向实已演变为区域性事件。布干维尔内战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际政治领域,它还引起了海外作家的兴趣。新西兰作家劳埃德·琼斯(Lloyd Jones)在其2007年度英联邦文学奖获奖作《皮普先生》(*Mister Pip*)中对此表达了关切。《皮普先生》是一部描写布干维尔内战的新西兰当代小说。小说以引发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内战为背景,讲述了布干维尔原住民玛蒂尔达在战争的夹缝中,经新西兰移民瓦兹的引导,通过阅读《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逃避战争的恐惧,实现了自我成长的故事。小说描绘了战争和以《远大前程》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给布干维尔带来的文化断裂及三个群体各不相同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程。琼斯将被西方世界忽略的南太平洋岛国历史引介给国际社会,向读者呈现了布干维尔岛惨绝人寰的内战场景,表达了对南太平洋地区后殖民文化的关注。这一点能从琼斯的夫子自道之中得到证实,“《皮普先生》所关注的问题与太平洋地区的后殖民文化有很大关系”(Norridge 71)。

迄今为止,关于该小说的研究多选择从后殖民文化的视角切入。这方面的讨论集中于小说对《远大前程》的逆写(Butter 130),还有这部小说与传统重写小说的不同之处(Wilson 220)。至于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已有研究倾向于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观点。例如,希勒(Dana Shiller)宣称“琼斯对原住民故事的颂扬建构了布干维尔岛的文化身份,消解了它的边缘化地位”(95)。这种观点将布干维尔岛的文化身份理解为岛上原住民共享的内在属性,忽略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忽视了小说中岛民间文化身份建构多样而动态的过程。不同于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抑或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琼斯在《皮普先生》中并未侧重颠覆帝国文本《远大前程》的中心地位,而是试图将其置于地理风俗完全不同的南太平洋岛国,探索文化身份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合力下如何不断进行“认同或缝合”(霍尔 212)。琼斯把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从“我们是谁”转化成了“我们将成为什么”,这与霍尔(Stuart Hall)关于文化身份具有可建构性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一点对于文化身份建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试图从学界并未谈透的文化身份建构入手,以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为参照,剖析在战争和《远大前程》的影响下,以瓦兹为代表的白人移民,以德劳瑞丝为代表的布干维尔老一代原住民及以玛蒂尔达为代表的新一代原住民各自建构文化身份的历程,借此揭示南太平洋岛国文化身份建构中呈现的新样态。

一、瓦兹：外来文化的嫁接者

霍尔指出，身份由两个向量共同作用产生：相似性和连续性向量；差异和断裂的向量(213)。第一个向量与历史的根基和延续有关，第二个向量指出断裂的经验是一种群体共有的经验。这两个向量间的对话关系是身份构建的重要内容。面对因迁徙、战争带来的文化断裂，小说中以瓦兹为代表的外来移民最初消极应对文化身份建构，后来主动将母国文化精髓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苗上，最终建立独立于母国文化、融合了本土文化的崭新身份，以此实现历史的延续。与罗伯特·杨(Robert Young)提出的“嫁接”和“杂交”(转引自阿希克洛夫特 11)不同，他们的做法更倾向于实现文化间的互学互鉴。

布干维尔内战发生前，来自新西兰的白人移民瓦兹在布干维尔岛态度消极，无意构建新的文化身份。他和妻子格雷斯常年隐居于牧师的老房子里，此处人迹罕至且灌木丛生。小说交代了房子周围灌木丛生是因为当局因为牧师之死而忽略了传教，不过这一解释却掩盖了瓦兹无所作为这一主要原因。瓦兹本可以自己清理灌木，却任由其肆意生长，最后遮盖了整个房子。瓦兹的用意或许可以从他那双异常突出的眼睛里找到答案。在岛民看来，他的眼睛“让你想到某个无法尽快夺门而逃的人”(琼斯 15)。这双眼睛透露出瓦兹身在异乡的不安和窘迫。这种不适也许可以在灌木的遮挡中暂得缓解。可见，初入布干维尔岛的瓦兹只一味地通过回避来掩饰自己的无所适从，未曾想过建立新的文化身份。

瓦兹的消极态度因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封锁政策而发生改变。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为了镇压叛军而对布干维尔岛实行封锁，岛上一切都受到影响，学校因此关闭。瓦兹主动走出灌木丛，走向原住民的房屋，要求重新开启学校课程。进入教室后，之前在岛上沉默寡言的瓦兹提出：“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清理出来[……]把它变成一间新教室。”(15)这与之前对灌木丛的疏于清理形成鲜明对比。瓦兹主动打破阻碍前行道路的桎梏，开始为新文化身份的建构腾出空间。他向学生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16)和学生们一起改变生活，重塑自己的故事。瓦兹与本地原住民的经历从此具有了同一性。

态度发生转变后，瓦兹以传承母国文化为起点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母国新西兰曾经被英国殖民，即便新西兰早已实现政治独立，但新西兰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仍然与文化，尤其是《远大前程》中19世纪的英国社会文化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在地理风貌完全不同的布干维尔岛，瓦兹潜意识中依然留存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传统和行为准则的印记。这也是为什么瓦兹在课堂上总是穿着白色亚麻布的衣服，系着黑色领带，尽己所能打扮得像个“绅士”。

除了在言行举止上注重翩翩风度之外，瓦兹还会在课堂中传递“绅士”这一颇具英国特色的文化观念。在朗读《远大前程》中有关“绅士”的章节时，瓦兹告诉学生：“绅士是指一个男人，他从来不会忘记他的行为规范，不管他的境遇如何。”(45)当学生克里斯托弗提出穷人是否能成为绅士这一问题时，瓦兹强调，“绅士”是一种品质，与金钱或社会地

位没有任何关系。学生们在瓦兹的指导下慢慢养成了绅士风度——不管谁的家长来课堂发言，他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从不知道“绅士”为何物到逐渐学会绅士风度，这表明瓦兹对英国文化进行了成功的移植。劳恩（Jennifer Lawn）认为：“瓦兹先生把皮普的故事传递给孩子们，自己也从故事中收获了一种宽慰，他以此调和了自己与布干维尔岛之间的摩擦碰撞。”（148）这也使得以嫁接母国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身份的构建成为可能。

在构建新文化身份的过程中，瓦兹从思想上把母国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此，瓦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课堂上，瓦兹从未强调《远大前程》代表的英国文化的优越性。他坚持认为代表本土文化的“魔鬼”与代表英国文化的《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地位相同。面对使学生感到羞愧的本土文化，瓦兹始终抱着敬重的态度。他主动邀请学生家长来课堂为学生讲故事。尽管学生对家长充满本土特色的故事不屑一顾，但瓦兹先生“脸上呈现出来的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很感兴趣的表情”（琼斯 49）。瓦兹的行为表明了他对本土文化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瓦兹的课堂成为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平台。这样的做法不但有利于实现舶来文化的本土化，也便于瓦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

在构建新文化身份时，瓦兹需要解决“建构‘本土性’的问题，并将它与续存的欧洲传承观区别开来”（阿希克洛夫特 128）。对此，威尔森（Janet M. Wilson）曾经指出：“英国身份和英国绅士的概念已经脱离了他们原来的阶级和社会能指，但这些基于大都市的价值观需要新的阐释，以便重新融入新殖民语境。”（224）瓦兹弃用英国文化中心主义，以使之更好地适应本土。在朗读《远大前程》时，他过滤了代表英国文化特色却不能为本土文化所接受的内容，比如康皮森和麦格维奇不公平审判所体现的严苛的英国等级制度。对《远大前程》中涉及文化差异的部分词汇，瓦兹灵活地进行“格义”处理。与此同时，瓦兹鼓励学生运用本民族的语言解释《远大前程》的内容，借此引导他们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这种方式，瓦兹引导学生理解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同文化因相似得以交流，因差异而异精彩纷呈。这正验证了巴特（Stella Butler）的观点：琼斯在《皮普先生》中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包容民族差异并倡导跨文化交流的理想之国”（135）。

为了更好地建构新文化身份，瓦兹格外注意文化传播的方式。根据《远大前程》、自己的经历及当地的民间故事，他创造了“《远大前程》的太平洋版本”（琼斯 48）。这个故事源自伦敦、惠灵顿和布干维尔岛三个地方，糅合了不同的文化。与作为书面文学的原作不同，瓦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选择了口头叙述方式。布干维尔本土文化属于美拉尼西亚文化的一个分支，有着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化传统。即便在书面文化上投入大量精力，美拉尼西亚人至今仍对口头叙述情有独钟。瓦兹采用口述方式，讲述了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的“百衲被”故事，有利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此外，在故事叙述中，瓦兹并不凸显自己的优势，也没有借助故事反击自己的“敌人”德劳瑞丝，而是坦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使德劳瑞丝逐渐放下成见，开始接受他的价值观。最终德劳瑞丝不再保持沉默，而是为谴责政府军的暴行挺身而出。伯恩斯（Nicholas Birns）指出，瓦兹在《皮普先生》中用一种混合多重的方式

扮演狄更斯，这种方式既不属于他本人，也不属于狄更斯（127）。

除此之外，瓦兹还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皮普故事时进行身份建构，从而实现嫁接文化的本土化。当《远大前程》被政府军烧毁后，瓦兹呼吁学生在内心建一所承载自己故事的屋子。他提醒学生，“有些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这也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想象力”（琼斯 105）。接着以狄更斯为例，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天赋——自己的声音。再接下来，瓦兹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回忆《远大前程》的内容。此时，瓦兹一方面希望学生能够承担起传承经典文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学生通过讲述皮普的故事来形成自己的故事。在瓦兹的引导下，学生沉浸于记忆碎片的寻找中，他们发现“读者会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发展出另一个类似的故事”（109）。学生逐渐意识到他们所要找寻的东西固然不能像食物一样填饱肚子，但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身份。对此，莱瑟姆（Monica Latham）曾犀利指出：尽管这个故事与孩子们的处境和经历格格不入，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根植于一种外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语言学和文学背景中）既为人熟悉又具有普遍意义（27）。

由于最初在移居地经历了不安和窘迫，使得瓦兹在建构文化身份时表现得比较消极。在见证了残酷的布干维尔内战后，瓦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建构问题。他从母国文化的嫁接出发，结合本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身份，同时引导新一代原住民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瓦兹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程是无数移居他乡者寻求文化身份的写照，也为外来文化的异地生长提供借鉴。

二、德劳瑞丝：本土文化的守护者

霍尔认为：“每一个（都市）中心都以不同方式协商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从属性。而这种区别 [……] 已经刻写在我们的文化身份之中。”（214）布干维尔岛位于大洋洲三大文化区域之一的美拉尼西亚，岛上九成以上的人口是美拉尼西亚人。在美拉尼西亚人眼中，家族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道德评判都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好’就是对家族有利；‘坏’就是对家族不利”（Dejonge web）。小说中，主人公玛蒂尔达的母亲德劳瑞丝是布干维尔岛土生土长的老一代原住民。在布干维尔被封锁前，她奉行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标准，建构了典型的本土文化守护者身份。然而在战争和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她的文化身份建构经历了从固守本土文化到捍卫本土文化，再到接纳英国文化这一历程。

战争发生前，德劳瑞丝是一个十足的本土文化守护者，时刻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她对一味推崇白人文化的丈夫约瑟夫十分鄙夷。当丈夫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盲目效仿白人的行为举止时，德劳瑞丝却严厉批判这种模仿白人的行为，甚至不惜与之争吵。在她看来，丈夫的行为是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否认，对家族不利。她坚信：“我们这里 [布干维尔岛] 与那里 [电影里的白人世界] 没什么不同。”（琼斯 7）即便在约瑟夫跟着白人前往澳大利

亚过上向往的白人生活之后，德劳瑞丝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留在家乡布干维尔。于她而言，美拉尼西亚人只有在家族中才能获得安全感，而布干维尔是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德劳瑞丝对家乡的坚守和对丈夫崇尚白人文化的排斥，不仅表现了她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坚守，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她对外来文化的拒绝。

在布干维尔被封锁的前期，德劳瑞丝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坚守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忽视。当女儿玛蒂尔达向德劳瑞丝说起瓦兹会在下一节课介绍狄更斯时，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感，而是希望那个叫狄更斯的白人可以帮他们修理发电机。其他的岛民也持类似态度。因此，学生们第二天带上家长们的需求清单回到课堂。清单中提到的物件有“治疟疾的药片、阿司匹林、发电机燃油、啤酒、煤油、蜡烛”（琼斯 17）。这些都只能用来解决因封锁而产生的生活问题。显而易见，包括德劳瑞丝在内的学生家长，只是单纯地认为这个白人的到来能自己的生活提供便利，而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对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带来冲击。

战争带来的文化断裂是瓦兹和德劳瑞丝的共同经历，但它并不能构成共同的文化源头。出于对本土文化的延续，德劳瑞丝向瓦兹发起了美拉尼西亚文化保卫战。随着瓦兹课程的进行，德劳瑞丝对他的教学方式产生不同看法：“‘泡泡眼’应该把正确的行为教给你们这些孩子。”（24）引文中“正确的行为”在美拉尼西亚文化体系中就是对家族有利的行为，但瓦兹在阅读《远大前程》时没有强调这些。所以，德劳瑞丝不同意瓦兹的教育理念。自此，德劳瑞丝不再称瓦兹为“瓦兹先生”，而是换成充满讽刺意味的“泡泡眼”。这种称呼变更无疑表明了德劳瑞丝态度的转变：她不再把瓦兹视为教师，而将其看成“他者”。她用富有本土气息的“金鹃的子孙”（41）来形容瓦兹，这暗示了她对瓦兹在布干维尔岛宣扬英国文化的批判——既表现了不满，又宣扬了她的主体地位。据此可以看出，瓦兹对英国文化的移植引发了德劳瑞丝的焦虑，也提醒她要向下一代传递本土文化。

为了捍卫本土文化，夺回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德劳瑞丝开始对女儿实施专制：强迫玛蒂尔达做她不喜欢的事情，例如要求她记住家族谱系上所有祖先的名字，并不断测试她是否记牢。于美拉尼西亚人而言，“每个美拉尼西亚人都在自己的家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并对整个家族有责任感”（Dejonge web）。因此，记住家谱上所有祖先的名字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此外，祖先的名字既包含美拉尼西亚人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也记录了祖先的生活，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家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的历史，记住家族所有人的名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本土文化的传承。

德劳瑞丝对本土文化的捍卫也体现在对瓦兹的报复上。玛蒂尔达在家谱姓名记忆测试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挫败，同时却把“皮普”写在家谱人名的旁边。此时，德劳瑞丝知道那个发生在遥远伦敦的故事在孩子心中已然根深蒂固，这意味着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守护最终以失败收场，于是便与瓦兹结仇。“对一个美拉尼西亚人来说，任何一个其他部落的人，甚

至其他村落的居民，都是他的敌人”（托卡列夫和托尔斯托夫 596），更何况这个来自异乡的白人。为了摧毁瓦兹在女儿玛蒂尔达心中的地位，她偷走了课堂上使用的《远大前程》，让课堂再无与英国有关的故事。巧合的是，玛蒂尔达写在沙滩上的“皮普”被政府军误认为是真实村民的名字。此刻，《远大前程》是能够证明“皮普”为虚拟人物的唯一证据。就在政府军声称要见到这本书、否则就烧掉全村人的财产时，德劳瑞丝始终保持缄默。从表面上看，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胜利。《远大前程》的失踪致使村里人的所有财产被焚毁殆尽。村里人把这一切归结于无辜的瓦兹，并将其所有财产付之一炬。但是，德劳瑞丝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村民未能躲过政府军进一步的暴力：烧毁所有村民的房屋。更加得不偿失的是，德劳瑞丝的做法令她彻底失去自己在女儿心中的位置，她在这场本土文化捍卫之战中一无所获。

德劳瑞丝虽然排斥外来文化，但她却无法完全摆脱外来文化的渗透，逐渐成为能接纳英国文化的守护者。在新一轮争夺地位的游戏里，她继续用各种话语贬低瓦兹并用“泡泡眼”表达自己的蔑视。相较之前，德劳瑞丝这一阶段的怨恨似乎有所减少。当瓦兹先生对兰博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她虽然总是迟到，但却从未缺席。聆听瓦兹的故事时，德劳瑞丝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产生瓦兹是否在嘲笑她的质疑，相反开始尊重瓦兹并逐渐理解他所强调的用不同方式描绘世界的价值。小说结尾部分，德劳瑞丝为自己先前的过激行为懊悔不已，并决定做出补偿。对此，莱茨科夫斯基（Rafal Łyczkowski）指出：“她似乎明白了自己之前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她接受了之前全然排斥的瓦兹（狄更斯）和玛蒂尔达的价值观，开始如瓦兹一样变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425）

德劳瑞丝真正成为能接纳外来文化的本土文化守护者，拐点是她为证明政府军有罪而选择慷慨赴义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政府军要求目击瓦兹被杀害过程的所有人员保持沉默。此时，德劳瑞丝明知违抗政府军的意愿会有性命之忧，却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告诉政府军的指挥官：“长官，我看见你的人把那个白人剁成了碎块。他是个好人，我在这里，做上帝的证人。”（琼斯 174）她的这种反抗精神及随后为保护女儿而甘愿牺牲自己的英勇行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类共同文化守护者的形象。同时，德劳瑞丝的行为也为年幼的女儿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树立了榜样。

德劳瑞丝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经固守本土文化、捍卫本土文化和接纳外来文化三个不同阶段。尽管她为捍卫本土文化一度采用了较为偏激的方式，但最终还是成为一位人类共同文化的守护者，展现了布干维尔原住民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坚定和包容。这也是琼斯对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见解：文化的发展不是在中心位置此消彼长，而是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彼此相长，呈“同心圆”式的发展。

三、玛蒂尔达：两种文化的杂糅者

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11）。长期受外来统治的影响，布干维尔已形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杂糅的态势。对新一代的布干维尔原住民而言，在杂糅中建构文化身份，需要首先考虑两个问题：文化遗产的天平倾向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文化建构最终要回归本土还是溯源外来文化？在《皮普先生》这部小说中，与生长于美拉尼西亚文化中的德劳瑞丝或者生长于维多利亚文化光影下的瓦兹不同，玛蒂尔达作为新一代原住民，在杂糅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时，她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不断摇摆，并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她传承了两种文化，并最终回归本土文化。

玛蒂尔达建构文化身份的初期表现为崇拜英国文化。这种崇拜源自英国更为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早在玛蒂尔达祖父时期，已有白人登陆布干维尔岛。通过第一个上岸的白人与玛蒂尔达祖父的交流可以看出，两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在同一层次。白人上岸后向玛蒂尔达祖父索要指南针和地图，并询问最近的商店。这些白人心目中的寻常物件对玛蒂尔达的祖父而言却是奇珍异宝。此后，登陆的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岛上担任重要职位的同时，带来了发电机、冰箱、电扇、医药用品等代表先进技术的物品，给岛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显然，这些便利影响了尚未成熟的玛蒂尔达对白人的认知。她曾一度相信：“重要的东西都是白色的。”（琼斯 4）因此，玛蒂尔达对当时岛上唯一的白人瓦兹及其带来的《远大前程》这一文化产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玛蒂尔达期望从《远大前程》中找寻文化认同感，这显示了她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化的崇拜。自从读了《远大前程》，玛蒂尔达便开始不断地找寻自己与主人公皮普之间的共同点。玛蒂尔达最先找到的共同点是对父亲的了解比较模糊。她模仿皮普，通过父亲的笔迹猜测父亲的形象。她还从生活中找到了皮普姐姐般的人物——自己的母亲，以此来说明自己遭遇了与皮普类似——家人的管制。玛蒂尔达的这些行为表现了她对 19 世纪的伦敦——一个不受战争影响的地方的痴迷，她甚至希望不断从中找寻文化认同感以获得某种精神慰藉。这种做法也证实了瓦都科斯（Charlotte Wadoux）的观点：“这所学校让布干维尔的孩子们通过把《远大期望》转变为一本关于文化和生存的教科书，以此来解读难以理解的暴力局势。”（12）

除了对英国文化的崇拜，玛蒂尔达在这一阶段的身份建构还表现为对本土文化的鄙夷。她开始对瓦兹的话深信不疑，却并未对自己熟悉的世界表现得如此兴致勃勃。每次母亲来到教室讲课，玛蒂尔达总想躲起来。其他家长来讲课时，她也表现得不屑一顾。对于母亲熟记祖先谱系的叮嘱，她总是充耳不闻。她能记住《远大前程》中所有人物的名字，却在母亲关于祖先谱系的记忆测试中屡屡受挫。她对母亲的考验提出质疑：“既然认识了皮普这样一个虚构之人，再要了解已经过世亲属的那些鸡零狗碎、不可信的事情还有什么意义？”

(琼斯 65) 与祖先相比, 玛蒂尔达甚至认为自己与皮普的关系更为紧密。她甚至开始嫌弃身边熟悉的一切。这一点可从她对皮普和对自己熟悉之人或物的鲜明反差态度中得到证明。她把自己生活的热带地区的黑夜比作“单人牢房”(20), 而把皮普的世界视为一个自由的世界, 尝试在其中体验皮普的喜怒哀乐。显然, 在代表美拉尼西亚文化的祖先谱系与代表英国文化的皮普之间, 玛蒂尔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到了中期, 玛蒂尔达内心的天平逐渐向本土文化倾斜, 开始接受本土文化, 质疑英国文化。读完《远大前程》后, 她对皮普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很多疑惑, 比如皮普“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汉德尔”(59)。瓦兹先生给出的解释是: 皮普改名有助于开启新的生活。然而玛蒂尔达并不理解这个理由。事实上她之所以对皮普改名表示质疑, 是因为无法接受与人名相关的外来文化。对美拉尼西亚人来说, 改名意味着对家族的背叛, 因为名字关乎家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就此, 希勒认为: “依据霍米·巴巴的论点, 《皮普先生》展示的不是殖民主体对帝国主义叙事不加批判的吸收, 他所揭示的是岛民与文本的相互接触, 以保持文本的鲜活可变。”(98)

与此同时, 玛蒂尔达逐渐接受本土文化, 并对代表本土文化的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得知母亲私藏《远大前程》时, 曾经嫌弃母亲的玛蒂尔达放下了之前的芥蒂, 暗自保守秘密。在瓦兹劝说自己离开海岛时, 玛蒂尔达态度极为坚定, 她表示要与母亲共进退。最后, 当母亲因不惧政府军威胁说出自己是暴行见证人而遭到侮辱、接着为保护玛蒂尔达而惨死时, 玛蒂尔达对母亲的怨言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莫大的敬意。从母亲的行为中, 她领悟到“绅士”与性别无关, 应该用“中性的‘有道德的人’”(Uggla 14) 来代替专门用于形容男性的“绅士”。玛蒂尔达为此前的行为懊悔不已。此后, 她总是不时想起母亲。在父亲的新女友提及母亲时, 玛蒂尔达这样说道: “她这个女人非常勇敢, 最为勇敢。”(琼斯 195)

在文化身份建构后期, 尤其在她前往英国搜寻关于狄更斯的资料之后, 玛蒂尔达的内心完全偏离英国文化。在研读了关于狄更斯的资料、得知对孤儿心怀怜悯的狄更斯曾无情地把亲生子女赶出家门这一情况后, 她一方面为自己心中“美好英国世界”的崩塌而伤心不已, 另一方面又为孤儿的悲惨命运而哀叹连连。令她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孤儿博物馆之行, 她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母亲排队把孩子送往孤儿院的照片及一些用来让孤儿记住母亲的毫无意义的纪念品。这些令人心寒的画面真切地发生在她曾心驰神往的伦敦。她不禁想到曾被自己鄙夷的母亲临死前的场景: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女儿的安危, 叮嘱其对所见之事保持沉默。这一鲜明对比, 让她深刻意识到自己之前崇拜的英国文化不是最终归属。小说最后, 玛蒂尔达前往英国拜访了《远大前程》提及的地点格雷夫森德, 表达了对自己作为《远大前程》传承者身份的肯定, 但与此同时也表示此后不再喜爱《远大前程》中的人物。在了解关于瓦兹的更多细节之后, 玛蒂尔达发现这个白人教师对她而言依然扑朔迷离。至此, 英国文化的魔力被祛除殆尽, 本土文化的魅力则愈加凸显。

玛蒂尔达最终决定回归本土文化，其回归首先表现为对母亲的思念。在远离布干维尔的日子里，玛蒂尔达把母亲放进自己头脑中的一间小屋子。这间小屋子不仅装满了对母亲的记忆与思念，而且还承载着对本土文化的特殊情感。她最终放弃狄更斯研究，转而书写母女两人的海岛经历。威尔森认为：“这个转变意味着她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变为一种重建——也就是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230）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经过一场狄更斯文化之旅后，玛蒂尔达做出返回家乡的决定。她的“回家”意愿隐喻了新一代文化身份建构者最终的文化选择：回归本土。关于这一点，劳恩（Jennifer Lawn）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玛蒂尔达的空间循环旅程（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经由澳大利亚汤斯维尔到新西兰惠灵顿，再到英国伦敦，最后又返回家乡布干维尔）展示了她的情感循环（从付出到回报），在这种循环中，她的心智得到发育并逐渐走向成熟。”（157）除了心智的成熟，玛蒂尔达的回归还标志着新的杂糅文化身份得到成功建构。

通过对玛蒂尔达在不同文化间的取舍游离进行书写，琼斯暗示新一代美拉尼西亚人建构文化身份时会遇到的矛盾与迷茫。当然，琼斯塑造的玛蒂尔达传承多元文化后回归本土，这也是作者为新时期文化身份建构绘制的一幅蓝图。希勒指出：“玛蒂尔达表现的杂糅性象征着西蒙·基坎迪追求的一种新后殖民主义。这种后殖民主义回避了殖民地与中心，家园和流亡之间的传统对抗，转而支持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身份认同。”（98）

进入21世纪后，新西兰文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文学不再眷恋‘本土’，而大步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化”（虞建华2）。许多新西兰作家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后殖民概念框定的创作领域之内，而是尝试书写全球文学，彰显新西兰人对全球治理和南半球太平洋岛国事务的关注。琼斯的《皮普先生》正是新西兰文学从后殖民时期跨入全球化时期后涌现的一部杰作。通过瓦兹、德劳瑞丝和玛蒂尔达这三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在共同空间中找寻自己身份的故事，《皮普先生》回应了在文化进一步走向多元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如何确立认同、建构身份的问题。虽然视线投向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内战，但作为新西兰作家的琼斯显然并非单纯地讲述一个与新西兰毫不相干的异国故事。“身在布干维尔岛的琼斯密切关注着太平洋的其他地域，严肃地思索它们与新西兰的经历有何相似和相异之处”（Birns 126）。诚哉斯言！南太平洋布干维尔岛原住民从捍卫本土文化到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历程与新西兰的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相似之处。《皮普先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并为全球化时代新西兰不同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shcroft, B.,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Translated by Yiming Ren, Peking UP, 2014. [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Birns, Nicholas. "Marvellous Year? Four New Zealand Novels of 2005-2006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Literary Culture." *Journal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no. 1, 2020, pp. 105-38.
- Butter, Stella. "The Literary Making of Home (Land): Transnational Fictions of Home in Lloyd Jones's *Mister Pip*."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Cultures*, no. 2, 2014, pp. 119-37.
- Dejonge, Ryan. "What is Melanesian Culture?" 2021. acrossculture.net/2016/11/17/what-is-melanesian-culture/#:~:text=Melanesia%20was%20and%20remains%20an%20oral%20culture%20rather,striking%20features%20of%20Melanesia%20is%20its%20linguistic%20diversity.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ulture Studies Reader." *Culture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Gang Luo and Xiangyu Liu,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pp. 208-23. [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08-23页。]
- Jones, Lloyd. *Mister Pip*. Translated by Qing Sh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0. [琼斯:《皮普先生》,石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Latham, Monica. "Bringing Newness to the World: Lloyd Jones's 'Pacific Version of *Great Expectations*.'" *Dickens Quarterly*, no. 1, 2011, pp. 22-40.
- Lawn, Jennifer. "What the Dickens: Storytelling and Intertextuality in Lloyd Jones' *Mister Pip*." *Floating Worlds: Essays on Contemporary New Zealand Fiction*, edited by A. Jackson and J. Stafford, Victoria UP, 2009, pp. 142-63.
- Łyczkowski, Rafał. "Literature That Saves: Matilda as a Reader of *Great Expectations* in *Mister Pip* by Lloyd Jones." *Text Matters*, no. 7, 2017, pp. 416-27.
- NorrIDGE, Zoë. "From Wellington to Bougainville: Migrating Meanings and the Joys of Approximation in Lloyd Jones' *Mister Pip*."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no. 1, 2010, pp. 57-74.
- Shiller, Dana. "The Pleasures and Limits of Dickensian Plot, or 'I Have Met Mr. Dickens, and This is Not Him.'" *Neo-Victorian Studies*, no. 2, 2012, pp. 84-103.
- Токарев, С. А., and С. П. Толстов, editors. *The Peoples of Australia and Oceania*. Translated by Yifu Li, et a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李毅夫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 Uggl, Fredrika. *Picking up Threads: Intertextuality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of Lloyd Jones' Mister Pip*. Diss. Lund University, 2012.
- Wadoux, Charlotte. "The World Had Forgotten about Us: Heterotopian Resistance in Richard Flanagan's *Wanting* and Lloyd Jones's *Mister Pip*." *Humanities*, no. 1, 2022, pp. 1-15.
- Wilson, Janet M. "Antipodean Rewritings of *Great Expectations*: Peter Carey's *Jack Maggs* (1997) and Lloyd Jones's *Mister Pip* (2007)." *The Shadow of the Precursor*, edited by D. Glenn, et al.,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p. 220-35.
- Yu, Jianhua. "Contemporary New Zealand Literature: From Nostalgia for Home to Globalization." *Wenyibao*, 20 Dec. 2013. [虞建华:《当代新西兰文学:由眷恋本土到走向全球化》,载《文艺报》2013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夏开伟

FLC

文学文化研究

不可言说的情爱 ——论《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道德焦虑

◎ 郭艳雯

内容提要: 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极力展现了求爱的繁复心理过程。然而诗歌中被求爱的女性身份不明,且其真实在场的可能性十分可疑。主人公普鲁弗洛克明显表达了对女性的真实欲望,但是面对道德的拷问,作者巧妙地借由狂放想象的方式填补情歌中心的空白、帮助主人公解脱身体的痛苦及规避社会道德的评判。同时,借助普鲁弗洛克代理人的身份,艾略特融合个人的身体认知、心理现实和家庭渊源传达了道德焦虑的心声。

关键词: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T.S.艾略特 不可言说的情爱 道德焦虑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2-003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空间诗学”(07JC75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4

Title: Ineffable Desire: On Ethical Anxiety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Abstract: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shows the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ourtship. However, the unidentified woman in the poem possibly lacks the reality of presence, while Prufrock obviously shows his sexual desire for women. Yet facing with the ethical dilemma, the poet Eliot skillfully fills the central void of his love song, relieves Prufrock’s body pain and helps him escape from social conventions by means of rhapsody. While using Prufrock as his agent, Eliot integrates embodied cognition on the body,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to express his ethical anxiety.

Keyword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T. S. Eliot, ineffable desire, ethical anxiety

Author: Yanwen Guo,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T.S. 艾略特早在 1910 年哈佛大学读书时便开始创作《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情歌》)。该诗大约完成于 1911 年,首次公开发表于 1915 年,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普鲁弗洛克的中年男人意欲求爱却反复犹豫的心理过程。这首风格怪异的诗歌也成为艾略特的代表作之一。根据“《情歌》的手稿显示它在出版前还有一个副标题,《女人们中间的普鲁弗洛克》,这个副标题似乎点明了诗歌的主题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赵晶 71),这首诗也应当要讲述关于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和女人之间的种种。然而该诗名为情歌,实则奇特,一经发表,外界也褒贬不一。1915 年该诗发表后,辛克莱(May Sinclair)即尖锐指出:“艾略特所描述的现实是剥离了所有溢美之词,所有粉饰,所有古怪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联想(的现实)。”(转引自赵晶 67)辛克莱认为该诗仅为联想的现实,也即认为诗中事件可能并未真实发生。的确,情歌的接收者“女人”的真实在场性和真实身份迷雾重重,情歌发出者普鲁弗洛克很可能并未付出任何实际行动,情歌似乎是一个不可言明的秘密,这份情爱也似乎难以被社会接受。可见求爱发生的真实性可疑,所有事件的发生地都在普鲁弗洛克的想象中。

作为该诗的作者,艾略特虽然极力提倡“非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论,认为“诗歌并非个性的表达,而是个性的摆脱”(Selden et al. 16),但是艾略特本人似乎与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难以在作品中实现自我个性的超脱。1962 年,艾略特在《花岗岩评论》(Granite Review)的采访中谈及普鲁弗洛克:“一方面,作为被创作的诗歌人物,普鲁弗洛克是个大约年近 40 岁的中年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个人情感的发言人[……]我总认为被创作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创作者本人有共同之处。”(转引自 Miller 154)由此可知,艾略特在该诗中保留了丰富的个人情感色彩和个人经验,并直接选取普鲁弗洛克作为个人情感的发言人。通过普鲁弗洛克的身心,艾略特间接传达他本人的真实心路历程。同样地,普鲁弗洛克的性欲望与道德碰撞的心理活动也真实映射了艾略特的心理现实。

一、女性的身份匡测与不在场

作为本应献给女性的求爱诗,《情歌》中的女性形象却凌乱无序,身份不明,缺乏真实存在性。针对诗中被求爱的女性身份,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英国艾略特专家平克尼(Tony Pinkney)认为,《情歌》中女人们穿透式的眼睛与站在角落里的妓女的眼神遥遥和应(30),意指《情歌》中女性的身份难为社会接纳与尊重。国内学者北塔通过“women”的用词玩味和艾略特选词的审慎态度,提出:“艾略特没有用‘the ladies’。而用‘the women’,可能就是为了表明她们并非具有比较高的社会身份[……]在 1910 年代,尤其是在比较保守的艾略特的文字中,他不会随便弄混这两个概念。”(79)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

女性意指得体的中产阶级的女士（赵晶 83）。其实，这些“谈着画家米开朗琪罗”的女人们附庸高雅文化，言行轻佻，外在选择标准挑剔，内在道德底线松懈，似乎难称风雅。她们即便身处富足的中产阶级，其行为表现也昭示着其不可言说的欲望中冲破道德壁垒的心理渴望。

诗歌第一节中提到的“手术台上”“人声嗡嗡然的投宿处”“只住一晚的旅舍”“满地铺满锯木屑的小饭馆”（《诗选》2），这些或隐蔽无闻或脏乱差的空间形象，既呼应着女性内心空间中的灰暗现实，也应和着艾略特本人对诗中女性身份的某种认知和个人判断，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极其对应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存在现状：

妓院和诊所都是这种宽容之所：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的歇斯底里病人[……]只有在这里，放荡的性才有权以各种真实的、但又孤立的方式出现[……]现代主义清教主义还到处强迫人们遵守它的三项律令：即禁止、否认不正当的性活动，对性活动本身也要默不作声。（福柯 4）

总结可见，无论是诗中女性可能的妓女身份，还是社会对性欲望的公开规避，都似乎说明了女性的真实在场性并不明朗和女性的身份扑朔迷离。性欲望与社会道德间矛盾重重，关系紧张，一触即发，对立而成无形的悖论张力。

从诗题来看，作为被求爱的女性本应占据中心在场位置，然而全诗中“women”仅出现过两次，意指“women”的代词“they”“them”“one”也只出现过八次。更有甚者，全诗直接提及女性的场景仅有两处：“在屋里妇女们来来去去，谈论着米开朗琪罗。”（《诗选》2, 3）这两句诗来回共出现两次，经过重复性的对女性信息的直接告知，似乎准确指认了女性的在场，营造出女性的真实在场感。从始至终女性多以暗指或侧指的闪现方式出场，极少被正面聚焦、着墨和停笔，很难构成女性的真实在场。即便女性形象的短暂描述在全诗中占比寥寥，屈指可数，却总能在诗中嗅寻到女性的踪迹。作为情歌接收者的“女性”始终是个身份不明的人物幻影，她的侧面化形象呈现出非主体化的状态。这种对女性模糊的边缘化、侧面化叙述已经使女人在场的中心位置和事实性被替换和迁移，并暗中置换了读者的阅读焦点，造成阅读外观上的梦幻感，导致真实的女人沦为“女人”外观的存在幻觉。平克尼也认为《情歌》存在中心缺失的现象，然而艾略特却巧妙地借助自我的狂放想象填补了诗歌中心的空白（31）。本应作为中心人物的女人，却被普鲁弗洛克的自我想象替换在场。这种女人的在场方式实质上只是一场存在幻觉，既表明求爱对象的实质空位，也说明普鲁弗洛克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人物。

女性为什么无法真实在场呢？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身为男性，普鲁弗洛克的性欲望明明已经欲盖弥彰，他对真实女性的欲望幻想也伺伏已久：“被纤长的手指安抚过，/睡着了

[……] 或者它在装病, / 卧倒在地板上, 在你我身旁, ” “假如这人把枕头枕好或脱掉披肩。” (《诗选》6, 8) 诗句自然披露出柔弱无骨、温柔暧昧的女性形象, 却从未正面聚焦女性的样貌、品性等具体的私人化特征, 只是以意指女性的方式切割女性形象的完整性, 非自然地迫使女性形象无序又不间断地错落出场, 生硬地推动女性形象混同于普鲁弗洛克流动的心理狂想中的自由移位, 着力营造出女性的存在幻觉, 制造出如假包换的女性在场错觉。

这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似乎确有深意。普鲁弗洛克着装得体、知识渊博, 却羞耻于自己别扭的身体: “我早上穿的外套, 我的硬领笔挺地托住下巴, / 我的领带华丽又绝不刺眼, 但为一只朴素的别针固定住——” (4) 他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 一方面体现出他的身体焦虑, 另一方面表明了普鲁弗洛克在以外的社会地位与知识修养为掩体, 来紧张不安地遮饰道德束缚下蠢蠢欲动的欲望。女人的存在幻觉意味着普鲁弗洛克只是意淫女人身体的形象外观, 而非实在地侵犯真实的女性身体, 从而避免侵犯的事实发生, 极其隐匿地摆脱社会的道德污名。因为在西方文化中, 性是个人的私事, 普鲁弗洛克作为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人物化身 (Hidayat 315), 根本没有勇气突破这层文化防线。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之后, “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 [……] 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 [……] 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 它既实用, 又丰富。除此之外, 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 (福柯 3)。虽然性在现实中被真实需求, 却因为集约性地避讳不提成为社会性的灰色话题, 可随意想象而不可任意获取。因此, 普鲁弗洛克即使有强烈的身体欲望, 但是为了逃避来自现实中他人真实的道德批判, 选择沉浸在自我的幻想中, 并在心理道德的拷问下策略性地选择规避。西格 (Eric Sigg) 也认为普鲁弗洛克为了阻断置身于毁灭性批判的现实可能性之中, 选择继续停留于自己古怪的自我欺骗中, 并通过戏仿式反讽和自我沉浸式幻想这两种方式逃避现实 (95)。

二、女性身体的缺失

除却女性的不在场, 关于女性属下身体描述的缺失同样引人注目。纵瞰全诗, 不难发现诗中展现的女性只有其属上身体的指涉: 手指、胳膊、茸毛、嘴巴 (“她们说”)、眼睛: “我已经熟悉了这些胳膊, 都熟悉了——/ 戴镯子的, 雪白的, 赤裸的胳膊, / [但是在灯光下, 一层浅褐色的茸毛!] / 是衣裙上的香味 / 使我说走了题? / 放在桌上或是裹在披肩里的胳膊。” (《诗选》5) 从戴着镯子的胳膊到微细的体毛, 从胳膊雪白的肤色到干净的肌底, 诗歌对女性的属上身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画, 呈现出不可详述的想象画面。然而, 诗人停笔至此, 戛然而止, 不敢继续深入幻想。如此公然坦露的暗示, 却只敢把笔触停留在女人的属上身体, 女性属下身体仿佛不存在一样。 “同时我们注意到普鲁弗洛克意识中的女性没有

完整的形象。他所描述的女性总是以支离破碎的形象出现，他关注的似乎只是女性的部分躯体，对完整的女性缺乏认识”（赵晶 76）。普鲁弗洛克的头脑中只有女性的属上身体，没有女性的属下身体，这种行为不仅进一步遮蔽了女性的实质性存在，而且还以男性自我膨胀的欲望窃据了女性的身体，抹杀了女性自主的身体话语，消除了不依附男性视角存在的女性身体的独立性。他对女性身体的不完整表述，似乎是对女性身体认知的残缺不足，这背后也应渗透着男性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别样认知。

普鲁弗洛克对女性身体的残缺认知大致表明了以作者艾略特为代表的知识男性对女性的身体认知。据考证，女性身体的污名化由来已久，“在古代许多民族的文化中，女人和性欲、罪恶、令人致命的深渊紧紧地联系起来，并且从本能的对魔法的恐惧转化为伦理标准，影响着所有的西方文明”（刘达临 183）。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精神错乱的李尔王疯狂地吐露内心积郁的愤怒：“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525）比起李尔王对女性身体大胆直白的激言烈语式批判，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独白显得懦弱畏缩且隐晦暧昧。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鲁弗洛克小心翼翼的情歌独白中，女性的属下身体同样受到男性目光的直白审视和男性视角的恶俗看待。两片式的“牡蛎壳”（oyster-shells）、“排水沟的潭潭”（the pools that stands in drains）和“大海”（the ocean）意指女性的属下身体器官。引人深思的是，这些属下身体的描述通常出现在脏乱差的低劣环境中，且只能以意指的方式隐晦表达；而属上身体的描述却通常出现在体面气派的高雅环境中，却能以大胆的目光进行细节性的仔细刻画。其中寓意，值得深思。

女性的属下身体本是男性欲望的源泉，却遭到男性的恶俗看待，这种既冷漠贬斥又无比渴望的矛盾态度不仅拧巴痛苦而且又在无形拉扯着道德意识浓厚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内在空间。别有深意的是，对女性属下身体的渴望背后可能藏有男性为自我的男性气质和社会性别正名的意图。在男性主导的性话语权视阈下，作为被意淫对象的女性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以男性为主的性文化是男性企图用性把女性占为既有财产的表现，是西方古代社会的遗留物。在古希腊时期，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公民地位都极端低下，因此男性渴望通过建立和维护性别分界来稳固自己的男性气质。男性的性别身份是脆弱的，男性气质不是建立在男性身体的基础上（因为认为男性的身体是不稳定的，有随时滑向女性气质的危险），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体现男性气质的侵略行为来实现，其中也包括性行为。为了维护男性气质不被侵犯，男性在性关系中的表现是最关键的，他的性欲望则不那么重要。性能力低下常常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耻辱丧失，也常常被小说和戏剧拿

来作为笑料。(莫捷 8)

简言之,男性性别身份的确认需要其性能力的证明,这也是其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普鲁弗洛克任由自己的男性气质滑向女性气质,就会加剧他的身体羞耻感,也会危及他在社会公众视野下的性别身份认知。

普鲁弗洛克对女性的属下身体存在典型的男性认知,这种认知自有的矛盾是他身体痛苦的根源所在。性所遭到的集体消极认知和公开禁忌给他造成隐形的心理道德焦虑,令他无法直面现实。库伯(John Cooper)就认为,《情歌》和《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一样属于心理道德(psichoethical)的领域,但前者指涉更为深刻久远(48)。作为艾略特情感的发言人,普鲁弗洛克承受着社会道德与个体责任的双重考验,并在自我的身体情欲与社会道德的反复周旋中陷入了道德焦虑的困境。这种矛盾的境地正如国内知名的艾略特研究学者张剑所言:

普鲁弗洛克是在一种道德的选择中挣扎,他的清教思想使他把男女关系视为一种罪恶,他的肉体又偏偏迫使他去追求这种关系。[……]实际上,恋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而上升为一个宗教和伦理的问题,一个使他不知所措的“重大的问题”。(《诗歌和戏剧的解读》37)

然而,这个问题既无法开口倾诉,也难以被实际解决。《情歌》从普鲁弗洛克的心理层面反映了艾略特本人的现实。作为艾略特的代理人,普鲁弗洛克表达的应该是艾略特的内心现实。1914年,在写给好友艾肯(Conrad Aiken)的信中,艾略特明确地表示自己很想与一些女性有亲密交往(59)。这不仅与他当时的学习环境缺乏女性有关,也是他个人需求的真实表达。可是艾略特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从未迈出任何实质性的一步。事实上,“如果艾略特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机会显然是有的’。但是艾略特本人的家庭教养和个人性格显然又不可能允许他如此放纵自己,因此,他就不得不忍受自己欲望的折磨,以至于连他的字体都发生了改变”(赵晶 35)。

除却个人因素,艾略特家族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艾略特对女性身体的态度(85)。艾略特曾写道:“文化的首要载体是家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早年的教养,也没有有什么能超越它给人的影响。”(转引自戈登 19)艾略特对女性的认知的确离不开个人家庭环境的影响。

亨利·韦尔·艾略特(艾略特的父亲)深受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艾略特的祖父)宗教思想的影响,把性看成是一种罪,在给自已的兄长托马斯·兰姆·艾略特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任何性病都无法唤起我的一丝同情,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道德衰退。我不赞同针

对公众的性交指导，我希望人们永远找不到治疗梅毒的方法，因为那是上帝对不道德的两性关系的惩罚。”（Miller 16）威廉·艾略特对整个艾略特家庭的精神影响深远，对此艾略特也认同：“他在我们的成长中无处不在，我们的行为标准是祖父定下的：他为我们立下道德准绳，在责任和自我放纵之间早为我们做好抉择，祖父就好像把刻在石板上的律法传承下来的摩西，任何对他的违背都是犯罪。”（转引自戈登 15）这种来自美国家庭的精神渊源对艾略特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诗歌从情感起源来看，更为美国而非英国（何宁 121）。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类似严苛的美国清教徒式的性观念也成为艾略特家传承的道德枷锁，他在“一种道德的选择中挣扎，他的清教思想使他把男女关系视为一种罪恶，他的肉体又偏偏迫使他去追求这种关系。他的灵魂渴望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满足”（张剑，《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81）。

三、女性的真实身份探究

《情歌》中女性的身份叵测与不在场和女性属下身体的缺失意味着女性真实身份的不被接受，同时代表着在男性的话语场内，女性被抹去了性能力，被贴上了消极的性标签，被置换为男性天然的附属品。可是普鲁弗洛克所意欲求爱的女性真的只是内在的幻想吗？这首求爱歌真的只是诗人自恋式的内在自我博弈吗？“女性”真实身份的完全遮掩意味着其身份的无法言明，而普鲁弗洛克的道德规避和心理道德焦虑更加说明其身份的神秘叵测。

从整首诗中主人公犹豫延宕的心理活动来看，艾略特具有典型的女性气质，他自身也产生了男性气质滑落的危机意识。荣格将这种男性身上体现的女性气质称为“阿尼玛原型”。诗中的“女性”可能是艾略特自身女性气质的外在投射，也可能是艾略特在文化沙龙中见过的那些谈论米开朗琪罗的女士们（张剑，《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77），但更有可能是他自身“俄狄浦斯情结”的隐喻，即艾略特本人对母亲的性渴望的隐匿外化。据考证，艾略特与母亲斯特恩斯（Charlotte Champe Stearns）的感情颇深，从小与母亲关系十分紧密，并在远离美国时仍然与母亲保持书信来往。“现有资料里，艾略特最热烈的情感表达来自一本《联邦群像》的扉页，他将这本书‘连同无穷的爱’送给他的母亲”（转引自戈登 8）。因为患有先天双疝，相较家里其他的孩子，年纪最小的艾略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备受母亲的关心和呵护，成年后的艾略特最初对女人的想象大多来自母亲夏洛特。而在艾略特完成《情歌》全诗的过程中，“艾略特不但思想逐渐成形，而且性意识逐渐苏醒”（张剑，《诗歌和戏剧的解读》28）。可能正是这种大逆不道的性渴望才使普鲁弗洛克发出疑问“我有无勇气/敢打扰这个宇宙？”（《诗选》4）同时，作为被求爱对象的女性的事实性不在场，也反向证明一般社会认知对他欲求爱的女性身份的拒绝接受。

艾略特意识到自己在情感上十分依赖母亲夏洛特，他“在皈依之际曾告诉母亲：‘我坚信我们之间了解与相像的程度之深，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也坚信我们（在来生）一定还会相见’”（转引自戈登 11）。这种母子情深的无意识情感依恋，构成了艾略特早期个人情感的主要来源。而在母亲的女性形象面前，艾略特是一个沉湎于母怀的儿童。拉康认为，“儿童的能指符号中，男性生殖器（phallus）是‘共相’（universal）超验能指；它指的不是性器官，而是‘转喻存在’，表明或缺与不在场，即欲望的永不可达”（转引自朱刚 151）。在艾略特儿童式欲望的误投认知中，其欲望所指是注定被终生压抑的。因而，他注定沦陷在内心不断的思想斗争中，而“这种内心的思想斗争通过演变、上升，最终转化成为一种道德的选择，一种宗教和世界观的取舍，一个使他不知所措的‘重大的问题’”（张剑，《诗歌和戏剧的解读》27）。

作为艾略特的代言人，普鲁弗洛克做出的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缺乏功用性的道德良知，更不知道如何将这种道德良知应用在现实和重大情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他问自己敢不敢扰乱整个宇宙，却明显缺乏勇气去做这件事，尽管用了“祈祷、哭泣、禁食”这些神圣的仪式，依然纠缠于死亡的梦魇（Sigg 91）。尽管普鲁弗洛克有高尚的道德意识，但因为缺乏具体的社会方法论指导，依旧陷入了道德焦虑状态。据《情歌》的手稿显示，“这首诗歌原来的题词来自但丁的《神曲·炼狱篇》，阿诺特·丹尼尔说，他是意大利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的爱情诗人，深受但丁的崇拜。阿诺特被但丁置于炼狱是由于他不能在人性律法的约束下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才受到惩处（赵晶 71）。原先的题词不仅映射了普鲁弗洛克可能有同样的心理欲望，并以预言再现的方式警示了前人的教训。以普鲁弗洛克广博的知识素养和知识分子的自觉精神来看，他难以对此置若罔闻。因为在这场自导自演的独白剧中，普鲁弗洛克不仅是“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也是这个角色的观察者和评论者”（张剑，《诗歌和戏剧的解读》34）。

不幸的是，普鲁弗洛克强烈的欲望和现实的无能是并行的矛盾存在。“带着我头发中心的那个秃顶——/[她们会说：“他的头发真是愈来愈稀薄了！”]/……[她们会说：“可是他的胳膊腿真的瘦了！”]（《诗选》4）“秃头、稀疏的头发、细瘦的四肢”这些身体生理特征，至少证明主人公既非身强力壮、心志开朗的男人，也难以成为受时下女士欢迎的优选男士，更缺乏求爱场中的男性吸引力。他如此消极的自我形象认知也在反向印证着一切只是心理上的冲动式形象意淫，而绝非真正地做出任何行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缓解真实欲望压力和道德焦虑的一个出口。“你有时间我也有时间，/ 还有时间犹疑一百遍，/ 看见并修改一百种想象中的景象”（3）。时间不仅容纳了普鲁弗洛克忍耐的耐心，还暂时性地疏泄了他在现实中所承受的沉重的身心压力，他自己能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心境之中[……]暂时能够走出痛苦而感到轻松自如”（张剑，《诗歌和戏剧的解读》31），并给予了他修正原先可能的违背道德伦理的选择。

在艾略特的情歌国度里，普鲁弗洛克表面为王，实际为欲望之囚徒。在女性实际缺场的男性话语场内，代言人普鲁弗洛克在整体性欲膨胀和欲望误投的社会环境中引发了道德焦虑。诗歌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无声的，自始至终的心理独白意味着社会规约下实际的语言无能与话语权失效。普鲁弗洛克是艾略特的情感发言人，这无疑也是艾略特家庭背景和教育成长历程孵化的矛盾产物，更是维多利亚时代性伦理的积弊残留与延伸。因此，与其说情歌这种表达方式是浪漫主义的遗风，不如说是用最浪漫的方式揭露最隐蔽的内心现实。

普鲁弗洛克独白式的心理幻想活动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借助普鲁弗洛克的心理活动，艾略特极为保守地指向了一个社会避讳的性伦理问题。然而，性与我们的社会始终息息相关。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道：“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转引自余碧平²）但是现代社会的物质繁荣与财富积累一方面压抑、助长与繁殖了现代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未能带动新的性伦理产生。由性欲所牵涉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这提醒着大众再度审视欲望与道德密切关系的重要性和正确对待性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由性力驱动的心理现象，健康人通过欲望与欲望满足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但拉康认为欲望代表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但由于俄狄浦斯阶段以及‘镜子阶段’（mirror stage）使人产生心理断裂，所以人永远无法满足欲望，无法达到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朱刚 151）。欲望的满足或永不可满足根本指示的是道德的方向和人的生存本源，这渗透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当代社会应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面对性伦理与性道德的相关问题，并推动产生与时俱进的健康的性道德伦理，从而使人的幸福真实地寓居在身体之内和身体之外。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i, Ta.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of Two Key Lines in T. S. Eliot's *The Love-song of J. Alfred Pruföck*." *Yue Hai Feng*, no. 6, 2017, pp. 78-81. [北塔:《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关键两行诗的理解及其翻译》,载《粤海风》2017年第6期,第78-81页。]
- Cooper, John Xiro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 S. Eliot*. Cambridge UP, 2006.
- Eliot, T. S. *The Wasteland: T. S. Eliot's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Luorui Zhao.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6. [艾略特:《荒原:艾略特诗选》,赵萝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Eliot, Valerie, editor. *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Volume 1: 1898-1922*. Faber and Faber, 1988.
-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Sexual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Biping 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6. [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Gordon, Lyndall. *The Imperfect Life of T. S. Eliot*. Translated by Xiaofan Xu.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2019. [戈登:《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许小凡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 He, Ning. "The American T. S. Eliot."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00, pp. 120-24. [何宁:《T.S. 艾略特的美国性》,载《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第120-24页。]

- Hidayat, Bernadus. "Body Parts, Sex, and Landscapes: An Explication of Eliot's Symbolism in *The Love-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Humaniora*, vol. 21, no. 3, 2009, pp. 310-21.
- Liu, Dalin. *Sexual Behavior in Ancient World*.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Miller, James E. Jr. *T. S. Elio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e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P, 2005.
- Mottier, Veronique. *Sexuality*. Translated by Lu Liu. Yilin Press, 2015. [莫捷:《性存在》,刘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Pinkney, Tony. *Women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Macmillan Press, 1984.
- Selden, Raman, et al.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ifth edition). Pearson Longman, 2005.
- Shakespeare, William. "King Lear."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Vol. 5*, translated by Shenghao Zhu, proofread by Ping Fa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1994, pp. 423-551. [莎士比亚:《李尔王》,载朱生豪译、方平校《莎士比亚全集(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423-551页。]
- She, Bipin. "Introduction in Revised Edition." *History of Sextual Experience*, by Michel Foucault, foreword by Bipin 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6, pp. 1-6. [余碧平:《译者前言》,载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6页]
- Sigg, Eric. *The American T. S. Eliot: A Study of the Early Writings*. Cambridge UP, 2009.
- Zhang, Jian. "A Tragedy Full of Comic Effect: An Analysis of Eliot's *J. Alfred Prufrock's Love Song*."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1, 1997, pp. 77-81. [张剑:《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析艾略特〈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载《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第77-81页。]
- . *T. S. Eliot: A Reading of His Poems and Play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张剑:《T. S. 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Zhao, Jing. *Alie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T. S. Eliot's Poetr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5. [赵晶:《艾略特:诗歌中两性关系的异化与重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Zhu, Gang.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eking UP, 2006.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夏开伟

“奈保尔谬误”的再审视 ——以《河湾》中的后殖民书写为例

◎ 华雨晨

内容提要: 作为后殖民文学经典的《河湾》，集中体现了文学评介中“奈保尔谬误”的争议与矛盾。本文运用霍米·巴巴的“双重视界”理论对小说叙事者萨林姆进行观照，客观审视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双重欲望的交错，展现出一种审慎的文学伦理距离。在文化混杂的后殖民社会，这种边缘性视野突破了用单一眼光看待事物的霸道方式，避免了两极对立和二元分割的狭隘手段，具备一种本土世界主义的关怀，成为重构“奈保尔谬误”，反思作家后殖民书写的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 《河湾》 V. S. 奈保尔 霍米·巴巴 双重视界 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44-10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江苏 210024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5

Title: A Review of “the Naipaul Fallacy”: Post-colonial Writing in *A Bend in the River*

Abstract: *A Bend in the River*, as a post-colonial literary canon, epitomizes the literary controversy of “the Naipaul Fallacy.” The main narrator Salim has “double vision” in the sense of Homi Bhabha, through whose perspective the dual desires of colonial empire and nation state are presented objectively in the decolonization movement of Africa, displaying prudent literary ethics. In the post-colonial society with cultural hybridity, the double vision breaks discourse hegemony and binary opposi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embodying a concern of “vernacular cosmopolitan”,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ipaul Fallacy” and reexamination of Naipaul’s post-colonial writing.

Keywords: *A Bend in the River*, V. S. Naipaul, Homi Bhabha, double vision, post-colonial

Author: Yuchen 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印裔英籍移民作家V. S. 奈保尔 (V. S. Naipaul) 的文学创作与后殖民主义关系密切。客观而言,奈保尔的人生历程与后殖民文化境遇高度交叠。他的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其故国印度于1947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出生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则于1962年走上独立之路。奈保尔在其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关系,后殖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文化冲突,种族矛盾,移民生存等诸多议题抽象化为文学思辨,呈现于作品之中。奈保尔对第三世界国家状况极其细腻的文学观照,使之成为“最初的所谓‘英联邦文学’以及现在的后殖民文学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Richetti et al. 652)。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奈保尔的文学评介,学界中一直存在一种悖论性现象:他一方面被视为后殖民作家中永远可以被指望能够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另一方面却屡屡受到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指摘。其小说《河湾》作为后殖民文学之典范,集中体现了这种争议和矛盾。

《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的非洲小镇是一个充斥着隐喻色彩的空间,承载着复杂多元的意义:它是殖民统治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废墟,叛乱杀戮频仍的凶险之所,“大人物”宰治下的虚假繁荣之地。奈保尔借助叙述者萨林姆之眼,展现了非洲从殖民时代走向独立时期的政治变迁中的多元危机与困境,呈现出去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欲望的交错。在双重欲望书写之间,读者的阅读期待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作品的评判,使之得出倾向性的结论。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小说有“严重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幻觉”(《文化与帝国主义》12),而拉贾(Massod Raja)指出奈保尔像世界主义者一般,为读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被湮没人民的内部视角”(235)。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十分精确地表述了此类“奈保尔谬误”^[1],指出奈保尔“有关第三世界历史的看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愤怒,一如他对后殖民社会生活世界细致、尖锐、令人惊异的洞见一样。人们也许很容易对前者进行谴责而对后者加以赞赏”(“Adagio”373)。为解开“奈保尔谬误”之谜,本文以巴巴的“双重视界(double vision)”^[2]理论对《河湾》中的叙事者进行观照,重新审视奈保尔的后殖民书写,以期还原文学文本所包含的复杂意蕴。

一、帝国的幽灵:殖民主义的在场

小说叙述者萨林姆同作家本人一样具备多重文化身份背景。他生于穆斯林家庭,随着祖先从印度的西北部移居到人种混杂的非洲东海岸,从小接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移民身份使他从未完全归属于任何一方文化,由此萨林姆获得了“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3](15)的局外人视角,得以全面、客观地观察周遭环境。小说始于萨林姆接手那扎努丁在河湾小镇处的杂货店,他意识到“新的历史潮流”即将到来,故而在焦虑的啜噬中逃离非洲东海岸,前往内陆腹地。此时,小镇所属的国家在“第二次反叛”中脱离了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规训。在《东方学》

(*Orientalism*) 中, 萨义德明确地指出, 东方的建构基于二元对立的等级制结构。在此结构中, 西方被视为文明、进步、理性的化身, 而东方则与之相反, 是野蛮、堕落、非理性的代表。因此, 被建构的被殖民者处于“他者”的绝对劣势地位, “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重复和力量[……]在对所有这些功能进行描述时, 经常只需使用一个简单的系词: 是”(92-93), 盲目认同西方主导话语。这种“文化的暴力”既为西方殖民统治的道德合法化作无罪辩护, 又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殖民地的观念、信仰和制度中, 成为非洲被殖民者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在《河湾》中, 叙述者萨林姆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推崇与抵制并存的微妙态度便是这种悖论的一种戏剧性呈现。

萨林姆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 在初始状态就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他所了解到的关于自己的历史及印度洋的历史“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12), 因此西方的评价方式成为他唯一能够诉诸的话语体系。尽管萨林姆敏锐地察觉到欧洲人殖民扩张行径的罪恶, 指出“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 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 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17)的虚伪性。但是, 在僵化的层级秩序和权力体系中, 萨林姆也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谈及科学杂志上的新发明时, 他下意识地吧发明者“他们”等同于“白人”, 并将之视为“公正的, 高高在上, 端坐云端, 如同造福的神明”(44), 期许得到西方进步使者的赐福。帝国主义幽灵般的在场, 不断模糊着萨林姆的自我定位。他发现自己“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 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17), 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他者, 由此陷入文化身份无所皈依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既是萨林姆对被殖民的他者生存现状的一种指认, 也随之成为他反思殖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契机。

在巴巴看来, 自我中的他者是身份“移动的边界”, 是身份中的差异化力量。巴巴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阐释了主体建构的过程, “如同镜子阶段, 类型的‘完整性’——它作为同一性的形象——总是被缺失所威胁”(《The Location of Culture》110)。主体通过不断对他者进行想象性认同重申身份的圆满性, 但因为不断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 无法将身份固定下来。由此, 笛卡儿以降的西方传统哲学所认同的、作为二元统一的主体被破坏, 主体既不由“思”确认, 也不由“在”决定, 而成为与他者混杂的不稳定产物。换言之, 殖民者主体身份的构成, 无法脱离作为他者的被殖民者的存在。宗主国在与殖民地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由差异造成的矛盾性, 他者为既欲望又憎恶的客体。在话语实践上,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构成了文化的杂交(hybridity)。巴巴认为他者这个客体的被动状态可以被翻转, 能够在主客体之间这种不稳定的、矛盾的、论辩式的关系中, 驳斥殖民话语的权威, 生发出反殖民话语的可能性。

“第二次叛乱”中, “大人物”依靠白人军队平息了武士部落的叛乱, 开启大刀阔斧的现代化建设, 试图通过效仿欧洲在新领地上“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104)。但是, 小说中内陆小镇所建构的“新非洲”是西方文化的仿制品, 这一模仿未能实现对后者的原貌复制, 而变成了一种“面目全非的拷贝”。新总统在小镇的废墟上投入大量金钱, 建立起一座

欧式新城。这里有着巨大的水泥天窗、高耸的水泥大楼、五彩的玻璃、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但萨林姆却只看到了“失败和屈辱”，“发现其设计是如何粗劣，其家具是如何花哨”（105）。萨林姆对总统演讲情况的转述，更是生动展现了从高贵的殖民主义想象到低级模仿的闹剧性转向，书中写道“他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把自己混同于最下层的人”（218）。通过萨林姆的反思可以看到，一则“模拟在它的面具后面没有隐藏什么存在或者身份”（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26），总统想用非洲土语赢得人民欢心，但其思想和事业却避开了真正的非洲；二则西方权威话语被挪用、篡改，一种被视为低劣的话语通过模拟策略进入主流话语。模拟的结果，即文化混杂的形态，使得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边界被修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之间稳定的二元结构被弱化。

这种文化混杂性使得萨林姆对殖民身份幻觉不停进行重估，但此时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神话仍心存侥幸，把新领地的失败更多地归咎于“大人物”失败的模拟策略及其独裁统治。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不满的青年卫队发动了更为血腥的暴力活动，力图推翻“黑皮肤，白面具”下的傀儡政权。萨林姆借由舒芭有关“换皮肤”的呓语，抒发了彼时小镇上移民愈发狭隘的生存空间给他带来的身份焦虑。于是，他第一次逃离了河湾处的小镇，前往伦敦，渴望得到西方文化的庇佑。但是，他发现飞机把他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欧洲，不同于我从小就熟悉的欧洲”（243）。眼见之处不是那个伟大、繁荣、庄严的欧洲，而是猥琐、庸俗、拒人千里之外的平凡之城。这里有无数人造的、毫无生气的城市景观，与非洲类似的商贸关系，大量来自世界各地设法挤进伦敦的人，他们为了工作而工作，如同剧院里的木偶。萨林姆发觉，不论“用伦敦比照非洲，或是用非洲来比照伦敦，结果二者都虚幻化了”（255），欧洲高于非洲的优越性在此消失殆尽。他者的审视之中“呈现了对歧视和统治的一切地点的必要变形和移置，扰乱了殖民权力的模仿或自恋需求[……]这种颠覆策略将受歧视者的凝视投回了权利之眼”（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59-60）。回视之中的殖民者形象只剩下扭曲、空心的躯壳，此时萨林姆已意识到西方主体是由他者建构起来，是“人造”的虚幻景观，“西方至上”的、等级制的优越意识形态不攻自破。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到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仍无法摆脱殖民帝国幽灵般的存在。作为移民的萨林姆，对西方殖民主义持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态度。他虽然意识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与规训，却难以摆脱帝国权力秩序掩盖下“进步”“文明”“现代性”的主人道德迷惑。大人物宰治之下所建设的新领地，成为西方帝国文化与非洲民族文化混杂的四不像产物。这使得萨林姆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文化他者的非洲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可能通过模拟策略置换主客体地位，实现如同西方一般的现代性进步。与此同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需要通过他者的存在作自我确认，而大人物与新领地的拙劣模仿借助否弃，干扰了权威的、纯粹的、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在新领地的混杂效应中，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弱化，待萨林姆逃离到伦敦后，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脆弱性逐渐明晰。萨林姆发觉帝国主义的优越性只是一场幻觉，建构于话语和权力场域之上，不存在于真实的物理空间之中，由此西

方文化身份的同性和神圣性完全被消解。萨林姆从一开始无意识地推崇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到有意识地打破意识形态神话的转变，也体现出移民不断进行文化商讨和交流的努力，对打破单一的生活模式和狭隘的思维模式的尝试。

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抵抗

如前所述，英殖民帝国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撤离了殖民地，但仍以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在场方式影响着非洲国家，大大地削弱了后者作为民族国家的活力与神圣主权。《河湾》第一部分“第二次反叛”的内战状态以极其真实的笔触书写了非洲民族对于“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26）的渴望，但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使得被殖民地沦为“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26）。文明的消失暗示着非洲民族的历史叙事已然断裂，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言：“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之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罗钢、刘象愚 212）巴巴在其编著的《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中，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4]论述出发，说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coming into being*）性质的意义，认为“‘构成’作为一种文化意义表征系统，作为社会生活的再现而非社会政体的律令，极具不稳定性”（2）。在《河湾》中，这种不稳定性表现为非洲民族国家在重建过程中所涉及的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两个领域，其一为追溯本真的内在领域，其二为追求现代性的外领域。

小说的第二部分“新领地”是民族国家重塑的集中写照。于外领域，总统试图通过模拟策略仿照欧洲推进现代化建设（前文已通过论述其策略的失败，暗示了追求现代性的外领域不可能实现）。于内领域，总统希望通过回归传统，形塑“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144）形象。“大人物”将非洲民族主义想象建立在随处可见的总统肖像和总统语录，充斥全国的非洲圣母像雕塑和庙宇，象征传统与权威的豹皮酋长帽与权杖等现实事物之中。他企图让一切“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219），用权势和荣耀建构本质的、同一的非洲民族。在小说第三部分“大人物”之中，越印越大的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十分生动地展现出总统向内转向的行为逐渐极端化，形成了巴巴所谓的训导式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和连续式民族叙事（*continuist national narrative*）。在该范畴之下，非洲民族被本质化并被构想为一种单一类型，从而错失了“人们所居住的神秘的、不稳定的所在空间”（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303），即忽视了非洲真实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历史。小说中，萨林姆在此类宏大叙事之下，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幻觉，觉得自己能够超脱于生活中真实的一切——河湾小镇中“山一样的垃圾堆，破败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而远在首都的总统及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生活成为“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196）。

由此可以看到，“大人物”宰治之下的非洲是属于话语和思想的非洲，其“民族意识不过是一个粗糙、空洞而脆弱的壳”（法农 97），并不是真实的非洲。《河湾》极具讽刺性地揭示了这种民族叙事的脆弱性。小说中“青年卫队”本是新总统倾力培养、享受津贴福利的军队组织，他们曾不遗余力地宣扬总统权势，组织儿童行军活动，要求“孩子们一边走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207）。但在卫队“风纪巡逻”引发民愤之后，总统随即宣布将其解散，并命其回到丛林之中学习猴子的智慧。在“青年卫队”威风扫地之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撕碎“大人物”民族主义伪面具的义勇军，高呼着“祖先的呐喊”发起暴力血腥行动，践行着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使得萨林姆看到了民族主义想象内部的裂缝，并开始质疑非洲民族通过回溯“民族之过去”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小说的第四部分为“战斗”，与第一部分“第二次反叛”形成了一种呼应，河湾处的小镇最终达成了一种“从混乱走向混乱”的闭环式发展，萨林姆也摆脱不了“从逃离再到逃离”的循环式宿命。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小说的不同阶段分化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民族主义在反抗帝国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殖民地独立建国后却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迷雾。根据萨义德的看法，民族主义在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与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如果在独立之后仍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异于重复殖民主义的结构（《文化与帝国主义》317）。小说中，总统对“非非洲人”的压迫便是民族主义殖民化的一种具象表达。最终，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激进化政策”，剥夺了所有“外国人”的一切，将其收归国有，正如巴巴预言的那样：“民族主义抱负将文明的价值转变为种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社群感被公社制的危机所取代。”（Copjec 202）顷刻间，萨林姆丧失了财产权，沦为“下等”，一向遵纪守法的他也不得不从事非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以赚取钱财。由于仆人墨迪的举报，萨林姆锒铛入狱。在监狱里，他目睹了一种共存于犯人和看守之中的狂热，这些人“除了对自身属性的了解，他们一无所有”（286）。这种对“非洲性”强调构成一种民族身份的本质主义，否定了文化混杂的客观实在，也驱逐了所有异质性。在此意义上，萨林姆的“逃离”是一种必然，构成了后殖民文学的一种特定立场。

萨林姆的“逃离”是一种“离家”（unhomed）立场的转化。所谓“离家”，不同于“无家可归”（homeless），也非反对“家”的概念，而是强调一种不以某种特定文化为归宿，处于文化边缘和疏离状态的处境。该状态指向是一种政治想法，如同后殖民主义本身，它首先提供的不是解决方法而是挑战，是对“中心”发起的一次声讨。如前所述，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既想回归传统，又欲追求现代化，内外领域的割裂呈现出一种“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145）的独特景观。为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总统通过非洲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书写创建全新的民族叙事，但该叙事缺乏强大的经济认同基础和有效的文化认同前提，最终沦为“大人物”个人的专制统治工具，成为褊狭的、同一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帮凶。萨林姆的“离家”状态呈现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放逐，是移民“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3）处境的真实书写，也是对本质主义的逆反。通过萨林姆的多次逃离，欧洲与非洲文化的互

动被重新观照、反思，主导性压迫话语在移民者的双重视角下失去其神话色彩，一切以纯粹性、整体性、原初性为主导价值的文化霸权被消解。

三、解构之后：本土世界主义的展望

萨林姆的叙述在殖民帝国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展开、推进，后殖民主体的欲望、焦虑、遗憾、失望等复杂情绪投射到河湾小镇这个叙事客体之上，构成了一种含混、矛盾的主题思想。回到“奈保尔谬误”本身，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河湾》中这种对非洲后殖民国家情状的负面书写是否传递了作家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无可置疑的是，小说的确呈现出了非洲后殖民社会的某种“真相”。1979年出版的《河湾》是虚构于历史之上的真实，其故事取材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蒙博托当政时期的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历史。在蒙博托的独裁统治之下，刚果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乱，国家内外交困，杀戮横行，民不聊生。赵毅衡先生指出，现实事实上沿着这本书走得更远，“蒙博托的统治，比奈保尔预料的要长，但是至少几十万人死于刚果的内乱，政变与暗杀，余波延续至今未息”（赵毅衡）。因此，这种负面书写与其说是作家刻意的抹黑，毋宁视其为一种“逼真”的文学呈现。

可见，现实层面的意义赋予了《河湾》的叙事一定程度的真实感和历史感。与此同时，在文学隐喻层面，奈保尔以河湾处的小镇命运为切口，影射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殖民秩序的崩溃后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并关注到全球化语境之中“新殖民主义”的变体。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一种类同于殖民时期、极具迷惑性的全球世界主义（global cosmopolitan）。它“建立在进步观基础之上的特权，它同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方式和自由市场竞争力形成共谋 [……] 此类全球化世界主义乐于看到一个多元文化^[5]共存和边缘民族共存的世界，只要这些人都为都市社会创造不错的利润率”（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xiv）。《河湾》以极其真实的笔触描绘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如此世界格局之下的艰难处境，书中写道：“资金的外流是全球性现象。大家把世界搜刮得干干净净，就好像非洲人把自己的院子刮干净一样，然后，他们想离开挣足了钱的可怕地方，想找个舒适、太平的国家 [……] 你不要以为大家只是在逃避非洲。”（248-49）原初形式的殖民主义看似在殖民地实现独立和解放后销声匿迹，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边缘地区制造诸多不平等。难逃桎梏的不只是非洲，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深受其害。奈保尔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空间，对“新殖民主义”结构性压迫进行揭示和预警。

《河湾》由此成为现代与传统、纪实与虚构、政治与艺术的一次交锋，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焦虑。这种焦虑植根于后殖民文化境遇，触及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政治变迁的多元危机。奈保尔对非洲国家困境过于直白和诚实的描写，无疑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回到文学本身，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对后殖民社会境况的“逼真”摹写及对焦虑背后内在原因的追问，并试图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歧视的边缘群体推至文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前沿的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奈保尔设置少数族萨林姆的叙述视角来展现后殖民之思，存在着深远的文学意义。

其一，《河湾》将后殖民议题聚焦于萨林姆的有限视域和虚构的文学语境之中，作家本人得以隐身。奈保尔认为：“只试图记录的艺术家的，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人道主义考虑，都是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他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一个隐姓埋名之人。”（“Violence in Art” 107）奈保尔有意在个人与叙述者、事实与文本之间创设距离，以便其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外在的意识形态束缚，呈现出自由、真实的艺术表达。其二，类同于奈保尔本人，叙述者萨林姆具备混杂的文化身份，拥有移民“最真的眼睛”，能够通过“双重视界”审视后殖民议题。正是由于频繁位移、文化无根的现状，位于少数、边缘、弱势地位的萨林姆能够免于任何一方宏大叙事的俘获，生发出一种审慎的伦理距离，对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两种叙事惯例和社会政治机制始终保持疏离与警惕。其三，奈保尔在肯定少数派的眼光之时，也揭示了少数派的困境，这本身也是后殖民文学的重要关切。后殖民主义是用从下至上，而非从上至下的视角来感知世界的。其本身与社会的下层阶级及边缘群体紧紧联系在一起，它要求赋予贫困者、无依者和社会地位低下者更多的权利、宽容、差异，在民主和平等的框架内确立少数民族、移民、女性的权利。以萨林姆之视域观其本身，《河湾》所含意蕴就远不限于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单一视角，而具备更宽广、开放、绵长的意蕴。

这种特殊视域具备一种巴巴意义上的“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倾向，其意在用“少数派的眼光来衡量全球发展 [……] 强调人人有权保持‘平等的个性’，而不是‘二元经济’下的多元”（*The Location of Culture* xvii）。它所强调的不是对文化群体原初身份的认同，而更多地在于伦理选择和政治实践。这种观念与作家奈保尔本人的理念不谋而合，他坦言道：“特立尼达人是世界主义者 [……] 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只会以智慧和风格的标准来评判他人。”（Naipaul, *The Middle Passage* 77）具体到小说之中，可以看到，随着萨林姆不断发出声音、做出伦理判断，不同维度的事实在小说中不断被呈现出来。信奉“各族融合，团结合一”的惠斯曼神父，实质上回归殖民主义统治的主张者，“他对文明的想法和他的虚荣相似”（84）；总统的白人亲信雷蒙德、耶苇特夫妇对非洲的建设高谈阔论，实际上对真正的非洲并没有什么认识和感受，是空有其表的政治投机分子；接受伦敦高等教育的因达尔，推崇践踏非洲过去西方追求新生活，最终沦为拜物教的忠实信徒。对于萨林姆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的评判，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就文本而论，小说随着萨林姆视域的变动、观点的流动，呈现出复杂、多维、平等、开放的思想与观照，创建了更广阔的阐释和批评空间。

由此，可以看到“奈保尔谬误”表现出人们对后殖民文学中的叙事话语、政治立场给予特别关注，但此类关注容易简化和失真，忽视作家、作品、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立体、多元、有机的关联。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人种极度混杂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表征系统和意义系统逐渐多元化。世界文学殿堂之中不应只有“伟大的传统”，也应该注意到那些“富

有争议性的、边缘性的和底层视角的阅读方式”（Bernheimer 44）。这需要读者以超脱的态度和批判性的眼光，与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陌生世界或者他者文化进行接洽。如巴巴所言，要“像理解翻译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生安锋 57）。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片罅隙空间，“它既反对一种回归原初性的‘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分裂的主体”（Chambers 204）。这需要我们以“最真的眼睛”去做出人道主义的文化选择、道德判断和政治实践，在混杂、居间的空间里，伸张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协商的本土世界主义。

结合后殖民社会政治斗争与发展危机的现实语境，奈保尔在《河湾》中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图景、文化景观细致、尖锐的描摹，对后殖民议题多维、辩证的思辨，无疑增添了文本解读的复杂性和开放性。艺术和政治的焦虑汇集于“奈保尔谬误”之上，不可避免地形成文学评介间显著的个体差异。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差异的背后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种消除霸权、寻求解放的后殖民观照。在这个意义上，奈保尔将小说叙述权交付给那些移位的、流散的、文化上无家可归的少数族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对霸权话语的修正，对主导意义的重塑。小说借助叙事者萨林姆的“双重视界”的边缘视角，客观审视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双重欲望的交错，展现出一种审慎的文学伦理距离。就具体的后殖民书写而言，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之上，也没有将后殖民文学带回到民族主义抵抗的老路上，而是持非本质主义的态度，强调混杂的处境，寓反抗于挪用之中。其中所蕴含的跳出二元模式，在多元共存与互补中消除文化霸权、实现世界大同的思想，展现出一种本土世界主义的关怀。这既是政治的关怀，也是文学的关怀。

注释 [Notes]

- [1] 在阿皮亚关于“奈保尔谬误”的示例中，他反对将非洲嵌入到欧洲文化之中以使之产生意义的行为，认为不应该以欧洲批评理论视角来审视非洲文本。他提出“非洲小说不需要辩护，而是需要被阅读”，见 Anthony Appiah, “Structures on Structures: The Prospects for a Structuralist Poetics of African Fiction.”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Routledge, 2017, pp. 16-17.
- [2] 巴巴认为：“最真的眼睛或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见氏著“Introduction.” *Locations of Culture*, Routledge, 2004, pp. 7-8. 生安锋指出：“这种双重视界突破了主流社会用单一眼光看待事物的霸道方式，而是既看到殖民者的强权霸道又看到其内在矛盾和外强中干之处，既看到被殖民者懦弱顺从备受欺凌又能发现其行动和表述中的能动性，既看到主流文化中的逻辑悖谬和白人中心主义又看到边缘文化或者少数族裔文化中的独特之处和矫正性优势，既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势又能关注到当下后现代社会中那些未被正义和公平之光照亮的阴暗之处。”见氏著《后理论时代的后殖民诗学》，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第155-63页。
- [3] 本文对《河湾》的引用皆出自于方柏林译本（详见引用文献），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
- [4]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见氏著：《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5] 巴巴区分了“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在他看来，“文化多元

性”导向了身份的本质主义观念，会形成文化之间的相对性和“一种总体化之分割的激进修辞，它未受这些文化的历史性定位的文本间性的玷污，安全地存在于一种单一的、集体性认同的神话般的记忆乌托邦主义之中”，而文化差异要求确认文化混杂的事实，旨在把文化身份变成一个可以协商的、互动的、非压制的建构过程。此处的“多元文化共存”指代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见氏著：“The Commitment to Theory.” *Locations of Culture*. Routledge, 2004, pp. 49-51.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rnheimer, Charl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5.
- Bhabha, Homi. editor.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1990.
- .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2004.
- . “Adagio.”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2, 2005, pp. 371-80.
- Chambers, Iain, and Linda Curti, editors.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Routledge, 1996.
- Cojpec, Joaned, editor. *Supposing the Subject*. Verso, 1994.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Bing Wan. Yilin Press, 2005. [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Luo, Gang, and Xiangyu Liu, editors.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Naipaul, V. S. *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Colonial Societies*. Andre Deutsch, 1962.
- . “Violence in Art: The Documentary Heresy.” *Twentieth Century*, no. 4, 1964, pp. 107-108.
- . *A Bend in the River*. Translated by Bolin Fang. Yilin Press, 2005. [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3。]
- Raja, Massod. “Reading the Postcolony in the Center: V. S. Naipaul’s *A Bend in the River*.” *South Asian Review*, vol. 26, no. 1, 2005, pp. 224-39.
- Richetti, John, et al.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Yugen W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Kun L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Sheng, Anfeng. “Post-colonialism, Identity and Minorization: An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02, pp. 56-61. [生安锋：《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第56-61页。]
- Zhao, Yiheng. “Who Can Defend Naipaul?: A Comment on Naipaul and *A Bend in the River*.” *China Book Business Report*, 22 Aug. 2002. [赵毅衡：《谁能为奈保尔辩护？——评奈保尔与〈河湾〉》，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8月22日。]

◇ 责任编辑：马妮娅

从“非黑即白”到世界主义 ——杰西·福赛特《葡萄干面包》的界限研究

◎ 王丁莹

内容提要: 杰西·福赛特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引路人,本该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却因其作品中的维多利亚式感伤小说特点而被忽视。本文将从安吉拉的越界体验入手,循着种族界限的“消失”、认知界限的重构与身份界限的生成对《葡萄干面包》中的多重界限进行分析,探究小说的政治与社会价值。通过书写安吉拉的越界,福赛特试图否定越界是“拒绝前者、肯定后者”的多元选择。她认为安吉拉是个黑人,同时又是人类文化与情感共同体的一分子,表达了其试图构建世界主义这一新型共同体框架的意图。

关键词: 《葡萄干面包》 杰西·福赛特 界限 世界主义 哈莱姆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2-0054-11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6

Title: From “Black/White” to Cosmopolitanism: A Study of Limits in Jessie Fauset’s *Plum Bun*

Abstract: Jessie Fauset, an important guide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should have been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but has been overlooked long due to her sentimental Victorian style. Based on Angela’s experience of transgressi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multiple limits in *Plum Bun*, follow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racial limi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limits and the generation of limits of identity,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value of the novel.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gela’s transgression, Fauset attempts to deny that transgression is a dichotomic choice of “rejecting the former and affirming the latter.” She regards Angela as a black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he cultural and emotional community of humanity, which expresses her attempt to construct a new communal framework of cosmopolitanism.

Keywords: *Plum Bun*, Jessie Fauset, limits, cosmopolitanism, Harlem Renaissance

Author: Dingying W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杰西·福赛特(Jessie R. Fauset)被誉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助产士”。她在1919年受杜波依斯(W.E.B. DuBois)的邀请成为《危机》(*The Crisis*)杂志的主编后,提携了一批黑人年轻作家。这些作家使黑人文学得到美国主流出版社的承认,带来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繁荣。但福赛特本人却被学界视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其他作家的“脚注”,她的小说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忠于中产阶级上层价值观和礼仪观”(Ammons 213)的“客厅小说”(Popp 131)。事实上,她一直倡导利用文学作品跨越现实生活的时空边界,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与政治功能,其作品绝非维多利亚式的感伤小说。

1922年,她曾写信提携初出茅庐的黑人作家图默(Jean Toomer),信中说:“你有个性又不受外表的限制。为什么不试着在大城市的报纸行业闯一闯呢?”(Pfeiffer 79)而在她的小说《葡萄干面包》(*Plum Bun*)中,她让主人公安吉拉成为“文本世界的吉恩·图默”,凭借自己的浅肤色,前往纽约城闯荡。图默和安吉拉都是越界者。“越界”(transgression)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公然犯罪”,是对已知法律思想的故意违反(Burdette 213)。其实,黑白混血儿(mulatto)对种族界限的跨越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1947年,黑人活动家怀特(Walter White)曾说:“每年约有12000个浅肤色的黑人消失。这种情况无法解释为死亡或移民。在美国1400万依稀可辨的黑人中,几乎每一个黑人知道至少有一个黑人冒充白人的故事。”(转引自Singh 93)这在美国非裔文学中形成了一种文类:“越界小说”(passing novel)。然而,无论是现实的图默还是文本中的安吉拉,他们都经历了种族越界者的认同困境,这也引出了福赛特对族裔问题的核心疑问:界限的完全消解是否真的有助于自我的发展?肤色是非裔身份认同的唯一要素吗?

本文将循着安吉拉的越界体验,从种族、性别、身份三个层次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临时性的种族越界给了安吉拉抹去黑人性后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错觉,由此触发了她的终身性种族越界。但实际上,界限内外并非“黑白分明”,种族与性别、其他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通过与白人男友的交往,安吉拉摆脱了天真,上升到了性别认知的新境界。进而,她否定了越界是“拒绝前者、肯定后者”的二元选择,认识到她是个黑人,同时又是人类文化与情感共同体的一分子,从而建构了跨国旅居背景下的世界公民身份。而对于作家福赛特,她正是通过书写安吉拉复杂的越界体验,关照了20世纪20年代现实社会的黑人身份焦虑,展现了其作品中的政治与社会价值。

一、种族界限的“消失”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曾指出:“20世纪的问题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界限问题——是亚洲和非洲、美洲和海外各岛上的肤色较黑与较浅的人种之间的关系问题。”(15)尽管美国国会于1868年批准生效的《第十四条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明确规定了美国有色人种和白人平等的公民权 (Kelly and Harbinson 26-27)。但是, 法律的存在并没有使美国“黑白分明”的社会图景得以消解。1896年, 普莱西告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正式将“种族隔离”提升到了法律层面。《葡萄干面包》就刻画了这样的社会图景——老穆里无法进入白人医院、汉森被拒绝进入白人剧院、妹妹金妮被要求乘坐黑人车厢。但是, 安吉拉母女的“奶油色的皮肤、蓬松柔软的栗色头发” (Fauset, *Plum Bun* 14), 为她们进入白人社群提供了便利, 使得种族颜色线被消解。但母亲马蒂和安吉拉的越界体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义。马蒂并不渴望种族界限的消失, 她视越界为一种“游戏”, 是对荒谬的颜色线的嘲讽; 而安吉拉渴望永久地单向驶入, 使叠加在自己身上的种族界限消失, 但她还未意识到界限是构成自我的要素, 使个体性得以存在。

第一章以“家”为题, 故事发生的地理场景是费城 (Philadelphia)。朱尼厄斯和马蒂靠辛勤劳动买下了一幢三层的房子, 在费城过着小中产阶级的生活。朱尼厄斯还拥有一辆二手福特汽车 (52)。他年轻时曾替一位白人女演员驾车, 从马车夫到汽车所有者, 这辆汽车象征着黑人家庭对美国梦的追求, 是外来民族美国化的重要载体。费城这个与美国民主和革命紧密相连的地方, 为老一辈非裔美国人实现美国梦提供了可能。然而, 在安吉拉看来, 欧泊街并不如它的名字那般, 一排破旧的小房子挤在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 现代性已经驱散了革命与进步的传统。尽管没有像美国南部那样将“种族隔离”明文公示, 但在中东部的宾夕法尼亚, “黑白分明”的种族界限已经刻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

马蒂很享受在颜色线之间来回穿梭的快感, 以此来讥讽人为设定的社会规范的荒谬性。小说中, 她时常在商业区漫步, 溜达着观看高档的橱窗。她喜欢“漂亮服装”、喜欢欣赏“时尚的人群” (15)。这些行为全部来源于她内心对流动难以抑制的本能。她一路从彻斯特奈特的第十五街逛到第九街, 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酒店喝茶, 穿过沃纳梅克百货商店。费城“黑白分明”最严重的地方并非在南部。相反, 由于黑人移民的大量涌入, 南方提供的岗位有限, 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只能继续向西北部移居。费城政府在西北部按照“红线评估图” (redline) 制定了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 (Hillier 137), 这片区域几乎都是仅供白人居住的社区, 没有黑人可以居住的红色“危险”区。小说中, 福赛特将马蒂置于费城西北部的彻斯特奈特大街, 体现出对种族界限的无声反抗。戴蒙德 (Justine Dymond) 将福赛特与伍尔夫 (Virginia Woolf)、斯泰因 (Gertrude Stein) 并置, 探索她们在语言上的共鸣, 以展示她们对现代主义的共同贡献 (vi)。作为女性漫游者 (flâneuse) 的马蒂比达洛维夫人的身份元素更为复杂, 她的出现不仅使“传统的、男性的、贵族化的”公共空间被“现代的、女性的、时尚的”元素所渗透 (尹星 102), 还突破了种族的界限, 赋予了福赛特作品更多的社会与政治价值。

然而, 马蒂并不渴望融入这些时尚的白人女性与他们的社群中。她自知跨越界限不是以消解为目的, 她视自己在种族界限间的来回穿梭为一种“游戏” (Foucault 34)、一种对隐

蔽之处的呈现。“僭越违抗秩序的目的并不是摧毁秩序或脱离秩序，而是在反对秩序的同时，和秩序一起展开一场具有色情意味的游戏。如果僭越给律法带来了破坏，其方式绝非对律法的摒弃，而是使律法变得可见、变得毫无遮掩”（Sabot 115）。人们潜意识中的种族界限似乎被正常化了，而通过马蒂的越界游戏，这种界限的荒谬得以显现。当马蒂一个人在高档餐厅的正厅吃午饭时，她觉得很有趣，因为黑人是不允许进入餐厅正厅就餐的，白人有权谩骂并让黑人离开，就如后文的罗杰一样。但是，当和朱尼厄斯或任何黑人朋友一起就餐时，她是第一个要求坐在阳台或走廊上的；她偶尔坐在正厅里面，仅仅是出于恶作剧，对一项愚蠢且不公平的法规的嗤之以鼻（Fauset, *Plum Bun* 15）。马蒂的越界体验是对白人“秩序”的扰乱与质疑，她并非真正想拥有白人在高档餐厅中的特权，只是想通过这种戏谑证明黑人坐在正厅中就餐可以与白人一样表现出优雅的教养与礼仪，并非如白人想象中的野蛮他者。

两个女儿出生后，马蒂的越界游戏由一人变成了两人。但与马蒂不同，安吉拉却对种族界限的消解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她没有像母亲一样大方地与黑人朋友同行以揭示法律的荒谬性，而是选择掩盖自己的种族真相。她认为所有的快乐都是属于白人的，她渴望成为白人并永久地进入白人社群。她的浅色皮肤是意外所得，更是一种消解种族界限的机遇，她对深色皮肤的金妮说道：

我想了又想。我真的很在脑海里考虑了很久，但昨晚它似乎在我的意识中脱颖而出。我何必要跟我最渴望的一切保持距离呢，——聪明人、艺术家、旅行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这些东西看似适合每个人，但据我所知，只有白人才能得到。我的意思是奖学金、专项资金、赞助。哦，金妮，你不懂，我不认为你能理解我想看到和知道的事情。你不像我。（78）

这种对界限的错误认识造成了安吉拉主体性的丧失与错位。在经历了马修被拒绝进入白人剧院、谢尔兹先生因为她的黑人身份不再认可她的天赋后，安吉拉错误地认为只要她能抛弃黑人身份，成为白人，梦想就能实现。此时的她，还未能理解母亲的话：她的全部幸福都来源于自己的家庭和黑人丈夫。越界不是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Foucault 35），而是通过越界体验，确认不同的存在，实现对自我的进一步发现与探索。但小说中，安吉拉的行为却以永恒地单向驶入为目的，企图消除种族界限，永久地变为白人，这一行为否认了自身的血统与主体性，被白色面纱蒙蔽的安吉拉势必会落入陷阱。

二、性别认知界限的重构

福赛特利用童谣“去市场，去市场，去买一个葡萄干面包；回家，回家，市场逛完了”，

组成故事的潜在叙事结构。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对应了安吉拉在纽约“逛白人市场”的越界体验，更通过“葡萄干面包”这一暗喻指代的变化点明了安吉拉在经验反思中认知界限的重构。福柯认为越界行为只有暂时有效性，“越界与限制之间的关系并非黑与白、合法与违法、表与里、建筑物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那样分明”（35）。当界限被逾越后，新的界限会出现在越界者面前。越界者要保持自觉的界限意识，因为“一切由界限，或危险，或不可容忍的行为构成的[……]这些看来是外在的东西，恰恰可能暗示着我们的自我”（Foucault 541）。在小说中，安吉拉到达纽约后，看似“界限被逾越了”，一切由种族界限造成的问题消解了，但新的危险和挑战迫使她建立自己的界限意识。在反思越界失效的同时，安吉拉也在性别与情感的认知界限中重构了自我。

初到纽约，福赛特把安吉拉比喻成一位冒险家，航行到一片陌生的海域。小说中将第五大道比喻成一个峡谷，将第十四街比喻成一条河流（Fauset, *Plum Bun* 87），将她第一次上课的场景描述为“一个带着男孩子气的海上偷渡者[……]对未知事物充满了活力”（93）。她相信自己凭借白皙的肌肤，不久就能交到朋友，并开始受邀参加聚会。在玛莎的聚会上，她遇到了罗杰。在接到罗杰的首次私人邀请后，她精心挑选了一件红色裙子去赴约，以此来衬托她肤色的白皙（123）。“红裙子”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安吉拉在第二次赴约时特意换下新买的绿衣服，又换上了红裙子。在此，福赛特暗示了圣经《启示录》（17: 4）中的红衣巴比伦妓女，预示着安吉拉的失贞。安吉拉从波莱特口中得知罗杰的家产不菲，因此幻想能嫁给这样一位公子哥。即便罗杰曾在餐厅里称黑人为“浣熊”，表现出极端的种族主义观念（134），安吉拉仍旧极力掩饰自己的种族秘密，甘愿成为罗杰男性霸权的附属品。此时，这位寻找“葡萄干面包”的女冒险家，成了被男人追逐的“面包”，丧失了流动赋予的主体性。与初到纽约的活力与流动相比，“生活不知怎的停滞不前了；那种高度的冒险精神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顺从的感觉，没有丝毫的保障，也没有永恒的慰藉”（25）。为了能和罗杰维系关系，安吉拉甚至在火车站以认错人为借口，与金妮断绝关系。不少批评家都将安吉拉的越界视为一个陷阱、一种新的奴役，使其陷入精神的牢笼之中（Harrell 188）。

绘画班的白人同窗波莱特和玛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跨越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女性不再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内天使”，她们有权表达个性，追求自由，甚至炫耀自己的性吸引力。波莱特有很多风流韵事，而传统的社会标准把女人视为没有欲望的性对象。在与安吉拉讨论罗杰时，波莱特表达出自己对传统性别观的不满：“我不在乎一个男人不能娶我；但是如果他觉得我配不上他，我就不会原谅他。任何一个女人都胜过最好的男人。”她越说越兴奋，脸上流露出强烈、炽热的表情（Fauset, *Plum Bun* 131）。像波莱特一样，玛莎反对婚姻为女性设定的固定剧本，认为其“缺乏自发性。（在一段关系中），她要施与，但并无施与的义务，那是她自己的选择，而非她本应如此”（198）。但是，在白人女性的经验下，安吉拉并没有如愿以偿。她不仅失去了处子之身，还不自觉

地成了罗杰的情人。而在他们有了性关系之后，罗杰对安吉拉逐渐失去了兴趣。当安吉拉往他家里打电话时，他勃然大怒：“我不能让女人整天往我家里打电话，这会让我在我仆人的眼里显得怪怪的[……]当然我是这样做的。可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是男人。”(Fauset, *Plum Bun* 230)此时，安吉拉还未意识到“界限”存在的意义——保持界限就等于认同异质性，异质性是划分自我与他人的准则，界限的消失导致了其主体性的虚无与沦丧。她未能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在白人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认知与判断。

“逛(白人)市集”的经历以悲剧收场后，安吉拉开始反思自己的越界失效。经验本质上是对风险的克服。“积极意义上的经验要求一个人冒险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并且经历难以捉摸的和不确定的情景。为了成为一个专家，一个人必须敢于面对新生事物”(Tuan 9)。安吉拉在白人社群中的冒险使她认识到保持界限就是保持自我，确定与肯定界限本身的存在可以丰富对界限内外的事物的认知。安吉拉不再把自己当成男人的女人，“她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男人。从6个男同事与她的逗趣中分辨他们的态度，她听着，笑着，权衡着他们的爱慕，却一个也不接受”(Fauset, *Plum Bun* 247)。同时，她也认识到了婚姻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在遇见罗杰之前，她把婚姻当作是实现她理想生活的途径。“但是，现在她把它看成是目的本身；对女人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的、最完美的、最自然的结果[……]事实上，大多数女性必须能够像男性一样说，‘你是我的’而不只是‘我是你的’”(276)。安吉拉认为，在婚姻中女性应和丈夫一样拥有主体性，就如托姆林森(Susan Tomlinson)所言，婚姻是“所有女人一起建立的机制”，这个机制保证了她们的安全感与合法权益，“而不是使女人成为女人的不可或缺的机制”(96)。而当罗杰再次出现，抛出婚姻的诱饵时，安吉拉毅然拒绝了。此时，她的“葡萄干面包”已经变为艺术创作。戴蒙德的论文提到了《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的丽莉为了绘画事业，牺牲了婚姻和幸福。虽然受到了男权社会的轻蔑，但她摆脱了“家中天使”的形象(65)。而她在论述福赛特的作品时，却忽略了安吉拉的画家身份。其实，让安吉拉成为画家是与丽莉的情节互为映照的。这一特殊的职业身份赋予了女性独立与自我，因为借助视觉表达，可以摆脱传统上受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控制的语言表达，驶入对性别和情感认知的新境界。摆脱男性霸权话语的安吉拉，在婚姻“市场”中也不再是猎物。小说结尾处，克罗斯将自己作为圣诞礼物，出现在安吉拉住所的门口(Fauset, *Plum Bun* 382)，更是对男女关系不平等的反写。

与此同时，安吉拉慢慢意识到性和种族同等重要，两者都作为压制黑人女性生活的因素。“新女性”这一浪潮赋予了女性能动性，特别是性的能动性。但是在种族语境下，“新女性”更倾向于“新白人女性”，黑人女性由于天生就被认为是“淫荡”的，因此本身就被排斥在女性定义之外。安吉拉意识到了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界限，开启了越界“游戏”，在界限间来回穿梭，探索“界限的中心打开过的长开口”(Foucault 35)所带来的可能。她认识到社会需要一种更加包容的新女性定义：黑人女性应被包括在内，她们也有权定义自己的贞洁，而非被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随意标记。安吉拉在纽约的越界体验就如

小红帽的冒险，对界限的闯入使其受到了惩罚。但她在经验反思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性别与情感界限，从天真抵达了经验，这恰巧对应了福柯提出的越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安吉拉的越界行为在否定边界的同时，又肯定了边界的存在。她意识到越界不是颠覆，而是对外在身体特征可操演性的肯定与自我异质性的承认。在发现自我的螺旋上升中，她重构了对婚姻和女性的认知。

三、身份界限的生成

福赛特本人曾在《混乱一片》(*There Is Confusion*)和《葡萄干面包》的创作期间旅居法国，而国外旅行经历无疑影响了她在作品中对人物多重意识的塑造。在给友人斯宾加恩(Joel Spingarn)的信中，她写道：“我(在法国)体验到了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生活，这是我在美国体会不到的。”(Wall 72)而在小说中，她在最后一部分安排安吉拉去法国学习绘画，也让角色通过跨国旅行体会到了世界主义的生活。尽管“旅欧叙事”是美国作家常用的叙事母题，然而福赛特的旅欧叙事并非对旧世界文化与精神遗产的找寻与继承。相反，她是对非洲黑人祖先跨过大西洋来到新世界的被动旅行的逆写。由此，安吉拉摘下“面纱”，拥抱了自己的黑人血统和文化。同时，越界的行为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或新的地带，它没有起源，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蕴含着众多可能性的一个开口”(陈永国 126)。几乎与福赛特同时期，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为首的“迷惘一代”美国作家，由于战后欧洲物价降低、巴黎左岸的文化氛围、美国战后的禁酒令等原因，也都有旅欧经历，使得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成为他们笔下时常出现的异国空间，而在此间的主人公对异国的归属感也远大于其母国，形成了世界公民的身份。作为非裔女性的福赛特，她的旅欧经历更为特殊，这些经历为她的角色打开了一个新空间，想象并赋予了美国非裔女性在全球流散话语下的新的世界公民身份。

不妨先从黑人身份的认同感说起。福赛特先让安吉拉认同了“非洲性”。通过黑人知识分子范·梅尔的演说，安吉拉看到了黑人性的另一面，第一次感到自己血管里的黑人血液在沸腾，也为她后来在鲍威尔事件中选择公开自己的黑人身份作了铺垫。小说中，范·梅尔“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Fauset, *Plum Bun* 219)，“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引人注目的美[……]随意一瞥，都能让旁观者确信，他确实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是自己命运的船长”(220)。这种健美与坚定的形象消解了黑人滑稽可笑的负面刻板印象，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黑人知识分子形象相契合。范·梅尔在演讲中强调了黑人对合众国的贡献和其自身民族自豪感的两重性，恰恰对应了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它使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彼此不能调和[……]在融合的过程中，他并不想丧失两个旧的自我中的任何一个”(3-4)。

事实上，范·梅尔正是福赛特以好友杜波依斯为原型塑造的。此外，福赛特还以其他领域有建树的黑人作为角色原型，譬如，鲍威尔是黑人女雕塑家萨维奇（Augusta Savage）；汉森（Matthew Henson）则是最早到达北极顶点的黑人探险家的名字。这些都表达了福赛特本人对黑人性的肯定：黑人血统并不是非裔美国人羞耻的因素，而是其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他们应该首先是黑人，而后才是美国人。在第五章“逛完回家”中，福赛特最终让安吉拉摘掉了“面纱”，重新拥抱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安吉拉和绘画班的同窗们申请了资助去巴黎继续深造，鲍威尔却因黑人身份而被取消资助，安吉拉没有躲在白色皮肤的庇护下，而是站出来，冷静地说：“我，也，是个黑人。”（Fauset, *Plum Bun* 338）

范·梅尔的演讲内容渗透着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即强调“非洲性”的美国公民身份。实际上，杜波依斯的“非洲性”存在着一种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倾向。参照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颇具精英倾向的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杜波依斯在1897年《种族的保护》（“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的演讲中，提出了泛非主义（Appiah, “Pan-Africanism” web）。起初，泛非主义企图在撒哈拉以南建立肤色较深的非洲共同体，后来扩展到整个非洲以及全世界的非裔流散群体，即“非洲性”强调的不是基因或地理疆界，而是一种通过经历而形成的共同传统。人们通过这种传统彼此关联，去认识环境、认识宇宙（Owomoyela 82）。毫无疑问，福赛特是泛非主义的支持者，她回顾了自己在欧洲参加会议的经历，写道：“我们已经意识到，非洲殖民主义和美国黑人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面上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Impression” 15）在范·梅尔讲座的听众中，她不仅设置了美国黑人，还安排了西印度加勒比有色人种（Fauset, *Plum Bun* 218）。尽管听众们的民族、阶级、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被排斥的有色人种，构成大圆圈中彼此相交却不重合的小圆圈。这个设计在整部小说中并不起眼，但却是一个伏笔，预示“非洲性”的弘扬与多元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福赛特对打破多种族文化空间界限的呼吁和对建立一种新的世界公民身份的积极愿景。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一词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提出的一种超越城邦观念的身份认同，经发展与演变成为解决当代世界多种族冲突的一种重要的哲学主张，也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当代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ppiah）发展了“有根的”世界主义概念，即个人并不需要放弃其所属的国家或民族来构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世界主义“既尊重差异，也尊重真实的个人，还尊重以信念形式表达的人类感情”（*Cosmopolitanism* 114）。这与福柯的界限思想不谋而合，界限在被逾越的同时而又是其所是，每个人都应是大圆圈中彼此相交却又不重合的小圆圈，既保持特异性又拥有共同的人类情感。小说中，异国空间与跨国婚姻的多重协作推动了这种“有根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形成。正如坎德尔（Gavin Kendall）所言：“世界主义依赖于流动性。跨空间流动性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力。”（5）安吉拉跨国流动的目的地是巴黎。它既是艺术之都，也是最早发现并接纳非洲艺术与文化的城市，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非裔美国人融入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共

同体提供了可能。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著名诗人卡伦（Countee Cullen）曾说，对习惯美国社会粗暴拒绝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巴黎带来了一种人性化的体验（转引自Smith 207）。安吉拉选择“非洲性”作为她创作的镜像，其最好的艺术作品是一幅老黑人女佣画像，另一幅是根据她在纽约观察到的黑人状况而创作的“十四大街”。她的作品是对非洲文化的传播，更赋予了“非洲性”以世界意义，这恰巧也呼应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本质。尽管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强烈的非裔民族意识为特点，但它绝非是在原始与现代、非洲与欧美间的单一选择，而是体现着一种“文化间性”（刘英 7）。拿其阵地“哈莱姆”说，它既处于现代都市的内部，又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展现出一种复杂又矛盾的“文化间性”。通过艺术创作，安吉拉还传达了人类关于种族、性别、身份的共同情感，她相信跨越国界的人类尊严，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Appiah, *Cosmopolitanism* 137），希望构建突破界限但又互相尊重、保持个体存在界限的共同体。小说中频繁出现“颜色”一词，既指涉“作画”，也指涉“有色人种”。作画是对白色画布涂上颜料的过程，在隐喻层面上也暗示了世界不是“白色的”/“白皮肤的”，而是“五彩斑斓的”，由此超越了黑白的二元对立，为读者带来多元主义的思考。同时，作画也是一种对界限的操控，由此，空间的固化被打破，无限性被打开，其界限被重新划分，这种打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解放（张锦 122-23），赋予了身份的延绵与生成。

另外，福塞特将其角色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可能性植根于非裔美国人的家（Allen 55）。在《葡萄干面包》中，福赛特赋予了安吉拉的配偶以南美洲血统，他们组成了全球流散语境下的少数族裔通婚的美国人家庭，成为世界公民的代表。南美洲在福赛特的作品中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异常持久的存在——从《混乱一片》中梅森提到南美洲是一个可能的逃亡地，再到她的短篇小说《双重麻烦》（“Double Trouble”）中说西班牙语的劳伦汀。南美洲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小说的空间策略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即它作为一个另类和极端的“南方”，为美国黑人范式化的移居带来了不同（Popp 132）。小说中，安东尼的巴西血统使他们的婚姻跨越了多重界限。由于巴西以其种族混合而出名，他们的家庭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世界公民模型。福塞特对安吉拉和安东尼在异国的族际通婚显示出一种开明的、国际性的处理多元种族冲突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她的时代，或者说在许多批评家对福赛特的有限评价中都被忽视了（Birk 214）。

现实世界的福赛特进入了白人作家占主导的文学空间界限，为维多利亚式的感伤小说加入了种族元素。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对“文学空间的越界”讨论时曾说，写作就是从“第一人称”（我）进入“第三人称”（他/她）的过程（33）。通过写作，福赛特放下了黑人资产阶级精英身份，使其作品成为超出个人表达的外化。由此可见，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哈莱姆作家，福赛特绝非不入流，反倒还有超越之处，因此常与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并置对比。她对种族和性别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具有辩证性，表达出其对身体特征可操演性的肯定与自我差异的认同。而在《葡萄干面包》中，她笔下的安吉拉是其世界主义

实验的体验者。安吉拉的个人成长过程克服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性认知，体悟到了种族、性别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纠缠性。从而，她重新认识到越界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并非是以“否定界限那一头，认同界限这一头”为前提。最终，在跨国旅居与跨国家庭的双重背景下，安吉拉克服了失根的虚无感，拥抱了自己的黑人文化，又融入到更加广阔的人类文化与情感共同体中，获得了具有世界主义特点的新型黑人女性身份。福赛特对安吉拉的塑造为20世纪20年代乃至后世的黑人身份焦虑提供了文学样本，使黑人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身份的可能。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llen, Carol. *Black Women Intellectuals: Strategies of Nation,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in the Works of Pauline Hopkins, Jessie Fauset, and Marita Bonner*. Garland, 1998.
- Ammons, Elizabeth. "New Literary History: Edith Wharton and Jessie Redmon Fauset." *College Literature*, vol. 14, no. 3, 1987, pp. 207-18.
- Appiah, Kwame Anthony. "Pan-Africanism." *Africana: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edited by Kwame Anthony Appiah and Louis Gates Jr., Oxfor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2006, www.oxfordaasc.com/article/opr/t0002/e3057.
- .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W. W. Norton, 2010.
- Birk, Amy Simpson. *Moving Experience: Women and Mobility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Dis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2018.
- Blanchot, Maurice.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Ann Smock. U of Nebraska P, 1982.
- Burdette, Dallas R. *Biblical Preaching and Teaching*. Xulon, 2010.
- Chen, Yongguo. *Lines of Flight in Theory*. Peking UP, 2008. [陈永国:《理论的逃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Du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Oxford UP, 1959.
- Dymond, Justine. *Modernism at the Margins: De-Forming Sentimentalism in Mourning Dove, Virginia Woolf, Jessie Redmon Fauset, and Gertrude Stein*.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2004.
- Fauset, Jessie Redmon. *Blum Bun: A Novel Without a Moral*. Frederick A. Stokes, 1990.
- . "Impressions of the Second Pan-African Congress." *The Crisis*, no. 19, 1921, pp. 12-18.
- Foucault, Michel.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la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et al.,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Cornell UP, 1977, pp. 29-52.
- . "Madness. The Absence of an Oeuvre." *History of Madnes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Jean Khalfa, edited by Jean Khalfa, Routledge, 2009, pp. 541-50.
- Harrell, Willie J. "'I Am on the Coloured Side': The Rhetoric of Passing in Jessie Redmon Fauset's *Plum Bun: A Novel Without a Moral*." *CLA Journal*, vol. 52, no. 2, 2008, pp. 187-208.
- Hillier, Amy E. "Spati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Redlining: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vol. 14, no. 1, 2003, pp. 137-67.
- Kelly, Alfred, and Winifred A. Harbiso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W. W. Norton, 1948.

- Kendall, Gavin. *The Sociology of Cosmopolitanism: Globalization, Identity, Culture and Government*. Macmillan, 2009.
- Liu, Ying. "Loc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of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6, pp. 3-11.
[刘英:《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第3-11页。]
- Owomoyela, Oyekan.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A Critique of Pervasive Anti-Africanisms in Current African Studie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7, no. 3, 1994, pp. 77-101.
- Pfeiffer, Kathleen. "The Limits of Identity in Jessie Fauset's *Plum Bun*." *Legacy*, vol. 18, no. 1, 2001, pp. 79-93.
- Popp, Valerie. "Where Confusion Is: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Fiction of Jessie Redmon Fauset."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43, no.1, 2009, pp. 131-44.
- Sabot, Philippe. "Écritures transgressives et pensée de la transgression. Sade et Bataille lus par Foucault." *Da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292, no. 2, pp. 105-120.
- Singh, Amritjit. *The Novels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 Twelve Black Writers 1923-1933*.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76.
- Smith, Virginia. "African American Travel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Alfred Bendixen and Judith Hamera, Cambridge UP, 2009, pp. 197-213.
- Tomlinson, Susan. "Vision to Visionary: The New Negro Woman as Cultural Worker in Jessie Redmon Fauset's *Plum Bun*." *Legacy*, vol. 19, no. 1, 2002, pp. 90-97.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 of Minnesota P, 1997.
- Wall, Cheryl. *Women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 Indiana UP, 1995.
- Yin, Xing. *Women Writing the City: Studies on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Women's Fiction*. Tsinghua UP, 2015. [尹星:《女性城市书写: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 Zhang, Jin. *A Study of Michel Foucault's Ideas of "Heterotopias"*. Beijing UP, 2016. [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马妮娅

论吴宓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

◎ 刘争气

内容提要: 受白璧德文学思想影响,吴宓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思考,成为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文学功用论、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艺术形式三个方面,三者均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追求,但因当时中国国情、个人性情和文化论辩需要,其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并非全盘接受,甚至有部分偏离。研究这一接受现象,重提人文主义,旨在探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文学如何能适应新环境,发挥应有功用,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好路径。

关键词: 吴宓 白璧德 文学思想 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65-11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7

Title: On Wu Mi's Acceptance of Irving Babbitt's Literary Thought

Abstract: Influenced by Babbitt's literary thought, Wu Mi believes that "literature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are based on and oriented by his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 and hi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Wu's acceptance of Babbitt's literary thought covers mainly three aspects: literary functi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rtistic form, from which we can see his pursuit of humanistic value. However, at that time in China, national reality, Wu Mi's tendency toward literature and debates on culture made it unlikely for him to entirely process Babbitt's humanism, but rather to some extent deviate from it.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this acceptance and humanism is to explore how literature can be adapt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play its due fun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o provide a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Wu Mi, Irving Babbitt, literary thought, acceptance

Author: Zhengqi Liu, Ph.D. Candidate, Liberal Art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曾与同伴穆尔（Paul Elmer More）在美国发起“人文主义运动”。其人文主义思想突显人的中心位置，关注人的自我完善，尤其强调文学对于个体养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中，他由文学说开去，涉猎哲学、政治、文学、教育、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各大领域；在《新拉奥孔》（*The New Laocoon*）中，更是直接讨论“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生活”，以及“文学如何与人生关联”等命题。文学，在他认为，已然是实现其人文理想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1918年，吴宓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追随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是白璧德“读其书、听其教、明其学、传其业”的入室弟子，也是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最虔诚、最勤奋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吴宓认为：“先生之学说，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会通派如是说》26）。20世纪初叶开始，吴宓陆续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高校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本课程研究人生与文学之精义，及二者之关系。”（《文学与人生》1）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16），曾毫不掩饰地说：“我的工作和我的主要兴趣：文学与人生”（23），其文学思想深受白璧德思想的影响。

一、关于文学功用论的接受

文学到底有何用？吴宓曾在《余生随笔》的《诗以载道》篇谈及韩愈“文以载道”理论：“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如上所说者是也，予谓诗亦以载道。”（《吴宓诗话》43-44）这里的诗，我们可以放大到所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本身不仅蕴含了深厚哲理和普遍规律，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媒介，将这些哲理、规律艺术地传播出去，润物细无声地感化教育广大受众。这是吴宓集中抽象表述文学功用的基本观点。在“文学与人生”的课程中，他总结了文学的十大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文学与人生》59-68），还整理出一个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表，这是他关于文化功用论的详细阐述。承袭导师白璧德“文学与人生”大讨论的路数，他探索了文学如何与人生关联的具体问题。

其一，文学对个人的作用。吴宓在深入讨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时，向学生讲述了自己大量的诗歌创作经验，尤其是诗歌写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论证了文学与个人的密切关联。在讲授小说与人生时，更是提出“人生如戏”（31）的概念，这是小说与人生的关系，也是小说反映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如戏”指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不同角色，“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在后面关于“人生如戏”的注释中，其提出“小说

比历史更真，所以，小说高于历史”（41-42）。理由是历史只忠于时间、地点，历史记录人或会因党派和地方的利益，在记录自然历史时有所侧重和偏颇，而小说家忠于普遍、一般人的性格和生活，是从无数原型素材中塑造了典型人物。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作品，体会典型人物，平衡个人的感情，培养个人的道德，表现个人的性情，拓展个人的知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要达到此目的，人们应该关注文学，热爱阅读。其师白璧德论述了个人闲暇时光与阅读的关系。

白璧德曾提及达尔文工作闲暇时听人大声朗读小说，借此论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遗憾地表示“现代人把精力留给了科学研究、社会学或金融财政，当他转向纯文学时，他寻找的是某种抚慰的、温和的麻醉效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76）。诚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疯狂崇拜力量的大多数人，文学已然成为闲暇之时的玩味和消遣。甚至，有人即便在闲暇无事、百无聊赖之时也不屑于从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转而通过其他方式寻找刺激和满足。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让人内心充实、强大，趋向真善美？白璧德认为，古典主义、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者都很关注情感，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情感的载体。相对而言，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更关注于人的普遍命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悲哀”（《卢梭与浪漫主义》297），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则认为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在于表达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思想与情感，更多是小我一时的喜怒哀乐。所以，他很鄙视浪漫主义者这种不理智和自私的情绪，“当他一切顺利时，他从来不认为其他人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相反，如果他感到不舒适，他也要求每个人都陪着他一起不舒适”（294）。浪漫主义者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忧郁心理，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就像一座医院，大家都生病了；读他们的诗，就像是看他们在互相攀比谁更痛苦，谁更忧郁。这是一种很不健康、很不阳光的文学作品，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只会感觉到压抑和窒息，而不像古典主义或人文主义作品，倾向于道德提升和安慰，给人平静均衡之感。

吴宓在白璧德文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文学不是狭义的“世界上表达出来的最佳思想和言论”，而是广义的“在一个国家或在世界范围内，在一段时间或在整个历史时期内，用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写作的一切文学写作”（《文学与人生》13），他已然将其放大到一切学术文化。个人通过阅读和欣赏这些优秀文学作品，受作品内容所感染，从内心生出共情或思考，让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灵魂得以净化，感情得以升华，意志得以坚定，胸襟得以开阔，精神得以振奋”（刘清河 76），其教化功用不言而喻。

其二，文学对民族国家的作用。在白璧德看来，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是有人文标准、有节制的，其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作者本能、直觉、理性、意志、感情、想象等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性情元素的调节与融合。受其影响，吴宓批评写实派、浪漫派和自然派“专重性行元素的某一方面的文学绝非人性的正当和文学的正常现象”（《文学

与人生(二)》)。文学对社会经验的反映和描述,应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表现人生之常兼其变化,是“一与多”的调和。一部传世之作,必须选取典型的人生事实为题材,这种典型的人生应该是道德的、人文的,也即强调文学对人伦理道德的塑造价值。白璧德以人文道德为标准的文学批评,特别“强调其道德功能。他理想中的文学是融伦理与美学为一,而最高鹄的仍在其教化人生的作用”(沈松桥 130)。他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和教育价值,能揭示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能让个人从中读到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基本道理,然后再通过个人,特别是精英领袖式人物这一中介对国家社会施以影响,达到感化、引领社会大众的目的。

面对当时千疮百孔、羸弱不堪的中国,吴宓一颗赤热的士子之心早已按捺不住,想力挽狂澜于既倒、扶之大厦于将倾。但是,与寻求科技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爱国人士不同,吴宓另辟蹊径,主张道德救国,呼吁国人“欲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作育其进取之精神,则诗宜重视也”(《吴宓诗话》40-41)。这种诗教传统,也是白璧德关于文学道理伦理批评标准的题中之义,他们希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唤醒一国一民族的道德良知。

其三,文学对人类社会的作用。1921年,白璧德应邀参加留美同学会活动,发表了一段关于中西方人文教育观的演讲,指出“孔子始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认为“中国及欧西之教育界固有一休戚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希望当时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将美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精神主旨带回中国,掀起一场人文运动予以呼应,从而实现其国际人文主义的美好愿景。白璧德想掀起一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前提,是他看到了各国各民族文化表象“多”的本质下面蕴含了“一”这个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既然在更高层次有共同追求,那么各种文明、不同的文学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如果外国文学不能用来完善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狭隘、冲突、不完美的话,那我们就不值得为它们花那么多的时间”(《法国现代批评大师》198-99)。异域文学的解释功能得以显现。另外,当他意识到因科技进步、宗教式微导致普通民众信仰缺失和行为失范,他通过分析勒南(Ernest Renan)的文学思想,提出要借文学来弥补科学造成的内心虚无。文学应该关注、关心时代和世界,不应为艺术而艺术,而应该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

吴宓极力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观念。他一直主张艺术与道德应以人性为中心,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文无关于世道人心,不苟作也”,明确提出“造成大同世界”的文学功用论,认为“世界之平和,必求人心之相同。即须有同人之文化”(《吴宓诗话》40-41)。客观来说,文学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渐进式、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这与白璧德欲造成世界人文主义一样,都夸大了文学的功用,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或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象。

正因为守着这个乌托邦式的幻象,时处定倾扶危之际,吴宓特别希望通过自己所办的

刊物“唤醒国人、救亡图存”。自1922年至1933年,《学衡》杂志断断续续维持了十年,共出刊79期,耗费了吴宓大量的心血。1925年,吴宓调任清华大学牵头筹建国学研究院,《学衡》杂志尚未停刊,他又向张季鸾自荐,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自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每周一出版,6年共出版了313期。这其中,除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底吴宓游学欧洲,由浦江清代为主事之外,其他时间均由他亲力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学改良”思想已席卷天下,《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报纸杂志名声大噪之时,吴宓仍然坚持编辑出版《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坚持传统文化的人文立场,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勇士”,也被斥为“文坛怪人”(史飞翔 web)。

二、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接受

吴宓曾专门撰文《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在他总结的九条方法中,第四条即为“宜从摹仿入手”(孙尚扬、郭兰芳 263),从内容看,明显有白璧德文学思想痕迹。白璧德关于文学创作的“摹仿”观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摹仿”拒绝拟古主义和泥古主义,拒绝形式主义,是一种针对现实事物真诚创造的创作类型或方法。其二,真正的摹仿“不是根据事物的样子而是根据它应有的样子作摹仿”(Brennan and Yarbrough 90-95),创作者要发挥道德想象的主观能动性,从本质去把握,摹仿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事物目前是什么。不应该简单向人们提供现有的典型人的行动,而应该展示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理。这个真理即从“多”中提取的“一”,应该超越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筛除那些夸张、反常和怪异的特质,到达人文选择的最高境界。其三,模仿也要有创新。创新并不能抛弃传统,而是基于传统的创新。他批判了关于艺术创新的两种态度,认为新古典主义严苛维护典型性,限制创作冲动,抑制写作的原创性;而现代艺术的原创性因情感主义作祟又过于泛滥。现代人追求个性解放,不希望像古典主义那样靠吸收传统来获取原创,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否定、撕裂和摧毁,他们似乎不需要摹仿,创作的人物形象、构想的情节天马行空。但事实上,“真的原创性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43)。必须以批判的、实证的方法去摹仿传统,在摹仿过程中需要道德想象的参与。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关于道德摹仿的文学创作观,强调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向他人学习和借鉴,并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如何摹仿。首先,他认为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是从摹仿开始,“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论新文化运动》34)。其次,他认为“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彼人”(34)。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或手法的变化是因摹仿对象而发生变化,可摹仿的对象涉及古今中外,常换常新。同样,吴宓认为文学创作不应“止于摹

仿”，而是“起于摹仿”。为了说明这个规律，他指出：“作文者所必历之三阶段，一曰摹仿，二曰融化，三曰创造”（孙尚扬、郭兰芳 263），并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汇总。他以美国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叙事诗《伊凡吉林》（“Evangeline”）为原型，根据自己的想法增删补缀，摹仿改编成剧本《沧桑艳传奇》。原本想改编成十二出，最终只有四出在 1913 年至 1914 年间载于《益智杂志》，之后未能继续。

在具体文学作品对人生的摹仿观中，吴宓认为不应是直接的、不加选择和提炼的摹仿最原始的人生经验，不能像史官记事似的，准确无误摹仿和再现人生，那只是流水账，是不可取的，也是做不到的。那文学如何表现人生？关键是材料选择之后的“艺术加工”，“文学作品总的说来必须是‘创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文学与人生》17-19），应超越作者的主观和现实的客观，即艺术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是人生的精髓”（16），“好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作家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他对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19）。进而，吴宓借鉴汉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小说之素材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中“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16）的观点，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定位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人生与文学一样，必须发自内心，又必须用自我的生活经历去验证。要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吴宓曾发愿写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并取得好书名《新旧因缘》，主题、体裁原想效仿其甚为推崇的《红楼梦》和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主要内容和材料，也突出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描摹当时中国前后三四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遗憾未曾付诸实践。

事实上，这种表现人生的文学创作观在吴宓的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他结合传统诗人的诗歌创作经验和自身诗歌创作实践，主张诗歌创作的前提是有真挚的感情，不惺惺作态、矫揉造作，不能掺假。这种感情体现出对社会百态、人生疾苦、人性价值有选择的同情，而不仅仅是个人小我情感的铺张夸大。他对于诗作的要求，“首先是感情真挚，修辞技巧是第二位的”（《文学与人生》245）。诗歌创作的“高妙之笔”：“方法在以‘想象力’造成一种‘幻境’，而此幻境以文字为其‘媒质’。”（《会通派如是说》224）诗之媒质为文字。他将诗歌创作比作美术，援引美术创作的实境与幻境之说，美术示人以幻境，幻境乃实境整理、提炼、完善所得。这种整理、提炼的方法，首先要有意向的选择、取舍，不是全部采用，其次是对所选素材加以艺术的夸张和渲染。

谈到文学素材，吴宓放开视野，认为当今要从事文学创作，“当以中外、东西、新旧人生之总和”（《文学与人生（一）》）为选择素材。文学创作者、文学批评者和普通读者都要懂得文学的范围关乎人生的全部，这是进行文学创作、批评与欣赏的基础。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接触越发频繁，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生经验也随之变化。个人境遇丰富多彩，自然文学创作的选材范围也有必要随之扩大。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摹仿观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改良“八事”尖锐批评了

“摹仿古人”的文风，主要针对旧时文坛形式主义与拟古主义的陈规陋习，强调摒弃陋习、大胆创新；陈独秀论及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批评古典文学的弊端和不足。相较而言，吴宓主张今日为文之“正法”“宜从摹仿入手”，要通过经典诵读，掌握传统做法，并加以摹仿，并就新文化派的具体观点有所呼应。虽有将新文化派立场推到极端、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在新文化派摧枯拉朽颠覆一切的激进反传统的情形下，吴宓等学衡派文人主张“文章的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传统”（秦法跃 185），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改良的偏激做法起到制衡、纠偏和补救的作用，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广大学者开辟了另一番天地。

三、关于文学艺术形式观的接受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典型的内容和形式共同成就的，缺一不可。对于主张节制、痛恶放纵的白璧德来说，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自由放纵都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思想感情不加节制，其后果将是文学作品形式失范，滑向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花哨恶伪的印象主义”。这种无节制的结果，他称之为“粗野”和“原始”（转引自童焯钢 47）。在他的观念中，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典范，其规矩的形式应该是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摹仿的范本。随着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对于外在权威的过度强调，对摹仿法则的教条主义和机械方式的理解，形式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文艺复兴以降，浪漫主义者创作的那些外在形式多样、修辞华丽的作品博人眼球，但终归是形式不严肃、不严谨、不严格的。他时常批评很多文学形式过于混乱，比如诗和散文的混淆，比如戏剧形式的变化，比如小说形式的独特个性化。他认为不同文学形式应是有一定标准约束的，形式美是古典作家的重要特色。他曾赞赏勒南拥有完美的文学技巧，评价勒南“是散文风格的完美大师”（《法国现代批评大师》202）。事实上勒南早就发现“形式的浪漫主义是个错误”（201），因此他一直坚守法国散文的古典主义信仰及对“古代好教养文学流派”（201）的兴趣。

有人认为产生古代文学的一切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如果摹仿古人的文学形式，将很难释放自己的情感、很难表现自我的个性，不是自己灵感的自然流露。例如雨果认为浪漫主义文学解放了古老的诗歌形式，呼吁“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134-35）。白璧德认为这是卢梭式浪漫主义者常用的诡辩，隐含了其把贵族式判断和选择从灵感和兴趣标准中彻底剔除的巨大阴谋。他主张文学形式的规整和规范，不赞成卢梭式信马由缰的流行诗，认为他们在试图摆脱形式主义的同时也摆脱了形式，一切都没有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可变的。他曾从“永恒的人性、人之法则和读者接受的角度阐

述了文类应该秉持简单原则的原因”（秦法跃 185），强调不同文学体裁、文学形式之间应有鲜明界限，应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不应过多地相互借鉴，以致各类文体混淆不清。

吴宓在译介白璧德的文学思想时，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曾有此观点：“欲艺术之尽善尽美，仅有精湛之材料尚不足，而必须有既整齐且有变化之形式，以表达之而范围之。其形式愈臻完美，则愈能显示一种宁静之精神。”（《会通派如是说》71-72）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契合，“形与质不可分离，相合而互成其美”（221）。显然，他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类观，认为各文类之间应分清界限。但如何才能做到形与质不分离，而互成其美？吴宓从诗、文、小说、戏剧、翻译五类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分别提出内容和形式的建议和要求（孙尚扬、郭兰芳 268-77）。关于文学作品的“质”与“形”，仍然没有超越白璧德人文主义标准、典型、规范的审美追求，强调不过当、不失范，要规矩、要典型，要符合古典的文学传统。

既然文学是人生的表现，那该如何表现呢？吴宓认为不同的文学体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诗是蒸馏（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冰）的人生。戏剧是爆炸的人生”（转引自朱寿桐 142）。在论述诗与文的差别时，他认为文重思想，诗重感情；诗歌讲究音韵和节奏，而文则无此讲究。在综合中西古今对于诗、文这两种文学体裁的认识后，将其定义为：“诗者，以切掣高妙之笔，（或笔法）具有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会通派如是说》219）“文者，以文字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比较论之……故文主以理服人，而诗则主以情动人”（220）。在此基础上，吴宓将诗、哲学、小说绘成一幅关联图：

诗（情）精神

哲学（理）理想、情感

小说（事）事实

（《文学与人生》25）

关于文学的形式之美，应该包括“空间之节奏”“时间之节奏”（声音的时间长短，但不是诗之特定音律说）。吴宓直接借鉴白璧德在《新拉奥孔》中有关文类的观点，提出诗的载体和媒介是文字。从空间和时间的节奏角度予以分析，诗的美依附于文字，不同文字有不同的形声规律，不同文字的特点即能确定诗的性质和特点，比如拉丁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在诗歌写作中呈现不同的音律特点。面对新文化派的偏激言行，吴宓有意借历史上杜甫与韩愈的两次“文学革命”，暗讽当时“文学改良”中诗文形式改变的弊端和问题。当时新文化派作自由诗之现象，“实由于不知形与质不可分离之理，应并重而互成其美，不应痛改而同归消灭”（《会通派如是说》222）。他主编的《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中，刊载的文学作品均为文言文，尤其是诗歌，均为旧体诗，其本人亦有大量旧体诗

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但几乎不见新文学相关作品，尤其是新诗。这一度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导致后来沈从文等另起炉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宣传阵地上让吴宓的旧文学生存空间愈发逼仄。

综上，吴宓的文学思想打上了白璧德的深深烙印，但因当时中国国情、个人性情和文化论辩需要，其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并非全盘接受，甚至有部分偏离。

其一，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联问题。白璧德并非象牙塔内的纯学院派，他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文学的目的最终指向政治。吴宓虽然向国民译介了《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一文，但他“始终坚持纯粹的文化学术立场，其关于中国文化现实的思考也只局于思想文化层面，而并未与社会政治人生有所牵涉”（段怀清 121）。或许，这与他始终坚持“不偏不党”，保持独立思考，纯粹从文化和文学研究角度出发，崇尚立言立行的立场有关。尽管1929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但与新文化派截然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作品对现实革命不具有直接作用，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和价值，除去其现实社会意义，还更应强调其伦理价值。因此，文学创作应该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应避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在他看来，“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论，没有走向文学工具论和文学教化论，是他不同于同期学人之处。但在那个呼唤民主、争取民权、关注民生的时代，民众政治意识已被点燃，吴宓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看似是为了保证学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可“当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便脱离了其所产生的背景及其要对质的命题，从而逐渐失去生命力”（张源 5-6）。这无疑是他乃至学衡派的缺憾。

其二，固守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吴宓批判新文学，其重要原因在于认为其破坏了传统文学的形式美，尤其是诗歌。他所推崇的诗人及出版的《吴宓诗集》，均沿用旧体诗歌体裁和形式。虽然后来为了让“旧文学”焕发新的生命力，提出“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想法（《会通派如是说》247），但核心仍是保存古代文学的形式，重点在体裁和格律。他在分析、批评诗歌创作的时候，仅仅停留于普通、浅层次的文学形式的批评，只是从媒介的角度指出不能混淆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界限，并未从具体的文学样式、文学体裁超越出来，站在人文主义批评的高度，从人类永恒价值追求的审美角度，将文类区分开来文学批评，这是他文学批评实践理论的不足。相反，白璧德对文学形式的理念是实证的，体现了对现代的兼容，而不是排斥，视野和格局更为广阔。

其三，心存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吴宓对文学创作有着浓厚兴趣，曾发愿写三部作品。从其面世的文学作品来看，浪漫主义倾向最明显的是诗歌。他认为“作诗尤贵诚”（《吴宓诗话》65），其诗作感情真诚、热烈，有着鲜明的个人文化思想与生命人格特色，尤其是关乎毛彦文、陈仰贤、卢葆华等女性的爱情诗作不可谓不直白大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与其人文主义内敛、中庸、控制、调适的文化追求相去甚远。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倾向，其根源

在于吴宓内心两驾马车的分裂，现实人生与文化追求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然而，这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他内心真正的依靠和向往。他自己不止一次表露对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喜好和崇拜。

但总体来说，吴宓接受白璧德文学思想中对人的特殊关注，提出“文学是人生表现”的文学观点，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界，这都是有益的探索，其提出的会通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主张也是积极和正确的。

今天，我们研究吴宓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重提白璧德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第一，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跟随科技的脚步高歌猛进，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式微，文学如何能发挥一贯的“文以载道”功用，涵养心性，拯救人们“落下的灵魂”？第二，达尔文进化论关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已然成为人们思维的惯常，且愈发深入影响人文社科思维模式，影响人类审美，导致人迷信明天更美好，陷入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浪漫主义狂想，而现实往往使人的幻想破灭。受长期的自然科学思维影响，让人对力量盲目崇拜，文学如何发挥道德教化作用，让人文社科思维对自然科学思维有所牵制或纠偏？第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巨大变化。文学如何适应新环境新技术，在质和形中找准变和不变，并作出适当调整，有效发挥诗教传统价值作用？诸如此类，文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应该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的。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bbitt, Irv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Translated by Xianxiao Hu, *The Critical Review*, no. 3, 1992. [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载《学衡》1922年第3期。]
- .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Yixue Sun, Guangxi Normal UP, 2002. [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Translated by Pei Zhang and Yuan Zhang, Peking UP, 2004. [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Translated by Yixue Su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Brennan, Stephen C., and Stephen R.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Twayne Publishers, 1987.
- Duan, Huaiqing. "Three Outcomes in Three Aspects by Three Routes: Irving Babbitt's Influence in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1, 1998, pp. 118-30. [段怀清：《三个层面、三条途径、三种结果——欧文·白璧德在中国》，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第118-30页。]
- Hugo, Victor. "Introduction of *Hernani*." *European and American Classical Writers' Essays on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II*.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1, pp. 134-35. [雨果：《〈欧那尼〉序》，载《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4-35页。]

- Liu, Qinghe. "A Review on Wu Mi's 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Han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1991, p. 70-80. [刘清河:《吴宓文学观散论》,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70-80页。]
- Qin, Fayue. "On How Babbitt's Neo-Humanism Influences Wu Mi's 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9, no. 3, 2012, pp. 184-86. [秦法跃:《论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观对吴宓文学观的影响》,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9卷第3期,第184-86页。]
- Shen, Songqiao. *The Xueheng School and the Anti-New Culture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Publishing Committee of College of Arts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4. [沈松桥:《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中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委员会,1984。]
- Shi, Feixiang. "Wu Mi: A Much-Respected Man in Long Gown." 1 Apr. 2020, baijiahao.baidu.com/s?id=1662775909048109103. [史飞翔:《吴宓:一个穿长衫的先生》,2020年4月1日, baijiahao.baidu.com/s?id=1662775909048109103。]
- Sun, Shangyang, and Lanfang Guo, editors. *The New Theory of National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Cultural Treatises of the Xueheng School*.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5. [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 Tong, Weigang. "The Critical Review and Babbitt."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no. 2, 1986, p. 44-50. [童炜钢:《〈学衡〉与白璧德》,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44-50页。]
- Wu, Mi. "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ritical Review*, no. 4, 1922, p. 25-75.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1922年第4期,第25-75页。]
- . "Literature and Life I." *Ta Kung Pao Literary Supplement*, 9 Jan. 1928. [吴宓:《文学与人生(一)》,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月9日]
- . "Literature and Life II." *Ta Kung Pao Literary Supplement*, 30 Jan. 1928. [吴宓:《文学与人生(二)》,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月30日。]
- . *Literature and Life*. Translated by Minyuan Wang, Tsinghua UP, 1993. [吴宓:《文学与人生》,王珉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 . *Thus Spoke Huitong Branch of Wangxue: Essays of Wu Mi*. Edited by Baogeng Xu,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1998. [吴宓:《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徐葆耕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 *Wu Mi's Commentaries on Poetry*. Collected by Xuezhao Wu,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吴宓:《吴宓诗话》,吴学昭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Zhang, Yuan, editor. *American Humanism: Tradition and Renewal*. Beijing Normal UP, 2017. [张源编:《美国人文主义:传统与维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Zhu, Shoutong. "A Book on Life and Rites for Modern Humanism: Wu Mi's *Literature and Life*."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s*, no. 2, 2005, pp. 139-46. [朱寿桐:《现代人文主义的人生礼教读本——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39-46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翻 译 研 究

新知·国故·教科·译名

——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实践及优良举措考察

◎ 朱含汐 冯全功

内容提要: 国立编译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官办编译机构, 在民国社会有较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本文通过爬梳一手档案材料, 详细梳理了国立编译馆在统一学术名词、翻译西洋名著、编审教科书、整理和译介中国经典四个方面的实践和成果。作为官办机构的国立编译馆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 1. 制度化的编译实践满足了国家治理的需求; 2. 集约型的智力配备充分整合了国内文化资源; 3. “编-译-审”一体化, 在互动和“接力”中共享项目成果; 4. 兼顾学习新知和发扬国故, 坚持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国立编译馆的实践活动在中国的翻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推动了民国社会的文化重建工作, 对当代翻译与出版机构的运作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国立编译馆 民国 翻译机构 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076-12

基金项目: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翻译概论》学研结合教学模式探索”(TIJZWWT202001)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8

Title: Western Knowledge, Chinese Classics, Textbooks, and Terminology: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and Good Practices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ICT), as the highest government-run translation institut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erted a stro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NICT in unifying academic terms, translating western books, editing and reviewing textbooks, as well as compiling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Good practices carried out by NICT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practice meets the nee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2) the intensive intellectual assembly fully integrates domestic cultural resources; 3) the integration of compilation, translation and review helps share and relay its achievements; 4) the balance between absorbing western knowledge and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s it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onfidence. On the whole, NICT played a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enlightens the operation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institutes.

Keyword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ion institute, translation history

Authors: Hanxi Zh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Quangong Feng,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民国时期（1912—1949）作为中国近现代的转型时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翻译和编译机构百余种（廖七一等 241）。其中，国立编译馆（1932—1949）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最高官办编译机构，负责编审教材、整理国故、厘订名词、译介名著等切合中国当时所需的编译项目，具有较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为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学界对国立编译馆的关注不多，且集中于教材编审的研究（吴小鸥、石鸥 166-80；吴涛 170-81）和科学名词的统一问题（温昌斌 71-78；张剑 24-35；冯志伟 351-72；黄晓蕾 140-44），鲜见对国立编译馆编译活动的整体关照。本文基于胡喜云等人（102-10）的研究，通过爬梳国立编译馆原始档案和相关材料，旨在梳理其机构沿革，明其源流脉络；整理其编译项目及成果，重新审视其学术和文化贡献；探讨国立编译馆的编译特色和优良举措及其对当下翻译机构运作的借鉴意义。

一、国立编译馆之机构沿革

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出将教育部审定处改为国立编译馆，并制定招考章程，是为民国时期官方翻译机构的嚆矢（黎难秋 398）。但由于时局动荡，无突出业绩，不久便被裁撤。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朱家骅和陈立夫提出设立编译专处总领译事。次年5月，国民会议决定设立国立编译馆“以促进科学教育”，“编译中小学教科书及学术专著以宏文化”（《国立编译馆一览》1）。1932年6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原教育部编审处为基础，正式建立国立编译馆，在南京运作至抗日战争爆发。1937—1946，国立编译馆先后辗转庐山、长沙、重庆巴县，最后落脚重庆北碚，在大后方进行翻译出版活动（陆殿扬 11-16）。1946年由于抗战胜利，国立编译馆从重庆迁回南京，但途中的“怡康轮”沉没事件，导致大量文献、图书和译稿丢失。^[1]1949年初，国立编译馆的人员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员随南京国民政府迁至中国台湾省，并在台北市复馆，负责台湾地区的图书编译、教科书审定等文化学术工作长达60年左右^[2]；另一部分留守馆员在南京解放后，于1949年底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接管。本文主要聚焦1932—1949年国立编译馆在大陆地区的编译活动。

二、国立编译馆之编译实践概述

编译的内涵较为丰富，从不同角度界定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对象。本文探讨的编译并非一种翻译方法，而是指“编”（编辑）和“译”（翻译）两种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的活动。在国立编译馆中，这种实践活动比较明显，尤其是相关辞典和教材的编写，都涉及翻译活动。通过爬梳该馆的原始档案材料，本文将国立编译馆同时涉及“编”和“译”的实践活动分

为四个方面：统一译名、编译教材、翻译西书和译介中国经典。

（一）统一译名，编订辞典

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译译外籍，名词纷歧，学者苦之”（《国立编译馆一览》2），高凤谦、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先后提议统一名词。1909年，清政府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1915年，学术团体组织成立科学（医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大学院专设译名统一委员会（《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9）。国立编译馆自成立后，把统一译名作为该馆最切要的工作，全力以赴编订学术名词。程序上，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法、德、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予取舍，妥为选译”。再由教育部聘定的国内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和修改，最后呈请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2）。国立编译馆的译名统一工作严谨细致，为编订名词，曾大量购置海内外中、英、法、德、日、拉字典180余种，约470册，以备参考（《国立编译馆一览》25）。例如编译馆出版的《天文学名词》一书分为天文学名词、星座录、西文索引和中文索引四个部分。在天文学名词部分，每则名词按照英文名、德文名、法文名、日文名、中文名的顺序排列。所有名词都经过天文学审查委员会委员缜密考订，方可公布（《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3）。据笔者考证，至1946年，编译馆已完成和进行中的学术名词编订总计93种（《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9），按照学科性质可分为14大类：理学、物理学、化学、工学、医药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政法学、经管学、农林学、艺术学、教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边疆地名、外国地名、外国人名、历史名词）。编订的名词涵盖学科广泛，自然科学类多于人文社会科学类。

在译名统一工作的基础上，国立编译馆又着手编译专科辞典、各科辞典和大英百科全书。专科辞典是对已经公布的学术名词，“译源诠义，著为专书”（《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4）。各科辞典是针对中等学校师生、大学初年级学生设计的，分国文、公民、历史、地理、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矿物十科。同时，编译馆还邀请国内专家共同拟定人名和地名的音译标准。例如，读音方面首先依照“标准国音字典之音读。不足则添势力最大之方音读法，如吴语、粤语、闽语等。更不足则益以历史音读，暂以Karlgren（高本汉）之分析字典为标准”^[3]。同时详细规定了外语的重音、注音符号、声母韵母分合等标准，通用已久的重要地名、人名、国名则以保留旧译为原则（如伦敦、威尔逊、泗水等）。“科学术语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冯志伟 349），国立编译馆在借鉴外国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自主编订中国的学术名词和译名标准，提出的各科术语草案于1950年被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术语标准化的工作进程和“术语学”的建立。

（二）编译教材，治理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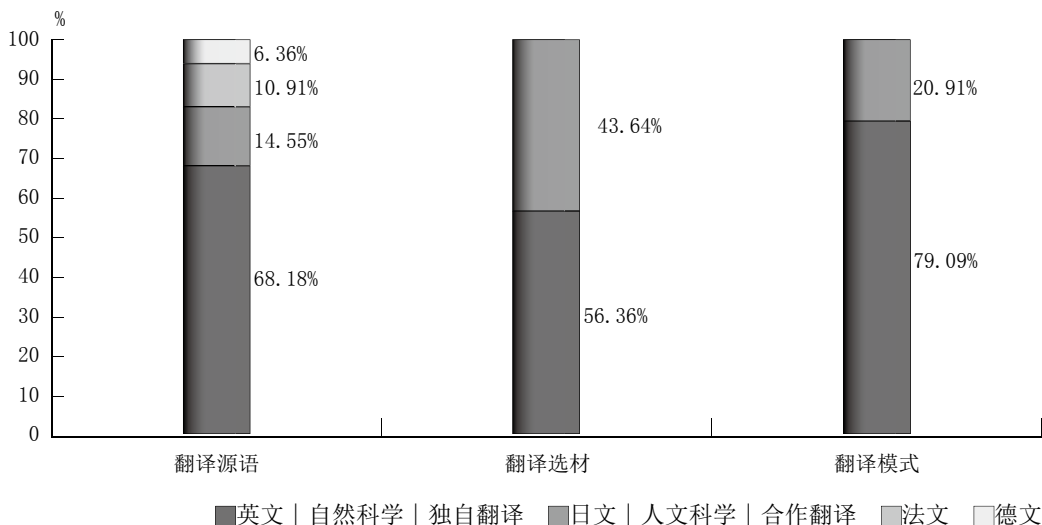
国立编译馆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以治理教育为该馆的工作重点之一：编译

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新学刚刚兴起，大多教材的编写都会涉及翻译。自清季兴学以来，市面上出现的中小学校教课用书多达 5000 余部（《国立编译馆一览》26）。相应地，政府也格外重视中小学教课用书的编审工作，坊间出版的课本必须经政府审定方可使用。1932 年教育部设置教课用书编辑委员会，1942 年该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教育部遂规定中小学教课用书均由国家编辑，即国立编译馆负责办理。同时期，教育部于 1939 年颁布大学科目表，由国立编译馆主持编纂大学用书。按照计划顺序，国立编译馆先后编辑各学院共用的必修科目用书、各学系必修科目用书和各年级选修科目用书。编辑方法有三：（1）采选成书，即甄选坊间已印行的大学用书，征得原著者和译者同意后，加以修订，作为部定大学用书；（2）公开征稿；（3）特约编著（《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1）。据国立编译馆记载，至 1946 年，国立编译馆共完成（包括已出版、已付印、审校中）小学课本 113 册，中学课本 48 册，已出版和付印的大学用书有 73 种（《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1-2）。由此可见，国立编译馆的教材编译实践不仅扭转了民国时期教材匮乏的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良莠不齐的教材市场，加速了近代中国教材建设的本土化进程。

除了编译教材，国立编译馆还会对中小学、师范学校、专业学校、民众学校的教科书、参考书、史地稿本和地图定期进行审查，以治理教育。例如，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中提到，程瀚章著的《复兴初中卫生学》未经审定便由商务印书馆擅自发行。国立编译馆对该书已审查两次，评定结果分别为“本书内容错误及欠妥之处甚多，应令修正后，准予审定”和“本书虽经修正，但错误之处尚属不少，应再行修正后，准予审定”^[4]。另外，国立编译馆还极其关注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曾翻译出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所著的《中国教育之改进》。1931 年国联派四名专家来华考察教育，并撰写报告书，讨论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及成人教育的现状和不足。此书的中文版出版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还曾用近五页版面进行评介（豪楚 107-12）。综上，国立编译馆主持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课用书的编译和审定工作，贯穿了我国的整个教育体系，“是百年中国教科书波澜壮阔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一段”（吴小鸥、石鸥 178），是近代中国官方机构主导的教材建设标志成果，见证了战争环境下国家为规范教育所做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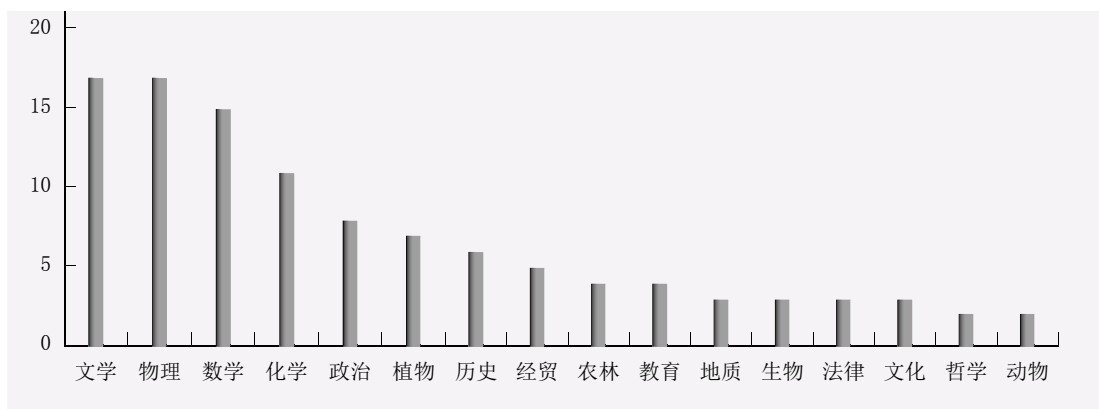
（三）翻译西书，启迪民智

学习世界新知是明末以降翻译活动的最大功用和目的。国立编译馆自成立起便开始翻译国外有影响力的图书，尤其是在重庆北碚的几年，西书翻译事业蒸蒸日上。笔者通过细读国立编译馆的档案材料^[5]，并在国家图书馆（www.nlc.cn）数据库以“国立编译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整理出编译馆在 1932 年至 1946 年间翻译和编译成中文的图书共 110 本（包括教材、专著和大众读物），并将其按翻译源语、翻译选材和翻译模式进行分类。



▲图1 国立编译馆翻译图书情况概览（总计110本）

如图1所示，国立编译馆选译的作品源语有四种，最多的是英文有75本，其次是日文16本，再次是法文12本和德文7本。由于编译馆会对转译的图书进行标注说明，所以除了希特勒的《我之奋斗》和科恩（Lassar Cohn）的《有机化学实验法》是德文原著，从英文转译的，其余各书应该都是直接从源语翻译。从这点也可管窥国立编译馆小语种译员的阵容与实力。翻译模式上，国立编译馆采取独立翻译（87本）和合作翻译（23本）两种模式。独立译者多为国内领军学者或大学教授，被编译馆聘为“特约编译”。合作翻译模式多指专家学者加国立编译馆编译员，如《光学之研究》由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钰哲和国立编译馆编译吕大元合作翻译完成，《量度之精密及图解法概论》由吕大元与国立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助教吴荫圃合作完成，《苏联新文化》由潘硌基等8人合译完成。编译馆根据翻译任务的难易程度，选取灵活的翻译方式，提高了翻译效率和译本质量。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评价《中国教育之改进》的翻译虽然“出自众手，而议论一贯，文字整饬，此甚可贵也。译笔亦通达明昌，值得一读”（豪楚 112）。翻译选材方面，自然科学（56.36%）略多于人文社会科学（43.64%）。如图2所示，编译馆共翻译人文社科类图书48本，包括政治、历史、经贸、教育、法律、文化、哲学和文学8类；自然科学类图书62本，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地质、生物、动物、植物和农林8类。其中，人文社科类翻译图书中文学类（17本）最多，包括戏剧、小说、文论、自传、游记、概论等，详见表1。



▲图2 国立编译馆翻译图书主题 (总计 110 本)

表1 国立编译馆文学类翻译图书一览

书目	原著名	原著者	译者
英文当代四小说家	<i>Four Contemporary Novelists</i>	Wilbur L. Cross	李末农、章绍烈、蒋石洲
英文小说发展史	<i>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i>	Wilbur L. Cross	周其劭、李末农、周骏章
英国文学史	<i>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i>	Moody W. V. and Lovett R. M.	刘无忌、曹鸿昭
莫里哀全集	<i>Molière oeuvres complètes</i>	Molière	王了一
莫里哀全集(二)	<i>Molière oeuvres complètes</i>	Molière	王了一
裴斯泰洛齐	<i>Pestalozzi</i>	F. Anderson	阮春芳
亚里士多德论诗	<i>Aristotle's Poetics</i>	W. Hamilton Fyfe	孙培良
英国文学简史	<i>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i>	George Saintsbury	周骏章
莎士比亚靠信录	<i>The Facts about Shakespeare</i>	A. Neilson and A. H. Thorndiles	厉鼎燧
亚肃王之死	<i>King Arthur Stories from Malory</i>	O. Stevens and E. F. Allen	周骏章
法显传考证	考證法顯傳	足立六喜	何健民、张小柳
诗经研究	<i>Shi King Researches</i>	B. Karlgren	张世禄
现代俄国文学	<i>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i>	S. Mirsky	李贯英
苏俄文学	<i>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i>	Gleb Struve	陈瘦竹
现代法国文学史	<i>Tableau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i>	Strowski	卢月化
我之奋斗	<i>Mein Kampf</i>	Adolf Hitler	周其劭
咆哮山庄	<i>Wuthering Heights</i>	Emily Bronte	梁实秋

总体来看,国立编译馆选译的图书可分为三部分:(1)在各专业领域具有引领或介绍作用的专著,多作大学教材使用,如《英国小说发展史》、《光学之研究》、《细胞学概论》等;(2)应战时所需,关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图书,如《日本侵华排外之教材和言论》、《意大利外交殖民政策》、《战时经济学》等;(3)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专著,以日本学者所著居多,如田崎仁羲著、李孟心译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其中,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记录了他1902年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结果,

在苗学领域具有创始意义。《图书展望》曾评价“冀欲在其（苗族）生活及文化方面，加以认识或改良者，当于本书得之”^[6]；足立喜六的游记体著作《法显传考证》是从印度浮海线至中国海线路航线的最早记录，被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指南。简言之，国立编译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制订了不同的选译计划，但外译汉编译工作的主要目的始终是学习新知以启民智，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文化重建。

（四）整理国故，译介经典

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厚，但“多散漫无纪，致不易寻其嬗递之迹”（《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19）。为发扬中华文化，以便传世和后人研究，编译馆决定综合群籍，网罗散佚，以科学方法整理我国固有文化典籍。例如，国立编译馆对我国山川江河进行实地调查，编纂水文、气象、地质等志书和地图。编译馆还在前人已编《全唐诗》的基础上，汇编了《全宋词》300卷（共收录19752首）和《全元曲》228卷（共收录散曲5000首和杂剧159种）（《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3），不仅发扬了宋元两代的文学特色，同时实现了中国诗词曲的连贯汇通。

国立编译馆深感“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之一支，欲沟通东西文化，除翻译西洋名著外，对于中国重要典籍，亦须译为西文”（《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11），遂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拟将我国固有文化择要译介。其计划有二：（1）翻译中国名著，如《史记》和《资治通鉴》，主要由翻译委员会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负责；（2）编译文化史丛书，如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建筑史、陶瓷史、绘画史、工业史、音乐史、戏剧史等。根据《国立编译馆工作报告》记载，1946年时各类丛书的中文稿均已完成。杨宪益和戴乃迭也已经翻译完成《资治通鉴》周纪、秦纪、汉纪，钱穆著的《中国文化史》和阎金铎著的《中国戏剧史》也已完成。后经学者统计，杨宪益夫妇在国立编译馆期间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还包括小说《老残游记》、唐代变文《燕子赋》和《维摩诘经变文》、苗族创世诗《苗本事谣》，陶渊明、温庭筠、李贺、艾青和田间的诗若干首，以及郭沫若的剧本《屈原》和阳翰笙的剧本《天国春秋》。遗憾的是，《资治通鉴》译稿由于战乱未能及时出版，后来全部遗失，但“此举成为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辛红娟 570-71）。另外，多数学者将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史记》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外文局的中国文化译介计划（罗琳 61-62；高风平 58-66）。但据笔者考证，梁实秋在1946年之前就公布了让杨宪益翻译《史记》的计划，故杨译《史记》应最早开始于他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时期。

三、国立编译馆之官办特色及优良举措

民国时期的大小编译机构不下一百家，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际编译社、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中山文化馆、海事编译局等。既有机关部门、报社、基金会主持的，也有社团、学会和私人发起的。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国立编译馆具有鲜明的制度化特点和超越同时期其他翻译机构的运营理念。

（一）官办特色：国家治理之需

当翻译实践的主体或赞助人为国家时，翻译活动便有了“治理性”和“使命色彩”（韩淑芹 79-84）。国立编译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附属机构，其运营和实践呈现高度的制度化特点，以满足国家的治理需要。具体表现为：

1. 翻译机构国家化：运营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虽然每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资金来源稳定，每月可领一万到一万三千元的经费（《国立编译馆一览》26），以保证各项工作如期开展。但同时，编译馆的重要工作和规章制度皆需听从教育部指示，馆内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办事流程也较为烦琐。

2. 译者身份体制化：国立编译馆的馆员有严格的聘定标准，任免升迁均需呈教育部备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工作。编译馆会定期对编译的工作进行考核，按考核结果评定薪资等级，一定程度提高了馆员的工作动力和编译质量。

3. 翻译规划政策化：当翻译走向制度化后，翻译规划相当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翻译活动注定要受制于国家战略并为国家文化和外交服务”（任东升、高玉霞 22）。一方面，国立编译馆根据国家政策，不断调整编译计划，如 1941 年编译馆增设翻译“关于边疆学校民众需要之边疆国文图书”，聘定人员时也“酌用精通边疆国文之人员”（《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1941）》web）。另一方面，国立编译馆不断扩充和改组，以配合国家大政方针。如 1942 年 8 月编译馆增设梁实秋主持的翻译委员会，在此之前翻译工作是在人文组、自然组等其他组别中交叉进行。

4. 翻译选材层级化：即优先考虑符合国家利益和时代所需的题材。例如 1933 年《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决定编译五类图书项目：“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者；关于世界专门学者所公认具有学术上之权威者；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者；关于教育上必要之图书；关于学术上之名辞”（web）。1941 年，国立编译馆为满足战时所需，在前者基础上又增加了三项编译项目：“关于各级学校教课及参考需用图书；关于各国新近出版各种科学书籍，足资教育参考者；关于边疆学校民众需要之边疆国文图书”（《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1941）》web）。又如，翻译委员会选译的作品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在此前提下，译者才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翻译作品（胡喜云 106）。

5. 翻译审查规约化：国立编译馆会对所有经手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教科书。编译馆规定审查完毕的教科书需要在《教育部公报》上宣布九项内容：书名、册书、定价、作者、送审者、某种学校用、审定日期、执照号和失效日期（《国立编译馆一览》17）。

翻译既是治理的方式，也是治理的对象（高玉霞、任东升 30-39），而翻译之“治”的

实现有赖于特定的翻译之“制”（韩淑芹 79-84）。从成立起，国立编译馆的翻译活动就与政治活动联盟，在民国时期的特定场域中发挥其历史使命作用，亦即民国政府出于治理需要的翻译决策通过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审查和出版制度得以贯彻；同时，国立编译馆在编审教科书、编订学术名词、翻译西书等方面的实践成果又推动了民国政府的治理。

（二）优良举措：翻译机构之鉴

集约型智力配备。一方面，国立编译馆背靠南京国民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人才储备，抗战胜利后人员不断壮大，到1947年编译馆设编纂15—25人，编审20—30人，副编审25—35人，助理编审30—40人，特约编审5—10人（《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1947）web》），即该馆专门从事编译事务的人员可达95-140人，在当时可算相当大的规模。同时，国立编译馆从初始就对馆员的资质要求很高。1925年署名“伯山”的文章《国立编译馆投考记》提到“我没有著作品，所以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员我是不配考的”。^[7]另一篇报道《国立编译馆开始口试》提到“国立编译馆当局，对各处所送之著译等件，业已审查完竣，请申请者到馆进行口试”。^[8]由此可见入选国立编译馆的门槛之高，不仅需要代表作品和地方推荐，还有严格的口试和笔试进行选拔。但也正是严格的人员选拔和大规模的人才储备，才使国立编译馆有能力完成“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编译项目，也有资质涉足中、英、法、日、德、拉等多语言翻译工作，以及少数民族、边疆事务等民族翻译活动。另一方面，国立编译馆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可以充分调动国内外的学术和文化资源。据笔者统计，国立编译馆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光华大学等20多所顶尖高校和研究所都有密切合作，吸引了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董爽秋、文学翻译家梁实秋、戏剧家陈瘦竹、语言学家王了一（王力）等业界精英为其编译和撰稿。这些“特约编译”人员大多在政界和学界担任要职，极大地保证了该馆出版物的编译质量和社会的影响力。

一体化工作模式。国立编译馆有着清晰的目标规划，工作流程环环相扣，“编—译—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采用“交互”和“接力”两种模式共享项目成果。例如，教育部公布的《修正教科图书审查规程》第三条规定“学校用教科书含有科学名词及外国人名、地名及其他专名者，须编中外名词相互对照表”（《国立编译馆一览》17）。编译的标准则按照国立编译馆审订，教育部公布的科学名词。简言之，国立编译馆将统一后的学术名词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投放进市场检验，收到问题反馈再加以修正。与前期的“译名统一”工作相比，国立编译馆的“编审互动”模式真正落实了新名词的推广使用，加速了近代书面语言的规范进程。再如，编译馆采取“学科专家+职业编译”的合作翻译模式，形成了翻译与学术的高效互动，确保译著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表达的双重准确。国立编译馆的“接力”实践模式则包括：编译馆初期“整理国故”的成果为后期的中华文化外译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翻译选材；学术名词的编订大大助力了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等。另外，民国时期有很多民间组织从事

翻译活动，但都苦于找不到出版社发行，导致译稿丢失，心血白费。国立编译馆的图书和刊物编审完成后，直接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保证了该馆出版物的时效性和成书率。总之，国立编译馆之所以在短短十余年间完成诸多大型编译项目，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一体化的运营模式。编订与审查的有机结合，“交互”和“接力”的工作模式，翻译与出版的高效对接，体现了国立编译馆作为官方机构的强大的管理优势和组织效力。

双向度译介理念。由于民国时期尚处在近现代的转型阶段，所以“西学东渐”仍是主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译者群体和组织机构只单向度地引进西方名著。相比之下，国立编译馆较早地具有中国文化“走出去”意识，在翻译实践中兼顾文化的输入和输出，在选材上也较好地平衡了“国故”与“新知”。译入方面，国立编译馆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译介世界名著，编译大学用书，以启迪民智。译出方面，国立编译馆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文化输出的主体问题：“自中西交通以来，中籍译为西文者，仅赖教士或西洋学人之力，而我国学术机关，尚少致力。欧洲第一次大战后，西人对于我国之文化，极为注意。此次战后，我国文化当更为一般西洋人士所重视。”（《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11）所以，编译馆在1942年成立翻译委员会后，开始在梁实秋的主持下有计划地翻译中国文学经典，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译英译者。例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1943年经好友卢冀野推荐来到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译，至1953年杨宪益奉调外文局之前，二人一直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深受梁实秋器重。十年间，杨宪益全心投入翻译实践和研究，完成了诸多史学、文学、诗歌和戏剧的翻译工作，开启了杨宪益英译中国经典的工作生涯。然而，国立编译馆虽然有意识传播中华文化，也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但是由于其中译外的译者有限，重要的手稿遗失，必要的宣传缺乏，导致国立编译馆的“对外译介”实践成效有限，成果较少。其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不如同时期中山文化教育馆通过《天下》（*T'ien Hsia Monthly*）英文月刊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等举措。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立编译馆仍然在大后方坚守本职工作，是为数不多在抗战中生存下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的翻译机构，真正践行了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

中国的国运兴衰与翻译事业兴衰“若即若离，大体一致”（王东风 31）。在这条翻译事业兴衰曲线上，政府翻译从未缺场（高玉霞、任东升 30-39）。国立编译馆作为民国时期“政府翻译”的代表，在译名统一、西学翻译、编审教科书、整理国故和译介经典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推进了新中国的翻译、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作为官办机构，国立编译馆：（1）充分整合了国内文化资源，建立集约型智力配备，完成多项民间组织和个体译者无法掌控的大型编译项目，满足国家治理所需；（2）“编—译—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交互”和“接力”中共享项目成果；（3）兼顾“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较早具有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意识。但是，其非市场化的发行方式、政策化的翻译规划和体制化的译者身份也造成了图书宣发不到位、读者群体有限、办事灵活度不高、译者缺乏自主性等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钩沉国立编译馆的相关史实旨在对当今翻译与出版机构的运营模式提供些许启发，希冀当今的编译机构可以借鉴国立编译馆的优秀实践方式，制定切合国家和时代所需的翻译规划，充分调动国内外文化和学术资源，平衡“国故”和“新知”，兼顾守正与创新，融合翻译的“制”与“治”，行之有效地发挥翻译机构的组织力量。

注释 [Notes]

- [1] 《大公报（重庆）》，1946年9月25日，第3版。
- [2] 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官网介绍 <http://www.nict.gov.tw/>。
- [3] 参见《国立编译馆馆刊》1939年2月刊第5-7页的《修订地名任命音译标准原则草案》。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馆刊》。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5-1939.12。
- [4] “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4年第92期，第22页。
- [5] 详见1935年至1939年的《国立编译馆馆刊（月刊）》，1936年的《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1937年的《国立编译馆一览》，1940年和1946年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
- [6] 《图书展望》1936年第1卷第9期，第72页。
- [7] 《京报副刊》1925年第311期，第6页。
- [8] 《时事新报（上海）》1925年11月22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Feng, Zhiwei. “The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 of Terminology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o. 8, 2008, pp. 351-72. [冯志伟：《术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语文现代化论丛》2008年第8辑，第351-72页。]
- Gao, Fengping. “A Review on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Home and Abroad.” *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8, 2016, pp. 58-66. [高风平：《从传播到传真的接力与博弈：〈史记〉外文译本述评》，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8期，第58-66页。]
- Gao, Yuxia, and Dongsheng Ren. “On the Writing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 State-Governance-Based Approach.”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5, 2021, pp. 30-39. [高玉霞、任东升：《基于国家治理的翻译史书写：理据与路径》，载《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5期，第30-39页。]
- NICT, editor. *Regulations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33/1941/1947, zh.m.wikisource.org/wiki/國立編譯館組織條例. [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1933/1941/1947, zh.m.wikisource.org/wiki/國立編譯館組織條例。]
- , editor. *Catalogue of Published Books b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ICT, 1936. [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南京：国立编译馆，1936。]
- , editor.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ICT, 1937. [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一览》。南京：国立编译馆，1937。]
- , editor. *An Overview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ICT, 1940. [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南京：国立编译馆，1940。]
- , editor. *An Overview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ICT, 1946. [国立编译馆编：《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南京：国立编译馆，1946。]
- Han, Shuqin. “Th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A Case Study of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5, 2021, pp. 79-84. [韩淑芹：《国家翻译实践之“治”与“制”——

- 以洋务运动时期官办译馆翻译为例》，载《上海翻译》2021年第5期，第79-84页。]
- Hao, Chu.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no. 1, 1933, pp. 107-12. [豪楚：《中国教育之改造》，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1期，第107-12页。]
- Hu, Xiyun. "Review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no. 4, 2020, pp. 102-10. [胡喜云：《从“总领译事”到掌理学校图书编译——国立编译馆研究》，载《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第102-10页。]
- Huang, Xiaolei. "The Use and Confirmation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5, pp. 140-44. [黄晓蕾：《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审定初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40-44页。]
- Li, Nanqiu.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ranslation in China*. U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 2006.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 Liao, Qiyi, et al. *Translation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Nankai UP, 2015. [廖七一等：《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 Lu, Dianya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Two Years after the War." *Chung Hwa Educational Review*, no. 2, 1948, pp. 11-16. [陆殿扬：《战后两年来的国立编译馆》，载《中华教育界》1948年第2期，第11-16页。]
- Luo, Lin. "A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Social Sciences Abroad*, no. 3, 1994, pp. 61-62. [罗琳：《〈史记〉翻译回顾》，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61-62页。]
- Ren, Dongsheng, and Yuxia Ga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5, pp. 18-23. [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第18-23页。]
- Wang, Dongfeng.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Destin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9, pp. 30-41. [王东风：《翻译与国运兴衰》，载《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第30-41页。]
- Wen, Changbin. "A Review on the Unification of Scientific Terms in Modern China: 1928-1949."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no. 2, 2006, pp. 71-78. [温昌斌：《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28—1949》，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第71-78页。]
- Wu, Tao.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e University Textbook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no. 3, 2019, pp. 170-81. [吴涛：《“部定大学用书”编辑出版过程之历史考察》，载《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170-81页。]
- Wu, Xiao'ou, and Ou Shi. "The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War-ravaged Years (1912-1949): An Analysis on Copy Editor and Proofreade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b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ucation Journal*, no. 3, 2012, pp. 166-80. [吴小鸥、石鸥：《烽火岁月中的启蒙——试析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中小学教科书编审》，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2年第3期，第166-80页。]
- Xin, Hongjuan. "Yang Xianyi." *Translators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Contemporary Part)*, edited by Mengzhi Fang and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7, pp. 567-98. [辛红娟：《杨宪益》，载方梦之、庄智象编《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第567-98页。]
- Zhang, Jian. "Cooperation, Conflict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Examining and Unifying the Technical Terms in Modern Times." *Historical Review*, no. 2, 2007, pp. 24-35. [张剑：《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作、冲突与科学发展》，载《史林》2007年第2期，第24-35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建构

◎ 皮伟男 赖春梅 蓝红军

内容提要：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组成部分，对构建国家翻译能力概念体系意义重大。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一国研究队伍凭借一定的研究资源采用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发现、分析和解决与翻译实践和翻译认识相关议题的能力。本文基于该概念初步建构了一个由一个一级指标、五个二级指标和十四三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对我国翻译研究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就提升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给出四点建议。

关键词：国家翻译研究能力 概念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3) 02-0088-11

基金项目：2021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汉译英显化研究”(21GWXXM-101)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700

DOI：10.19967/j.cnki.flc.2023.02.009

Title: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Concept and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ion

Abstract: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as a component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is signific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 country's research team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issues related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cognition by using corresponding research methods with certain research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concept, an indicator system consisting of one primary index, five secondary indexes and fourteen tertiary indexes is initially construct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and finally four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improving China's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Keywords: 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apacity, concept, indicator system

Authors: Weinan P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Chunmei La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Hongjun Lan, Professo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国家翻译能力是国家翻译实践的衍生概念。《中国翻译》2021年第4期开设专栏探讨国家翻译能力，其中任文、李娟娟在构建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时将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国家翻译传播能力、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和国家翻译发展能力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一级指标，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纳入到国家翻译发展能力中，认为翻译研究能力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助力翻译实践与教学、技术研发和资源库建设等方式体现出来（10-11）。要推进国家翻译能力纵深化发展，构建国家翻译能力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进行探讨。本文拟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并构建其指标体系，以之对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一、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

概念不是单独出现，通常以系统的形式出现。因此理解国家翻译研究能力首先要厘清与之相关的概念。国家作为主体进行翻译的现象早已存在，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标志着国内学者对翻译行为主体认识的深化及由此开始探讨翻译的国家性。国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之一，也有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能力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任文、李娟娟指出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等四个子能力，翻译研究能力就包括在翻译发展能力这一子能力之下（5）。首先，结合本文第三部分，我们绘制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纵向概念体系图（见第二部分图1）。其次，界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还需要从确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四者的组合关系入手。笔者认为这四者存在以下两种关系划分和理解方式，见表1：

表1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关系划分

类型	偏	正	说明
1	国家翻译研究	能力	能力是中心词
2	国家	翻译研究能力	国家是能力的主体

第一种划分方式“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能力”是中心词而“国家翻译研究”是修饰语，可以按顺序理解为国家翻译研究的能力，即进行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研究的能力。第二种划分方式“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也可以按照顺序理解为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即国家是该能力的主体。本文采用第二种划分方式，即把翻译研究能力上升到国家层面考察一国整体的翻译研究能力。界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还需要深入理解其内涵，考虑其行为主体和行为目的。关于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主体下文会详细讨论。“一国之语言能力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已成为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共识”（任文、李娟娟7），而自从译学界学者站在国家角度看待翻译实践和翻译能力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一国的翻译能力也是一国国家能力的

组成部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子能力，也是一国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组成部分。自然，其目的也是服务国家利益和需求，提升综合国力。综上，我们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界定为：一个国家的相关研究主体利用研究资源，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发现、分析和解决与翻译实践和翻译认识相关问题的能力。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是一个国家在翻译研究方面整体创新实力的体现。

二、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

从上文提出的概念出发，可以初步建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为一级指标，以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以及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为二级指标。翻译研究主体是基础，没有研究主体，一切研究皆是空谈，即使有“屠龙之术”，没有操控此“术”的主体，那么“屠龙”则是凌空蹈虚。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可以从研究主体的数量、类别和质量来考察。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是研究的核心，两者相伴而行。研究主体首先要明确其研究问题，找到适合其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最后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翻译研究成果。翻译研究资源则为翻译研究主体的研究提供语种、资金及设备等方面的保障，是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另外，翻译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最直接的体现。五个二级指标虽然有层次上的区别，但对于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建设都不可或缺。在明确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后，提出由5个二级指标和1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	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个体
		企事业单位
		国家机构
	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实践问题
		认识问题
	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哲学方法
		一般方法
		具体方法
	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语种资源
		资金投入
		评估机制
	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论文
		专著
		教材

（一）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体，任东升、高玉霞指出“国家是国家翻译实践的‘法律主体’，以国家名义实施翻译实践的翻译机构和受委托者，是国家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94），而任文、李娟娟指出，相关翻译活动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构，只要相关活动以某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利益，就应被纳入考量”（9）。目前，高校教师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主力军，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得到国家赋权从事翻译研究，但是他们和国内其他从事翻译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从事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翻译实践，也通过产出高质量成果助力国家实力的提升，因此本文沿用后者关于国家翻译能力主体的界定。翻译研究主体由3个三级指标构成：个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构。个体主要包括各个高校从事翻译研究的教师、专职研究员，也包含由高校教师及其硕博士研究生组建起的研究团队。一国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离不开个体的翻译研究能力。企事业单位主要指企业、公司等单位设置的翻译研究中心，例如华为翻译研究中心。国家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

（二）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问题是学术发展之源，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翻译研究问题来自翻译学科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现实需求。对翻译研究问题的追寻能有效推动译学理论的发展（蓝红军 1），因此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探讨。实践和认识相互映衬，互为补充。认识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而实践为新的认识创新输送源流。本质上，认识问题生发于实践问题，当具体形式的实践问题亟须理论工具的阐述时，基于该实践问题的认识问题也就相应产生。鉴于此，翻译研究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而这两大三级指标还可以往下继续细分。

1. 挖掘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翻译研究的基本立场，因此翻译研究必须要面向实践问题。实践问题主要指在进行各类翻译活动时遇到的困难。对翻译实践问题的回答，“即获得对翻译实践中各种矛盾的认识，它推动着翻译实践的进步，也促生了对翻译进行理论建构和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继而推动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蓝红军 3）。翻译研究的实践问题主要包括面向翻译自身的实践问题和国家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共2个）。前者指笔译、口译和翻译批评等实践活动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后者指适应国家社会对翻译服务需求时所面临的矛盾，包括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问题、翻译立法与制定翻译行业规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翻译与文化对外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等（共3个）。

2. 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

界定翻译认识问题有必要厘清翻译现象和翻译学科发展。基于此，翻译认识问题指在

认识翻译现象和翻译学科时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认识翻译理论、翻译史、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具体而言，基础翻译理论面临的问题包括建构本土译学理论等；翻译史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翻译活动、翻译家和翻译史研究方法等；应用翻译理论方面的认识问题涉及应用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型问题的理论应用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的问题主要包括学科交叉、学科未来发展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三）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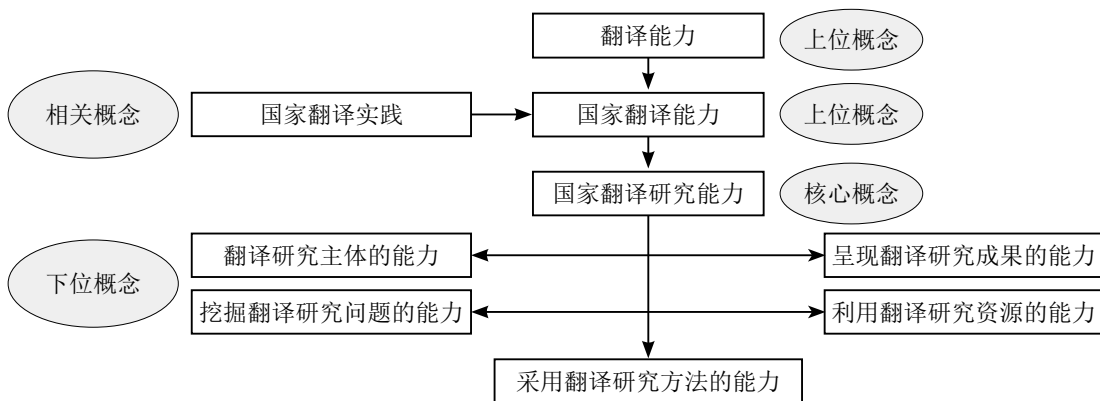
在科学领域，方法指观察现象获取知识所采用的视角或使用的技术。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方法都是关乎学科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最根本问题。翻译研究方法是有关翻译研究的基本原理、深层逻辑、程序步骤、模式范型、工具手段等的统称，可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作为人们揭示和解决翻译问题的方式、工具和手段，翻译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方法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被选择的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问题。因此，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指学者根据其挖掘的翻译研究问题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处理其研究问题的能力，它关系到研究人员能否解决其研究问题。

（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翻译研究资源是研究的保障，如同战争期间的物资保障一样不可或缺，主要包括语种资源、资金投入和评估机制。语种资源指一国现有翻译语种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可分为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两类。一国只有存在相关外语语种的教学和使用场景，该语种才有翻译的出现，因此语种资源是反映翻译资源掌握的指标之一。资金投入指投资主体为具体项目注入原始总投资，在翻译中，主要包括支持和提升各类翻译研究所需的资料、设备和经费等。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费投入、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认知翻译学研究所需的眼动仪和核磁共振等仪器的费用支出，等等。评估机制指的是针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建设的现状，开发科学可靠的评价制度，从而为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建设和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五）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以特定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翻译研究的“最后一公里”。翻译研究成果的呈现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检验和传播，是一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最直接体现。翻译研究成果呈现方式主要有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学术专著和教材等。其中论文成果主要来自各大高校的翻译学教师和硕博士研究生，学术专著主要来自国内外出版社推出的系列翻译丛书和著作，而教材则体现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学段的翻译教材。



▲图1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纵向概念体系

三、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建构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我们将对我国国家翻译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借此就如何提升能力作出展望，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这是该指标体系应用价值的直接体现。

（一）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目前，我国国家翻译研究主体包括个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构。其中，个体是研究主体的主力军，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外语类院校，还有中国海洋大学等综合性高校的教师和研究团队。企事业单位侧重于翻译产品的社会性和商用价值，对翻译研究重视不够，但目前已有一些企事业单位聘用研究员从事翻译研究，如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黄国平致力于交互翻译研究。就国家机构而言，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有一定的成果产出。

（二）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1. 挖掘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第一是面向翻译自身的实践问题。就笔译而言，现阶段学者主要关注外宣文本翻译方面遇到的问题，具体文本包括白皮书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术语翻译也受到了一定关注，包括中国典籍等方面的术语。口译研究主要关注口译工作过程和术语处理等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连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纽带。目前，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以文学翻译批

评为主。法律、军事等非文学文本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状和国家发展，但目前相关研究凤毛麟角。翻译文本的社会性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法律文本翻译质量评估、军事术语规范问题等，值得学者关注。此外，除了传统的翻译批评形式外，网络翻译批评、众包翻译等新现象值得译学界关注，因为新的研究问题也随之而来，如网络翻译批评所带来的翻译批评主体、众包翻译背后所呈现的翻译质量和翻译伦理等。

第二是国家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国家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课程思政改革等问题。查明建认为翻译教学应融入思政课程以提升翻译专业人才的时代使命感（77-80）。现在，翻译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翻译技术本地化教学和“翻译工作坊”也涌现了学者关注的新问题。翻译立法与翻译行业规范制定涉及翻译从业人员资质认证、翻译企业行业准入标准等问题，是翻译行业规范化和职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翻译立法跟医学、法律等行业的立法和国际翻译立法相比，还不够完善。黄友义提交了有关翻译立法的专门提案，引起了译学界的关注（29-30）。之后众多学者强调翻译立法的必要性，展开调研，提供了宝贵意见（赵军峰、薛杰 16-22）。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过推出的翻译出版项目的接受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改善这一窘境，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以提供指导，关注的问题包括谁来译、译什么和怎么译等。

2. 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

首先是基础翻译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一段以国外翻译理论为导向的理论研究期。在此期间，我国的翻译理论并非从实际问题出发来建构理论。但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已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存在的矛盾中发现问题，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值得嘉许的成果。国家翻译实践等本土理论已成为译学界的核心论题。这种学术努力证明了我国学者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其次是翻译史研究。就翻译家而言，国内学者以科学、农学等经世致用学科的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确立了翻译在学术史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活动研究常与建党、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相结合。再次是应用翻译理论问题。应用翻译研究的核心在于“应用相关理论对实用文本、应用型问题以及应用翻译研究话语系统展开研究”（傅敬民、刘金龙 82）。傅敬民等提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初步建构了中国应用翻译理论话语体系。最后是翻译学科建设的问题。目前，霍姆斯（J. Holmes）提出的翻译学框架（172-85）已无法兼容翻译实践的变化，国内学者在修改原有框架方面做出了学术努力，如黄忠廉、孙敏庆提出外译学的概念（91-97）。跨学科研究也如火如荼，但仍有许多研究并不是从问题出发，只是将理论生搬硬套，如社会翻译学研究大多局限于借鉴布迪厄和拉图尔等学者的理论。

（三）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首先，哲学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其最根本指导原则的深层逻辑和观念。我国译学研究，很少以独特的哲学理论视角来系统表达对翻译本质的理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占据了现代西方翻译思想的很重要一部分。而我国的翻译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为西方翻译理论做注解，在采用哲学方法方面的能力需要加强。其次是一般研究方法，包括横断科学、自然科学等研究方法。21世纪后，我国对西方译学理论的引进迈入新的阶段，首先主要表现为重视学习西方学科的系统翻译研究方法。其次重视本土翻译理论的建构，在翻译基本理论研究、跨学科翻译理论探索和学科分支领域研究方面都产出了丰硕成果。最后是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资料的获取、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的方法，以及研究资料 and 数据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等。由于心理语言学、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我国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统计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此外，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信息化成为发展的新方向，计算语言学、语料库和核磁共振等技术已成为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分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有的语种资源和资金投入情况，“能从宏观上反映各学科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可被视作学科研究的风向标”（穆雷、李希希 27）。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分人文社科基金翻译研究项目呈现出以下特点：（1）翻译研究立项占总项目的比重呈现出小幅波动状态，翻译学科整体呈现稳中持续发展的态势；（2）翻译类一般项目占比较大，重大项目立项率低；（3）大多数研究项目依托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通过翻译研究来建构其他学科，翻译本体研究偏少，“翻译学科要从受体学科发展成为供体学科任重而道远”（冯正斌、苏攀 9）；（4）非通用语种翻译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占整个翻译研究的比重较低；（5）个别项目研究主题受国家时政影响明显，如国家形象、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等。目前，我国翻译研究评估机制建设较弱，专门且系统的翻译研究评估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五）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中国翻译学者在国内外期刊发文量逐年上升。王斌华指出，过去5—10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发表数量进一步提升，共发表了455篇SSCI索引文章，仅次于英美两国的学者^[1]。王向远撰写的《“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138-56）。近年，翻译学博士录取人数也有所增长，相关博士论文产出也随之增长，我们期待更多如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种高质量成果。近年出版的翻译学专著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目前共五辑，但大多数专著聚焦中国文学译介这一话题。国外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的翻译学前沿系列著作（New Fronti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也能见到众多中国学者

的身影, 35 部著作中的 15 部第一作者为中国学者^[2]。就教材而言,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已成为经典教材。该系列教材是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MTI学术编写的教材, 许多成果如穆雷主编的《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未来发展

翻译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 需要回答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本文力图在国家层面审视翻译研究能力, 并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何提高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本文就我国国家研究能力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优化研究队伍。要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团队建设、强化交流合作, 组成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组合。高校教师和研究团队要重视自身跨学科意识的养成, 加强与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合作, 形成合力, 实现理论、视角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企事业单位和国家翻译机构要加强翻译研究中心建设, 鼓励能力强的翻译实践人才投入翻译研究, 培养翻译高级研究员, 强化与高校教师的合作交流, 以推动翻译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第二, 加强国家翻译研究规划。国家作为翻译研究能力主体, 可制定相关政策对翻译研究动向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作为规划主体应当强化规划意识, 主要包括加强翻译项目规划, 科学预判未来翻译研究动态和走向。任何重大规划的具体制定和执行都会涉及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社会力量和个人的多方配合(董晓波、胡波 88)。对此国家机构要制定整体战略目标, 做好项目的组织、管理、监督与运营。各层级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要站在国家发展的制高点, 将翻译研究与“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议题有机结合。

第三, 改善资源建设。一方面, 要加强非通用语种的翻译研究, 结合“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有效挖掘非通用语种语料, 服务国家发展。另一方面, 要注重外语资源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的有机结合, 拓展语种资源的多向研究。此外, 国家、高校和企业要加强翻译研究的经费投入和项目投入, 扩大翻译研究资金投入占总资金投入的比重, 建立健全语种资源保障和评估机制, 让广大翻译研究者乐于从研。

第四, 搭建高质量翻译研究平台。国家机构、高校、企事业单位应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建立翻译研究中心。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例, 翻译行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与民间社会的直接联系, 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市场调研, 负责沿线国家的关键语言选择, 文学文化作品规划, 选择和出版、译者和出版机构的确定等核心工作(董晓波、胡波 89)。各层级翻译研究中心的管理可以采用共享式和互助式模式, 共享文献、工具、技术等研究资源, 开展跨中心跨区域的合作性研究。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体系建构，既是时代所需也是学科发展所需。本文在阐述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由1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和1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基于这一体系梳理了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现状，并从研究队伍、研究规划、研究资源和研究平台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性建议。本文是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一复杂概念的界定及其指标体系建构的初步尝试，但对其丰富内涵和外延的阐释、指标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都有待深入，这需要更多学者参与进来。

注释 [Notes]

[1] 数据来自王斌华教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的讲座“国际翻译学近年研究动态管窥”。

[2] 此处的中国学者指国籍为中国且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高校工作的学者。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Dong, Xiaobo, and Bo Hu. "Translation Planning Research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ent and Framework."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3, 2018, pp. 86-91. [董晓波、胡波:《面向“一带一路”的我国翻译规划研究: 内容与框架》, 载《外语学刊》2018年第3期, 第86-91页。]
- Feng, Zhengbin, and Pan Su. "An Over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6, 2021, pp. 1-11. [冯正斌、苏攀:《我国翻译学研究整体特征、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以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为考察中心》, 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第1-11页。]
- Fu, Jingmin, and Jinlong Liu. "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ragma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2, 2021, pp. 80-85. [傅敬民、刘金龙:《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特色问题》, 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第80-85页。]
- 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 Venuti, Routledge, 1962/2000, pp. 172-85.
- Huang, Youyi. "Promoting Transla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1, pp. 29-30. [黄友义:《推动翻译立法, 促进翻译行业的健康发展》, 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3期, 第29-30页。]
- Huang, Zhonglian, and Mingqing Sun.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ies on Outward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1, 2021, pp. 91-97. [黄忠廉、孙敏庆:《外译学管论与外译详解》, 载《中国外语》2021年第1期, 第91-97页。]
- Lan, Hongjun. "Identifying Problems: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3, 2018, pp. 1-6. [蓝红军:《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 载《上海翻译》2018年第1期, 第1-6页。]
- Mu, Lei, and Xixi Li.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Status Quo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reign*

- Language World*, no. 2, 2019, pp. 24-32. [穆雷、李希希:《中国翻译教育研究:现状与未来》,载《外语界》2019年第2期,第24-32页。]
- Ren, Dongsheng, and Yuxia Gao.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A New Concept."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3, 2015, pp. 92-97. [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3期,第92-97页。]
- Ren, Wen, and Juanjuan Li.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as a Concept and a Research Topic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21, pp. 5-14. [任文、李娟娟:《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概念、要素、意义》,载《中国翻译》2021年第4期,第5-14页。]
- Wang, Xiangyuan. "The Thinking behind 'Fan'(翻) and 'Yi'(译):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n Ancient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2, 2016, pp. 138-56. [王向远:《“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38-56页。]
- Zha, Mingjian. "Leading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Majors with Curriculum Civic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21, pp. 77-80. [查明建:《以课程思政引领翻译专业内涵建设与创新》,载《中国翻译》2021年第5期,第77-80页。]
- Zhao, Junfeng, and Jie Xue. "An Analysis of Essential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Industry Legislation in China and Some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2, 2022, pp. 16-22. [赵军峰、薛杰:《我国翻译行业立法要件分析及立法建议》,载《中国外语》2022年第2期,第16-22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FLC

课 程 思 政 研 究

ESP课程思政实践路径探索——以“商务英语阅读”为例

◎ 周虹 鲁巧巧

内容提要: 专门用途英语作为大学英语一部分,其课程思政探索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为例,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四个教学层面为框架,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专业知识、道德修养五个维度为思政导向,围绕“为何讲”“讲什么”“谁来讲”“给谁听”“如何讲”的问题,探索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在教学方法讨论中,文章采用了文秋芳教授的POA(产出导向法)理论,从驱动、促进和评价三个阶段探索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专门用途英语 商务英语阅读 课程思政 产出导向法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2-0099-11

基金项目: 2021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型外语人才构建路径研究”(项目号);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英语成绩的研究——基于广州市应用型高校的数据”(2019GZGJ120)

作者单位: 广东金融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0

Titl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ESP: Taking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as a Sample

Abstract: As a part of College English, it is significantly practical for ESP to integrate moral education. Taking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as a s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with ESP, which is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from the five ideological-political dimensions: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cultiv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oral qualities, around the issues of “Why shall this be taught?” “What shall be taught?” “Who shall teach?” “Whom shall be taught?” “How shall we teach?” In the discuss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is paper employs professor Wen Qiufang’s POA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path.

Keywords: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courses, POA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ractice approaches

Authors: Hong Zhou,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Qiaoqiao Lu,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2014年,在教育部指导下上海市率先开展了课程思政试点工作;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上海各高校加快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清楚地指出课程思政的目标和工作思路并明确地回答课程思政为什么要做、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等问题(教育部web)。2020年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发布《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指出“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包括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跨文化交际三大类课程”。同时还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在课程定位与性质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应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i-ii)一言概之,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要“思政育人”“课程培才”两手抓。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推进及“新文科、大外语”建设的展开,专门用途英语之一的商务英语重要性逐渐凸显,商务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是大势所趋。

专门用途英语是大学英语的一部分,与通用英语(又称“普通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英语专业和专业英语均有差异。专门用途英语是为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在某些学科领域使用英语的能力,由语言教师授课让学习者学习专门化、特殊化的,与某特定职业、专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语言内容(蔡基刚,《外语教育政策》1-6)。通用英语(EGP)是为满足学习者的普遍交际需求,让学习者学习作为一个合格世界公民应该具备的知识范畴的英语语言内容(文秋芳,《大学英语教学》1-8)。英语专业是为培养语言能力过硬、专业知识熟练的人才,让学习者通过全英语教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某一专业学科知识。专业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or Specialized English)是为帮助学生某些学科知识,由专业教师通过翻译和术语的方法讲授专业知识(蔡基刚,《大学英语》83-93)。

一、两种理念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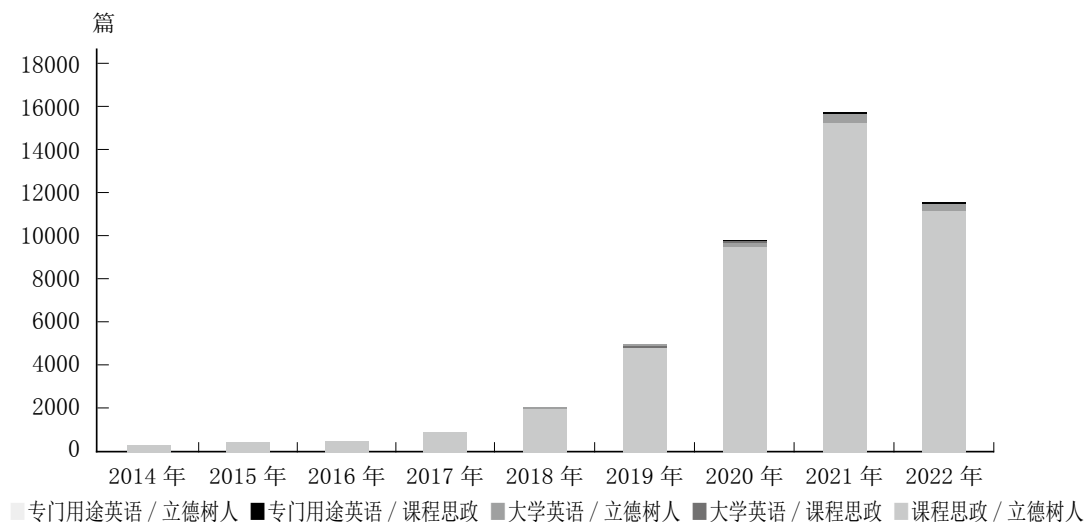
(一) 专门用途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始于“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语国家,彼时各国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世界格局变化使得英语成为通用语言;为了有效沟通,西方国家便在各个国家对专业人才进行英语培训。专门用途英语的定义未有统一,坚持“学习中心论”(learning-centered)的哈钦森(Tom Hutchinson)和沃特(Alan Water)认为专门用途英语是“一种课程教学理念”,即“在内容和方法上以学习者学习目的为基本出发点的教学法”(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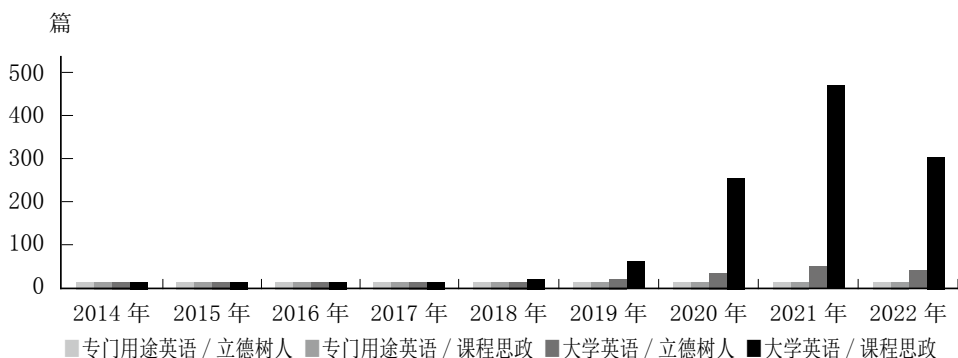
这一课程教学理念被不少学者赞同,认为这与专业内容紧密相关,强调真实任务环境中的学习,能有效帮助学生运用英语开展与自己的职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在学生未来学术和职业发展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蔡基刚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专门用途英语上面;大学生应从进校第一天开始就学习基于专业学习的ESP课程(《大学英语》90)。

（二）课程思政

在知网上搜索相关研究成果，把教育部指导上海开展试点工作的2014年设为起点，把最近时间设为终点。首先以“课程思政”或“立德树人”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查得44529篇；以“大学英语”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查得1081篇；以“大学英语”和“立德树人”为关键词，查得54篇；以“专门用途英语”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查得6篇；以“专门用途英语”和“立德树人”为关键词，无。比例详情见图1。再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文章与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文章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图2所示。



▲图1 2014—2022年有关课程思政文章比例图



▲图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与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比较

知网数据表明课程思政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占比较高，而ESP课程思政较少，因此本文计划以“商务英语阅读”为例，对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

途径展开探索。

2021年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以下简称《课程思政指南》)工作组,在反复多次地探讨、研制细则后,最终形成了对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手段等的明确要求。

(三) 融合

作为大学英语三大类课程之一的专门用途英语是课程教学理念,课程思政是综合教育理念(郭永存等 web)。教学与教育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教育包括教学,教学是学校教育一个基本途径;教育注重过程,教学注重结果。由此可知,ESP与思政二者的融合具有理论基础。

《纲要》指出要“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坚持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相统一、坚持总结传承和创新探索相统一”(教育部 web)。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以英语使用领域为指向进行知识的传播,是显性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专业相关英语能力的人才;课程思政起价值引领的作用,是隐性教育,是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ESP与思政的结合正是传承与创新的体现,《纲要》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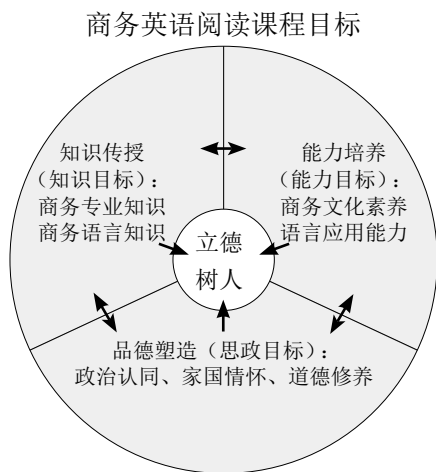
二、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思政:以“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指南》为大学外语教师展开具体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指引。向明友认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具体可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展开。”(24)赵雯、刘建达总结道:“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专业知识、道德修养5个方面确立《课程思政指南》内容重点。”(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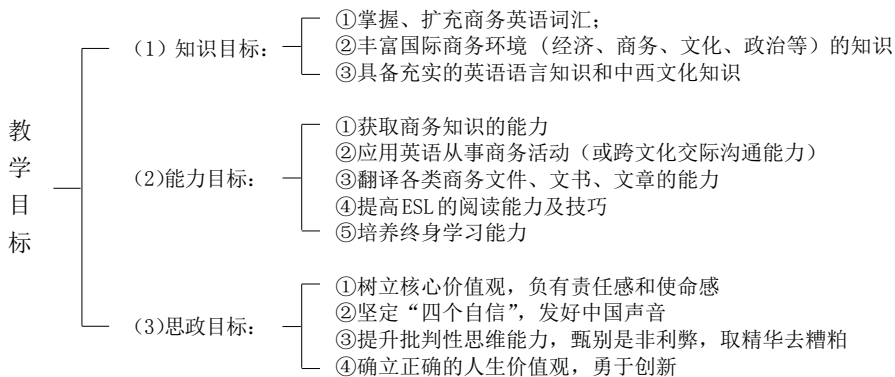
本文计划以向明友根据《课程思政指南》提出的四个方面为基本理论探索框架,以赵雯、刘建达指出的五个点为思政目标的指导方向,以笔者所在学校使用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为例,探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 ESP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商务英语阅读”的课程教学目标是以《课程思政纲要》为指导并结合学校和专业培养方案,培养既有爱国主义情操、正确人生价值观及思辨能力,又有扎实英语语言知识和较丰富商务知识,能用英语从事商务活动和有关学术交流的专业综合应用型人才。简而言之,就是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品德塑造“三位一体”,以实现“立德树人”。详见图3。



笔者所在学院使用的教材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的编者认为该教材内容侧重商务理念、概念、知识和文化，以及商务英语语言（李小飞、祝凤英 ii）。在如今“大思政”背景下，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能忽略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品德的塑造及主动、自觉的思政教育，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环境下，更是不能忽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根据“商务英语阅读”课程目标和教材特点，在融合了课程思政内容后，学院制定出该门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详见图 4。



▲图4 “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①的提出是以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为导向；思政目标②以政治认同、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导向；思政目标③是融合了赵雯与刘建达的五个内容重点后提出；思政目标④则是以道德修养和专业知识的导向。

（二）ESP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ESP课程要实现思政育人，需要充分挖掘、提炼思政元素，且不能不顾ESP课程的学科教学属性，也不能生拉硬扯、穿凿附会，要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和教材内容，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寻找思政点，并将其作为隐性教育自然而然地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沉浸式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位于大湾区的这所应用型高校使用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共12个单元，所涉及的内容依次为公司文化、领导才能、管理大师、企业公民、消费者行为、全球品牌、全球化、定价、企业战略、并购、新经济、服务经济。根据该课程的教学课时和计划安排，主要选取前7个话题情景为学习性工作任务。依据该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对这几个单元的教学内容重新设计，使“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体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商务英语阅读”课程思政具体的教学内容详见表1。

表1 教学内容

单元	主题	思政元素（思政点）	思政目标
一	公司文化	中国优秀文化	坚定“四个自信”
二	领导才能	中国领导人的故事	加强“四个意识”
三	管理大师	中国儒、道、佛、墨等思想	做到“两个维护”
四	企业公民	各行业奉献者、劳模的故事	负有责任感、使命感
五	消费者行为	中国经济发展	确立正确人生价值观
六	全球品牌	中国工业、科技发展	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创强意识
七	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规划	发好中国声音，世界命运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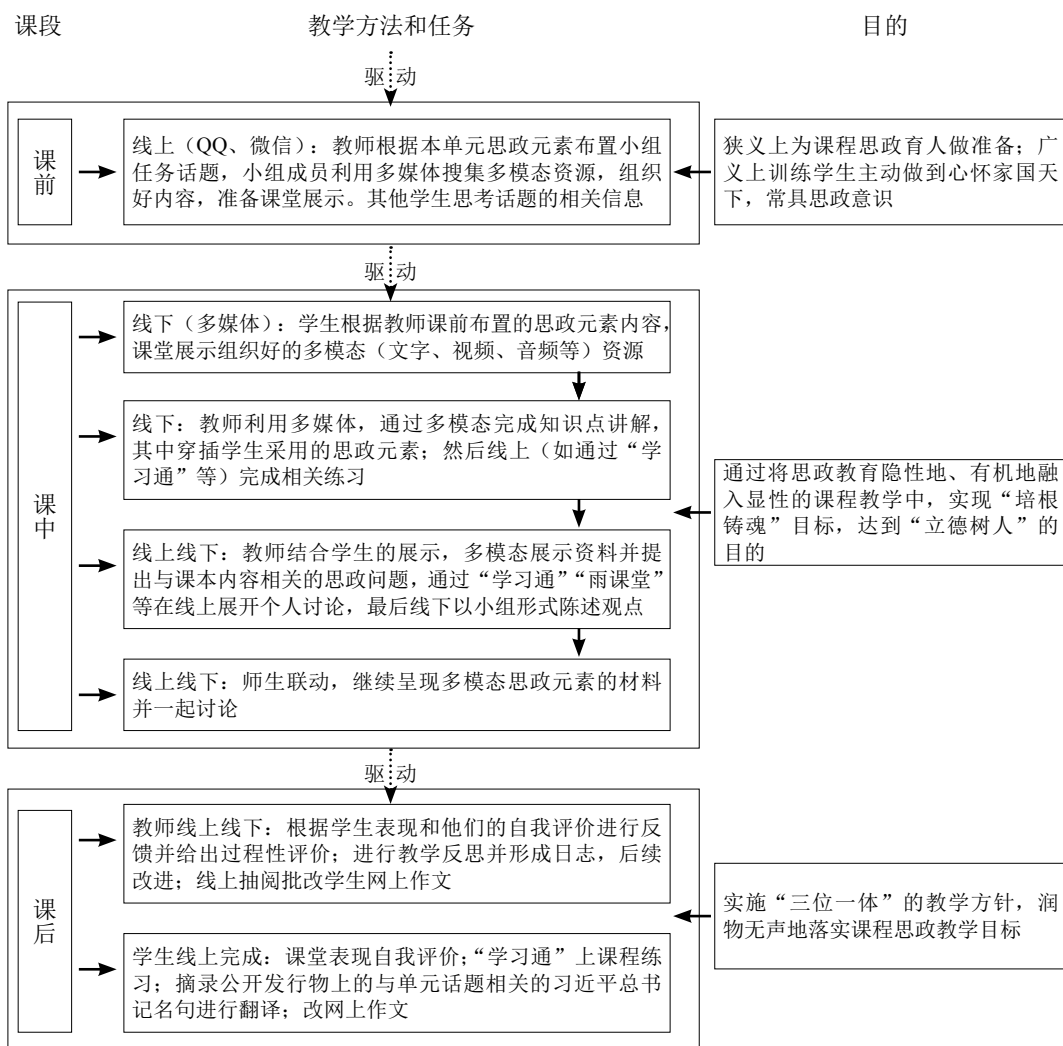
政治认同的内容在第一、二、三、六、七单元的思政目标中体现；家国情怀在第四、六、七单元的思政目标中体现；文化素养在第一、六单元体现；专业知识体现在第六、七单元的思政目标上；道德修养则体现在第五、六单元中。

（三）ESP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内容和任务的实践途径。在现在的智慧校园环境，教学工具和媒介的多样化、丰富化为混合教学方法和多模态教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条件。混合教学方法一般指“线上”+“线下”的教学，即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混合使用的方法。多模态教学方法则采用多种渠道、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来展示教学内容（如图片、动作、表情、视频、音频、PPT等），调动学生多感官（视、听、触、嗅、味）协同运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加深印象、强化记忆，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文秋芳教授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出导向法”（POA），是以学习为中心、以

教师为中介、以学生为对象、以“学”“用”为一体的教学理论；认为产出是语言学习的驱动力和目标，适时输入有利学习，选择性学习比非选择性学习更能优化效果；同时将教学流程分为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阶段（文秋芳 547-58，640）。本文以文秋芳提出的流程理论为框架，探讨混合教学与多模态教学混合使用的教学方法在课程思政融入ESP中的教学，并以《商务英语阅读》为具体案例。文秋芳所构建的教学流程主站场景是实际课堂教学，而本文延展了课堂教学范畴，把课堂教学前后师生进行的一系列与该次课堂教学相关的活动纳入流程中。图5是ESP混合教学与多模态教学融合的教学方法的基本流程图。



▲图5 ESP混合教学方法+多模态教学方法基本流程图

课前是“驱动”阶段，驱动学生形成思政意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此阶段根据教学

目标和任务,通过在线方式给下次做展示的小组布置话题任务,并对将要搜集的材料提出要求。学生自己在网上找寻材料,组织好要展示的内容,等待在课堂作报告。搜寻、组织话题材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意识。以《商务英语阅读》教材第一单元《公司文化》为例,POA理论框架下“驱动”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2。

表2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驱动”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课前 (驱动)	1	教师以小组形式布置驱动任务: 选一家国内知名企业,介绍其企业文化	线上(也可线下布置)	粗略介绍企业历史、业务、有形和无形资产,着重介绍其公司文化	其公司文化是中国还是外国理念?优势之处?
	2	小组合作收集有关任务的信息	线上线下配合	利用网络收集资料并通过多模态形式呈现(文字、音频、视频等)	
	3	小组合作准备好课堂展示任务	线下	学生要明确交际场景和语言目的; 学生要清楚产出任务的内容、类型	

课中是“促成”阶段,促成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的融合,是课堂教学的主场。此时的教学过程利用混合教学方法,通过呈现多模态教学资料,层层展开教学,吸引学生投入精力积极参与。在课程教学中既完成课程教学又实现思政目的。依然以《公司文化》单元为例,POA理论框架下“促成”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3。

表3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促成”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课中 (促成)	1	小组课堂展示	线下	使学生明白有关商务活动中(如公司介绍等)的步骤、语言内容; 教师瞬时评价	在这几年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对企业员工的帮扶中、在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中,大众有什么感受?为什么会有独特性?
	2	教师讲解课本中知识点,选择性组织学生输出,教师进行指导 (如文中第一段: From its origins in 1875 as a... to over ~ in 1906.)	线下 (多媒体)	使学生理解在商务英语中该句的使用情景; 让学生模仿句子写出或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艰辛历程的句子	
	3	教师结合课文内容(公司大楼结构、刻在墙上的名言、铭文和Lakin理念等)和学生驱动任务中输出的内容,让学生思考在我国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和企业文化下企业的有关方面	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学习通”; 线下:面对面)	学生从课本内容的输入中选择产出任务所需内容、语言形式或话语结构; 学生运用“学习通”,阐述观点; 教师瞬时评价	
	4	教师多模态呈现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对企业、员工扶持的材料继续讨论	线上线下结合	教师引导学生正确、积极表达观点; 学生在“学习通”上互评	

课后为课程“评价”阶段,部分类似文秋芳提出的“延时评价”,评价课中的即时评价

和师生表现及课程内容，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师生以线上线下的反思、反馈和练习活动继续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是实施课堂课程思政的延续，全方位潜移默化地进行“全人教育”。POA理论框架下“评价”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4。

表4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评价”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课后 (评价)	1	教师根据“学习通”上学生互评和学生课堂表现给出过程性评价； 教师教学反思	线上线下结合	教学反思形成日，后续改进； 线上抽阅学生互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 性的体现 及四个自 信从何处 表现？
	2	布置“批改网”上作文，仿写课文第八段，对某一建筑物（公司大楼或商业楼）进行描写； 摘录公开发行物上与单元话题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名句进行翻译	线上 （“学习通”“批改网”）	“批改网”虽是自动评分，但教师仍要抽查； 学生完成翻译并自行对答案，教师网上检查	

需要说明的是，“摘录公开发行物上的与单元话题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名句进行翻译”这一由学生线上完成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家国天下、关注命运共同，关键时总有官方媒体将其会议发言、理论文章、思想指向和工作指导用外语对外宣传，所以能找到英文原文或中英文对照。这项任务也是我们部门的统一要求。

POA理论推动着三个阶段逐步展开，每个阶段各有其职责任务。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方法与多模态教学方法相互穿插配合，还能视教学内容补充其他诸如辩论、讨论、游戏等多样方法。

（四）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观察和反思教学工作、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更是一种“思政育人、课程培才”的价值判断，其主要目的是检验被嵌入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思政教育形式的育人目标在ESP课程教学中的内化、落实和普及程度，印证思政育人目标在ESP课程思政中的导向性、实践性（张瑞、覃千钟 49-52）。

对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的研究各家争鸣，各有所持，可大致简单地总结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体系构建方向。如从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建构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另一个是实践操作方向。如提出在教学评价时调节各种（形成性和过程性）评价比例以及调整考核内容。

对于融入了思政的ESP教学评价不仅要活动主体（师与生）进行评价，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扩大评价覆盖面，如思政元素的融入、思政材料的切入、思政教育的引入、思政问题的探入等。ESP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详见表5。

表5 ESP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评价对象及标准 评价内容及方式	学生	教师	标准
评价内容	思政元素与课文话题的融入	思政元素的确立	相融自然、清楚易懂、易于接受
	思政材料与课文内容的切入	思政材料的选取	连接顺畅、材料多样、热门话题
	思政教育于知识学习时引入	思政教育的适时	适时适当、正确正面、关心时事
	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探入	思政问题的设置	积极正面、关注民生、批判思维
	思政题目占比期末试卷试入	时事要闻的关注	语言正确、观点明确
评价方式	多元评价方式：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师生协商评价、教师即时评价、学习小组自评、学习小组间互评等	教师自省，学生评价	方式新颖，手段多样，随时更新；赋分制和量化给分

由于智慧校园的建设和网络平台选择的丰富多样化，线上线下能相辅相成，所以既需要即时评价也需要延时评价；又因为期评是百分制及学分绩点制，因而评价时采用赋分制和量化给分制比较适合学情。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商务英语阅读主讲教师首先内心要坚定信念、端正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思想政治与专门课程“同频共振”、做好“引导者”。在商务英语阅读课程思政中要精心设计好具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善于运用、创新各种教学评价方式，以圆满完成思政任务和传播课程知识，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i, Jigang. "Conflicts over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Interdisciplinary English Talents or Pure English Talent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2019, pp. 1-6. [蔡基刚：《外语教育政策的冲突：复合型人才还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页。]
- . "College English as General Education or Discipline-specific Educ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o ESP Revisited."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3, 2022, pp. 84-91. [蔡基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再论大学英语教学的专门用途英语定位》，载《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3期，第84-91页。]
-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Guidance Committee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2020 editio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20.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Guo, Yongcun, et al.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ng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System Featuring ESP." *Guangming Daily*, 11 Feb. 2022, p. 3, epaper.gmw.cn/gmrb/html/2022-02/11/nw.D110000gmrb_20220211_6-03.htm. [郭永存等：《安徽理工大学：建构以专门用途英语为特色

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载《光明日报》2022年2月11日第3版，epaper.gmw.cn/gmrb/html/2022-02/11/nw.D110000gmrb_20220211_6-03.htm。]

Hutchinson, Tom, and Alan Water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Centred Approach*. Cambridge UP, 1987.

Li, Xiaofei, and Fengying Zhu, editor.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李小飞、祝凤英编：《商务英语阅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ide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ivics in Higher Education*. 1 Aug. 2020, 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年8月1日，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Wen, Qiufang, “The Debate between EGP and ESP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1, 2014, pp. 1-8. [文秋芳，《大学英语教学中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①之争：问题与对策》，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1期，第1-8页。]

——.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5, pp. 547-58, 640. [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7卷第4期，第547-58，640页。]

Xiang, Mingyou. “Teaching Design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22, pp. 20-27. [向明友：《基于〈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载《外语界》2022年第3期，第20-27页。]

Zhao, Wen, and Jianda Liu.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anation of Key Content Foci of *Guidelines for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22, pp. 12-19. [赵雯、刘建达：《〈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内容重点研制与阐释》，载《外语界》2022年第3期，第12-19页。]

Zhang, Rui, and Qianzhong Tan.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PTTIAC): Connotation, Resistance and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vol. 36, no. 41, 2021, pp. 49-52. [张瑞、覃千钟：《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内涵、阻力及化解》，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36卷第41期，第49-52页。]

◇责任编辑：罗辉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基于语料库概率模型的与格交替多因素分析——以send为例

◎ 袁咏雪 李健雪

内容提要: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分析, 提取真实使用的语料库数据, 对语料进行句法、语义等多层面的标注, 通过建立语料库概率模型, 即Tree & Forest模型及朴素判别学习模型, 探究制约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的因素及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口语语体中, 对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包括与事代词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 以及与事有定性; 代词性、有生性和有定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为与事代词性>长度差异>与事有生性>受事代词性>受事有定性>与事有定性>与事可及性>受事可及性>受事有生性>受事具体性。研究证明, 论元结构交替的构式变体使用具有系统性及概率性, 与格动词会影响构式变体选择, 构式变体模型也得到了进一步论证。同时, 本研究建立的语料库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拟合能力和准确度。使用语料库概率模型是一种新的尝试, 对与格交替的构式语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与格交替 send类与格动词 Tree & Forest模型 朴素判别学习模型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110-12

基金项目: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英语与格构式的构式变体研究”(KYCX222410)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1

Title: A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of Dative Alternation Based on Corpus-based Probabilistic Models: An Example of “Send”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send-type dative alternation. Corpus-based probabilistic models are established after extracting and annotating the corpus data in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yntactic asp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spoken English,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send-type dative alternation include pronominality of recipient, pronominality of theme, animacy of recipient, definiteness of theme and definiteness of recipient. There are interactions among three factors, i.e., pronominality, animacy and definitenes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predictors is ranked as: pronominality of recipient > length difference > animacy of recipient > pronominality of theme > definiteness of theme > definiteness of recipient > accessibility of recipient > accessibility of theme > animacy of theme > concreteness of theme. The choice of construction variants is proved to be systematic and probabilistic, and allostruction model theory is provided with further evidence. Also, corpus-based model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possess good fitting ability and accuracy. The use of corpus-based probabilistic models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attempt, having implic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grammar study of dative alternation.

Keywords: dative alternation, send-type dative verbs, Tree & Forest model, naïv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model

Authors: Yongxue Y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China; Jianxue Li,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China.

构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根据佩雷克(Florent Perex)的定义,论元结构交替(argument structure alternation)是指语义相近的构式中相同论元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句法实现形式(Argument 146)。论元结构交替包含很多子类,其中,与格交替是各个语言学派研究中最常提到的话题之一。与格交替是两种与格构式即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式的交替使用现象(146-47)。这两种变体拥有相同的论元,均对实体从事转移到受事的事件进行编码。

例 1: a. Mary gave (John)_{recipient} (a book)_{theme}.

b. Mary gave (a book)_{theme} to (John)_{recipient}.

(Perex, Argument 146)

例 2: a. John sent (Mary)_{recipient} (a book)_{theme}.

b. John sent (a book)_{theme} to (Mary)_{recipient}.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102)

例 1a 和例 2a 为双宾构式,例 1b 和例 2b 为介词与格构式,两者可交替使用。然而人类大脑的认知机制具有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语言使用者对于两种构式的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戈德伯格(Adele E. Goldberg)认为,动词give为原型与格动词,现有研究大多涉及give类与格动词,并未将与格动词的语义差异考虑在内(Constructions 35)。拉帕波特(Malka Rappaport)和莱文(Beth Levin)后来提出了动词敏感性理论(verb-sensitive approach),对与格动词进行了分类(129-67)。他们认为,give类与格动词与send类与格动词存在语义差异,即give类与格动词只有致使拥有的含义,send类与格动词则在此之外多了致使移动的含义。因此,send类与格交替是否与give类在各方面完全一致,不同影响因素对两种与格动词所在的论元结构交替的影响效应是否完全一致,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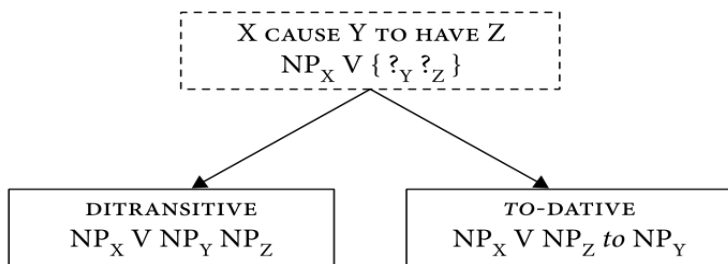
因此,本文将使用多因素分析,提取真实使用的语料库数据,通过语料库概率模型探讨send类与格交替的使用特征及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同时检测所建立模型的数据拟合能力和准确度。

一、构式变体模型理论与英语与格交替

构式语法支持单层语法观,主张表层概括假设(surfac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Goldberg, "Surface" 327-56),始终强调基于相同的形式和意义的概括形式的重要性,但淡化了语义或句法相关而形式不同结构的概括。戈德伯格分别分析了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

式的语义及语用结构，认为两者的语用结构存在差异，这两个变体属于不同的构式。可以看出，构式语法似乎忽视了两个变体之间存在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个构式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意义重合（Bresnan and Ford 168-213）。

卡佩尔（Bert Cappelle）基于对小词置位的研究，提出了构式变体模型理论（Allostruction Model），将构式交替的两个论元构式视为两个构式变体，认为二者由一个共有的超范畴联系，且二者之间共享抽象的语义。构式变体模型将论元结构交替作为一种特定事件的不同表达，同时保留了构式语法主张的非派生性特征。这种交替也是一种语言知识，是语言使用者基于其所处环境中的语言系统变化习得的，也是存在于语言使用者语法系统中的一种概括。因此，与构式语法不同，卡佩尔主张论元结构交替也应被视为说话者语法系统的一部分，佩雷克通过分类任务实验证明了这一观点。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佩雷克进一步分析了与格交替现象（“Mental Grammar” 153），英语与格交替两个构式变体的联系及超范畴组成的网络如图 1 所示：



▲图 1 与格交替及构式变体

构式变体模型并不强调建构式到构式之间的派生关系，也不完全将论元结构交替排除至语法系统之外，具有更加灵活的承继关系。该模型也体现出论元结构交替在构式语法研究中的理论地位，本研究即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进行。

构式变体模型对构式变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二者由一个共同的超范畴连接，继承相同的语义表征，可视为与格构式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句法实现形式。卡佩尔和佩雷克均指出，两个构式变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在语义和功能上存在差异。虽然与格交替不是纯粹由语义因素驱动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两种构式变体在任何语境中都是同样恰当的。语言使用者对两种变体的选择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可及性、相对长度等。简而言之，尽管这两个构式变体在结构和语义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在与事和受事的一些属性上依然存在差异，这也对两者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设置了限制条件。

二、send类与格交替与基于语料库的概率模型

本研究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将与格构式的论元构式视为两个构式变体，采用多因素分析从COCA语料库中提取真实使用的语料，对语料就语义、语用、句法等多方面的特征进行标注，从而获取语言特征数据，进行多变量统计建模，即通过R软件建立Tree & Forest模型、朴素判别学习模型 (naïv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model)，探究制约send类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在口语语体中的使用特征。

(一) 语料选取及标注

研究语料选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CA)。在COCA检索行中检索 “[send]” (表示send及其屈折变化形)，在SECTION一栏中选取SPOKEN和BLOG (研究视为口语语体)，分别在send, sent, sending, sends中选取与格构式实例800个，根据标注依据 (张懂 40-52; Bresnan and Ford 168-213)，在Excel中进行标注。

本研究确定的变量及标注标准主要参考布列斯南 (Bresnan John) 和福特 (Marilyn Ford)、张懂的研究，预测变量包含受事及与事的话语可及性、有定性、代词性、有生性、长度差异和受事具体性。各个预测变量的标注标准如下：

话语可及性：受事或与事所指在话语前10行内被提及或为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则为已知，否则为未知；有定性：有具体所指 (出现限定词，如that, her, the) 即为可定，否则为不可定；代词性：人称代词 (如it, you, him)、指示代词 (this, that)，以及反身代词 (如himself) 都标注为代词，否则为非代词；有生性：人类和动物均标注为有生，否则标注为无生；受事具体性：人类感官可感知的标注为具体，不可感知的则为抽象；长度差异：受事长度大于、等于或小于与事。反应变量为两个与格构式变体，即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式。标注变量及水平如表1所示：

表1 标注变量及水平

因素	因素名称	因素标注	标注符号
预测变量	与事可及性	已知、未知	RepAccs
	受事可及性	已知、未知	ThmAccs
	与事有定性	可定、不可定	RepDefi
	受事有定性	可定、不可定	ThmDefi
	与事代词性	代词、非代词	RepPron
	受事代词性	代词、非代词	ThmPron
	与事有生性	有生、无生	RepAnmc
	受事有生性	有生、无生	ThmAnmc
	受事具体性	具体、抽象	ThmConc
	长度差异	受事长度大于/小于/等于与事	LengDiff
	语体	口语	SPOKEN
反应变量	构式变体	双宾语构式、介词与格构式	Dative

以下为5个与格构式实例，表2为5个实例的模型标注例示：

例1: And then some news outlet asked well, why don't you ask more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said why would we ask for their money and send their taxpayers money to us.

例2: With modern technology, they will scan these handwritten letters and send them to you.

例3: And as soon as Congress sends me that extension of tax cuts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o my desk, I will sign it right away.

例4: He's doing a lot of things that send signals to these white supremacists.

例5: Next time you think of sending me something, try to remember I probably already have one or don't want one.

表2 NDL模型标注编码例示

X	Dative	RepAccs	ThmAccs	RepDefi	ThmDefi	RepPron	ThmPron	RepAnmc	ThmAnmc	ThmConc	LengDiff
1	NPPP/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no/0	yes/1	more/1
2	NPPP/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equal/2
3	NPNP/0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more/1
4	NPPP/1	no/0	no/0	yes/1	no/0	no/0	no/0	yes/1	no/0	no/0	less/0
5	NPNP/0	yes/1	no/0	yes/1	no/0	yes/1	no/0	yes/1	no/0	no/0	equal/2

(二) 语料库概率模型的建立与结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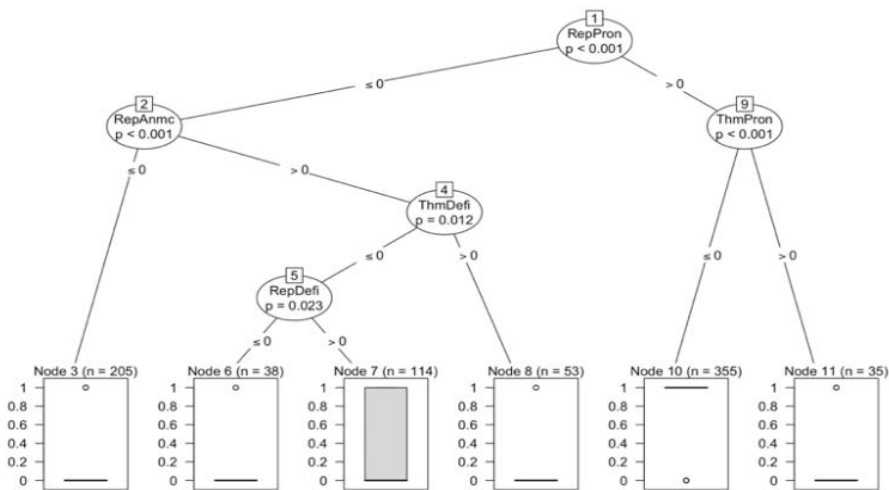
在R软件中建立两种模型时导入的公式为：

$Dative \sim RepAccs + ThmAccs + RepDefi + ThmDefi + RepPron + ThmPron + RepAnmc + ThmAnmc + ThmConc + LengDiff$

1. send类与格交替的Tree & Forest模型分析

研究首先使用Tree & Forest模型探究影响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Tree & Forest模型即条件推断决策树与随机森林模型。分类树模型很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可将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预测因素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可视化。然而条件推断决策树的算法原理让其只能在局部最佳性能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因此，有必要用随机森林模型来进行补充。尽管随机森林模型不能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变量共同作用的信息，但可用于评估不同预测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将其可视化。

条件推断决策树可以通过R软件中的{party}程序包的ctree()函数建立，同时加载{lattice}，{ggplot2}和{caret}程序包，通过递归划分算法得到分类树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

通过混淆矩阵,得出分类树模型的 p 值小于 $2.2e^{-16}$,故该模型整体具有高度显著性。同时,计算出的模型准确度为89.3%,即此处建立的分类树模型可以根据预测变量具有的特征,对研究数据中89.3%的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进行分类和推测。根据贝恩(Rolf Harald Baayen)的研究,若C值(concordance index)大于0.8,则表示所建立的模型对语料数据集有较好的拟合能力(*Analyzing* 204)。该模型的C值为1,说明模型对数据有较好的拟合能力。通过观察图2中的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结果可以发现,对英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包括与事代词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以及与事有定性。其中与事代词性对与格交替的使用影响最大。此外,分类树模型也显示,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多重交互效应:

(1) 当与事为代词时,构式变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受事的代词性:当受事为代词时,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11个节点);当受事为非代词时,则倾向于使用介词与格构式(第10个节点)。

(2) 当与事不是代词时,构式变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与事的有生性:若与事不具有有生性,则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3个节点);若与事具有有生性,构式变体取决于受事有定性,具体而言,受事具有有定性时,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8个节点),受事不具有有定性,整体上都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6个节点),若与事也不具有有定性时,几乎总是使用双宾构式,而与事具有有定性时,则使用双宾构式的概率更高(第7个节点)。

从语料中选取的具体例示如下:

例6: You picked this card up and sent them this.

例7: And I said why would we ask for their money and send their taxpayers money to us, why don't we make business with them?

例 8: Last nigh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ent Congress a list of more than 200 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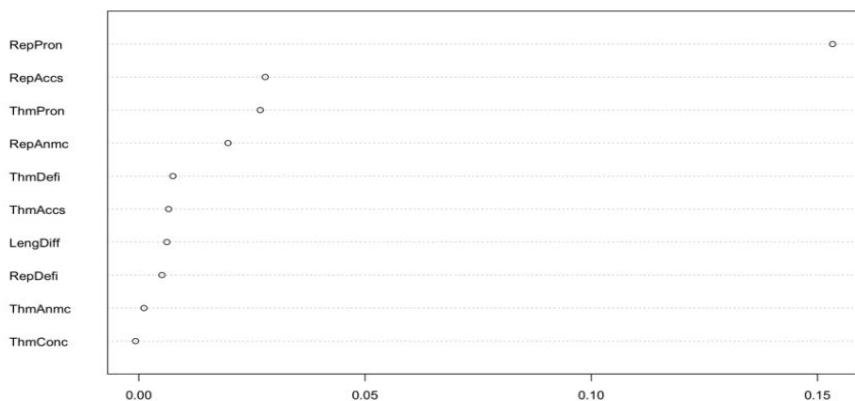
例 9: Anna doesn't send Rachel the money, instead making excuse after excuse.

例 10: Senator Bob Menendez has sent Secretary Pompeo a letter requ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State's knowledge of Giuliani's outreach.

例 11: Sending people tax dollars based on their skin color is a genuinely unpopular idea in this country.

因此, 语言使用者对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事实上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用最强的预测变量为与事代词性, 同时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例如, 与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以及与事有定性则有多重交互效应。

在 R 软件中加载 {party} 和 {lattice} 程序包, 借助 cforest() 函数对数据进行拟合, 随机构建分类树 500 次, 构建随机森林模型, 通过 dotchart() 函数将变量相对重要性可视化, 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

与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相似, 通过混淆矩阵可计算出模型的 p 值小于 $2.2e^{-16}$, 模型具有高度的显著性, 模型准确度为 89.3%, C 值为 1。根据随机森林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 对英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因素相对重要性排序如下: 与事代词性 > 与事可及性 > 受事代词性 > 与事有生性 > 受事有定性 > 受事可及性 > 长度差异 > 与事有定性 > 受事有生性, 而受事具体性相对重要性几乎为 0, 所以不包含在此排序内。观察条件推断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模型的结果, 条件推断决策树中的显著变量包含在随机森林模型中。

总的来说, 通过 Tree & Forest 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

(1) 代词性和有生性对英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最具相关性, 其中与事代词性最具显著性影响, 受事具体性为不显著变量;

(2) 预测变量之间存在多重交互作用, 例如, 代词性、有生性和有定性之间即存在交互作用;

(3) 将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考虑在内, 这些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由大到小

依次排序为：与事代词性、与事可及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受事可及性、长度差异、与事有定性、受事有生性。

该模型的结果与已有有关与格交替制约因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尾焦原则、尾重原则 (Quirk 943)，以及和谐对应效应 (Bresnan and Ford 168-213)，且代词性依然是影响效应较大的预测因素。代词往往代表已知信息，故说话者在选择特定构式时，倾向于将已知信息置于未知信息之前，而未知信息与未知信息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是说话者选择特定构式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之一 (Lambrecht 388)。同时，已知的或有定的实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拥有更高的认知凸显度，让说话者和听话者更易理解，因此，这些论元常常出现在其他论元之前。

2. send类与格交替的NDL模型分析

与 Tree & Forest 模型相同，NDL 模型也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在大型数据集上运行。与逻辑回归模型不同，NDL 模型并不是依靠优化算法来最大限度地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而是模仿人类的学习过程，甚至将区别人类学习与机器学习的记忆及学习的限制条件包括在内。NDL 模型对于所学习事件的顺序非常敏感，且允许研究者同时考虑多种预测因素 (Milin et al. 507-26)。

研究使用 R 软件中的 NDL 软件包建立 NDL 模型 (Baayen, *Corpus* 295-328)。NDL 模型可产生一个权重矩阵，量化不同预测变量与反应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NDL 变量权重值

	NP NP	NP PP
LengDiff=equal	-0.0468	0.1158
LengDiff=less	-0.0388	0.1077
LengDiff=more	0.1507	-0.0817
RepAccs=no	0.0013	0.1022
RepAccs=yes	0.0638	0.0396
RepAnmc=no	-0.0339	0.1374
RepAnmc=yes	0.0990	0.0045
RepDefi=no	-0.0101	0.1136
RepDefi=yes	0.0752	0.0283
RepPron=no	-0.2209	0.3243
RepPron=yes	0.2859	-0.1825
ThmAccs=no	0.0519	0.0515
ThmAccs=yes	0.0132	0.0903
ThmAnmc=no	0.0156	0.0878
ThmAnmc=yes	0.0494	0.0540
ThmConc=no	0.0213	0.0821
ThmConc=yes	0.0437	0.0597
ThmDefi=no	0.0821	0.0213
ThmDefi=yes	-0.0170	0.1205
ThmPron=no	0.0975	0.0059
ThmPron=yes	-0.0325	0.1359

本研究建立的NDL模型的C值为0.94, 大于0.8。根据贝恩的研究, 当C值大于0.8时, 表示该模型对数据有较好的拟合能力 (*Analyzing* 204)。故本研究建立的NDL模型有较好的拟合能力, 同时准确度计算值为88.5%, 即该模型可根据不同的预测变量特征, 对语料库数据集中88.5%的与格交替构式变体进行分类, 且这些数据在10次交叉验证下均保持不变。

基于已建立的NDL模型, 可举例分析预测因素不同状态对构式变体选择的影响。例如, 若要考虑预测因素组合:

LengDiff=more/RepAccs=yes/RepAnmc=yes/RepDefi=no/RepPron=no/ThmAccs=yes/
ThmAnmc=no/ThmConc=yes/ThmDefi=yes/ThmPron=no

以上预测因素的NDL权重值表格如表4:

表4 预测因素组权重值

	LengDiff =more	RepAccs =yes	RepAnmc =yes	RepDefi =no	RepPron =no	ThmAccs =yes	ThmAnmc =no	ThmConc =yes	ThmDefi =yes	ThmPron =no
NPNP	0.15	0.06	0.10	-0.01	-0.22	0.01	0.02	0.04	-0.02	0.10
NPPP	-0.08	0.04	0.00	0.11	0.32	0.09	0.09	0.06	0.12	0.01

将表4中的相关条目数值相加即可得到对应反应变量的支撑数据。对于该预测因素组, 反应变量NP NP (双宾构式) 的支撑数据值为: $0.15+0.06+0.10+(-0.01)+(-0.22)+0.01+0.02+0.04+(-0.02)+0.10=0.23$ 。反应变量NP PP (介词与格构式) 的支撑数据值为: $(-0.08)+0.04+0.00+0.11+0.32+0.09+0.09+0.06+0.12+0.01=0.7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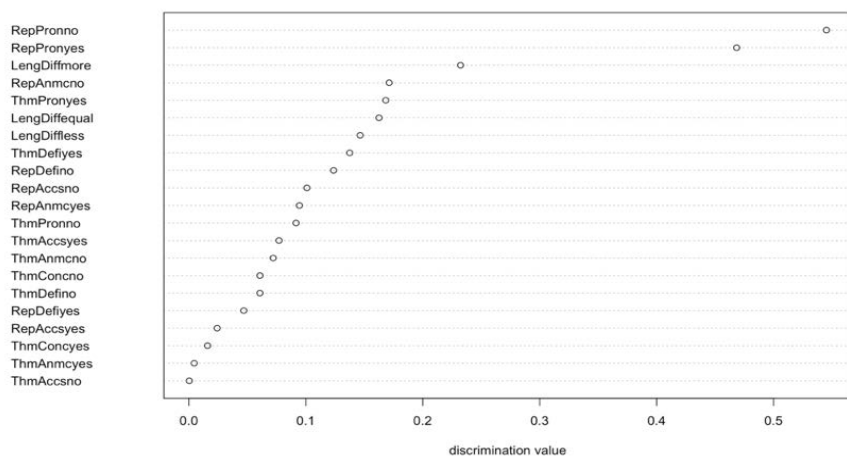
所以, 双宾构式的支撑比例为: $0.23/(0.23+0.76)=0.23$ 。其他预测因素组合和对应的支撑数据值的计算过程均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从认知加工的角度来看, 给定一组预测变量, 激活会在预测变量和反应变量 (NP NP/NP PP) 的连接上传播。而一个给定的反应变量可被激活的程度是由预测变量对应不同反应变量的权重之和得出。支撑数据值最高的与格构式变体则最有可能被使用。如以上分析示例中, NP NP的支撑数据值为0.23, NP PP为0.76, 则在该预测因素组合条件下, 介词与格构式更有可能被使用。其他预测因素组合对应何种反应变量也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计算。

同时, 若要评估一个预测因素在NDL模型中的重要性, 即影响效果大小, 应取相关权重差值的绝对值之和。例如受事可及性 (ThmAccs): $|0.0519-0.0515|+|0.0132-0.0903|=0.0775$ 。其他变量对应数值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重要性数值

	RepAccs	ThmAccs	RepDefi	ThmDefi	RepPron	ThmPron	RepAnmc	ThmAnmc	ThmConc	LengDiff
绝对值和	0.1251	0.0775	0.1706	0.1982	1.0136	0.2600	0.2658	0.0768	0.0767	0.5414

根据表 5, 对差值绝对值之和大小进行排序, 即可得到这些预测变量的影响效果大小次序: 与事代词性 > 长度差异 > 与事有生性 > 受事代词性 > 受事有定性 > 与事有定性 > 与事可及性 > 受事可及性 > 受事有生性 > 受事具体性。此外, 权重值之间的差异还可通过 R 软件中的 `dotchart()` 函数绘制克利夫兰点图 (Cleveland dotplot), 其中 y 轴为类别型变量 (本研究中的预测变量), x 轴为需要展示的数据值 (权重值表中第三列和第二列的判别值)。此处即可通过克利夫兰点图, 对基于 NDL 模型的英语与格构式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可视化观测 (如图 4 所示)。



▲图 4 克利夫兰点图

同时, NDL 模型通过计算出各个预测因素的权重值对语料库数据做出预测, 然而并不提供任何类型的 p 值, 故 NDL 模型并不能指出哪些因素具有显著性影响, 这也是该模型亟待改进的方面之一。将 NDL 模型结果与 Tree & Forest 模型结果进行对比, 可看出两种模型的结果存在相同之处, Tree & Forest 模型中的显著变量均包含在 NDL 模型中, 且预测变量的整体相对重要性几乎一致, 如代词性均为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 受事具体性影响效应最小。这也说明, 人类学习和统计学习可以产生几乎一致的结果。而长度差异、与事可及性与 Tree & Forest 模型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 虽然 Tree & Forest 模型和 NDL 模型均为机器学习模型, 但它们的工作原理不同。Tree & Forest 使用了递归划分算法, 而 NDL 以人类及动物学习原则为基础, 并且尽可能提高了认知合理性, 但更为抽象, 权重值可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两者遵循的公式不同且编码标注的方式也不同。NDL 模型遵循的公式为 Rescorla-Wagner 公式 (Baayen et al., *An Amorphous* 438-81), 但该公式对判别性学习的描述仍然是不完整的, 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待认知上更易处理的结果产生的微小偏差 (如先于未知信息的已知信息)。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内, 这些微小的偏差在有利情况下会导致局部最优的功能分布模式, 而在这种情况下,

诸如有生性、可定性和话语可及性等预测变量可能并不会像逻辑回归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影响与格变体的使用 (Baayen et al., *Making* 253-91)。

其次,NDL模型是一种基于样本的学习模型,而基于样本的统计模型假设,经验过程中的样例是储存在记忆中的。但本研究的语料库数据有限,频率是NDL模型要参考的重要参数之一,可能导致模型结果有不一致之处。且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口语语体,而send类与格交替在口语语体中使用的语境有限,涉及的受事、与事特征有限。

研究结果也再次证明构式变体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使用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及概率性 (Tagliamonte 313)。同时,构式变体模型理论也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受事和与事在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特征为与格构式变体的选择提供了微语境条,故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式的确可被视为与格构式在具体语境条件下的特定句法实现形式。此外,研究主要的关注对象为使用send的与格交替,研究结果显示其使用特征与give类存在不同,故与格动词语义会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构式变体选择行为,动词敏感性方法具有合理性。

研究基于COCA中提取的真实语料,通过建立语料库概率模型,分析口语语体中不同影响因素对send类与格交替构式变体使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受多个因素的共同制约,显著性因素包括与事代词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以及与事有定性,其中与事代词性与格交替的使用影响最大,受事具体性的影响最小;代词性、有生性和有定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研究涉及的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为:与事代词性>长度差异>与事有生性>受事代词性>受事有定性>与事有定性>与事可及性>受事可及性>受事有生性>受事具体性。研究证明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的使用并不随机,具有系统性和概率性,与格动词的语义差异会影响构式变体选择,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构式变体模型理论。

本文建立的语料库概率模型之一朴素判别学习模型更具心理现实性和认知合理性,NDL模型的使用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尝试,即用一个计算模型来解释语法是如何从使用中产生的。后续研究可以结合不同语料库概率模型,综合研究不同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作用。同时,本研究的语料主要通过人工标注,有待优化。此外,研究建立的不同模型的结果存在差异,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可结合来自其他学科的汇流证据对模型的心理现实性进行交叉验证。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ayen, R. H. *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Using R*. Cambridge UP, 2008.
- . “Corpus Linguistics and Naiv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Revista Brasileira de Linguística Aplicada*, vol. 11, 2011, pp. 295-328.

- , et al. “An Amorphous Model for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in Visual Comprehension Based on Naiv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8, 2011, pp. 438-81.
- , et al. “Making Choices in Russian: Pros and Cons of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ival Forms.” *Russian Linguistics*, vol. 37, 2013, pp. 253-91.
- Bresnan, John, and Marilyn Ford. “Predicting Syntax: Processing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Varieties of English.” *Language*, vol. 86, 2010, pp. 168-213.
- Cappelle, B. “Particle Placement and the Case for ‘Allostructions.’” *Constructions Special Volume*, vol. 1, 2006, pp. 1-28.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 of Chicago P, 1995.
- . “Surface Generalizations: An Alternative to Altern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13, 2002, pp. 327-56.
- Gries, S. T. “Towards a Corpus-based Identification of Prototypical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1, 2003, pp. 1-27.
- Lambrecht, K.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UP, 1994.
- Milin, P., et al. “Towards Cognitively Plausible Data Science in Language Research.”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7, no. 4, 2016, pp. 507-26.
- Perek, F. “Alternation-based Generalizations are Stored in the Mental Grammar: Evidence from a Sorting Task Experime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3, 2012, pp. 601-35.
- . *Argument Structure in Usage-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 Experimental and Corpus-based Perspectives*. John Benjamins, 2015.
- Quirk, R. et al.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UP, 1972.
- Rappaport, Malka, and Beth Levin. “The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The Case for Verb Sensitiv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1, 2008, pp. 129-67.
- Stefanowitsch, Anatol, and Stefan T. Gries. “Extending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Alter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vol. 9, 2004, pp. 97-129.
- Tagliamonte, S. “A Comparativ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Dative Alternation.” *Linguistic Variation: Confronting Fact and Theory*, edited by R. Cacoullos, et al., Routledge, 2015, pp. 297-318.
- Zhang, Dong.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and Its Psychological Real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52, no. 1, 2020, pp. 40-52, 158. [张懂:《英语与格构式变体的多变量分析及其心理现实性研究》, 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52卷第1期, 第40-52, 158页。]

◇责任编辑: 易佳

中国英语专业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 *that* 从句的引述特征研究

◎ 刘应亮 杜凤双 裴宇雨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英语学习者硕士论文和国际期刊论文摘要语料库, 考察学习者评价性 *that* 从句的引述特征。研究发现, 学习者和专家作者都倾向使用抽象主体, 以及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 以降低作者凸显度, 增强摘要的可信性。与专家作者相比, 学习者较少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搭配以及消极意义转述动词。此外, 学习者较多使用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以及积极意义转述动词。学习者有时还存在误用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现象, 表明学习者作为学术写作新手, 欠缺在学术语篇中合理使用转述动词的意识和能力。本研究有助于拓宽评价性 *that* 从句的研究范畴, 对学术写作教学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 摘要 评价性 *that* 从句 自我引述句 他人引述句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12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习者议论文论证能力发展特征研究”(19BY229)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2

Title: A Study of Reporting Features of Evaluative-*that* Clauses in MA Thesis Abstract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porting features of evaluative-*that* clauses by comparing the abstracts of MA these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 It was found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experts tended to use abstract subject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subjects and research verbs in order to reduce author's voice and increas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discourse. Compared with experts, Chinese EFL learners rarely used the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subjects and discourse verbs along with negative reporting verbs. In addition, Chinese EFL learners overused the combination of concealed subjects and research verbs, as well as positive reporting verbs in the master's theses. Learners sometimes misused reporting verbs with different evaluations, which reveals that learners as novices lack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use reporting verbs appropriately in academic writing. This study broadens the research scope of evaluative-*that* clauses and concludes with pedagogical guidance for academic writing.

Keywords: abstract, evaluative *that*-clauses, self-sourced reporting clauses, other-sourced reporting clauses

Authors: Yingliang Liu, Professor,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Fengshuang Du,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Yuyu Pei,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摘要 是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 是论文收录和检索的重要依据, 也是作者向读者迅速介绍研究目的、方法、结论等论文主要内容的重要方式。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可以判断是否有阅读全文的必要性, 所以摘要是作者向读者推销科研成果的载体, 也是评价性资源较为密集的语篇, 具有劝说机制 (鞠玉梅 926-27)。现有摘要研究多关注语步的分布和结构 (Lorés 280-81; Li 1-11; 赵永青等 18-23), 很少关注作者如何运用语言资源在摘要中实现向读者推销科研成果的人际功能。近年来, 学术写作研究表明, 学术写作中作者不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客观性陈述, 而且对研究结果也进行了主观性评价, 并积极地与读者进行互动。作为学术写作中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评价性 *that* 从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Hyland and Jiang 1-23; Kim and Crosthwaite 1-14; Man and Chau 22-33; 娄宝翠、邱梦瑶 67-68)。鉴于此,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 对比分析动词引导的评价性 *that* 从句在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中的使用特征。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评价性 *that* 从句指由形容词、名词和动词引导的从属关系句 (如 *It is surprising /It is our belief /We believe that this structure is difficult.*), 主句和从句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观点, 凸显其态度立场 (Hyland and Tse 124-25)。这种强有力的句式结构既可以实现论文作者与读者的互动, 又可以帮助建构作者身份。研究发现, 近 50 年期刊论文中评价性 *that* 从句数量呈上升趋势 (Hyland and Jiang 16)。形容词引导的评价性 *that* 从句被称为外位结构, 通常以 *it* 为形式主语, 把真正重要的、复杂的信息放到从句中 (Hyland and Tse 125)。引导评价性 *that* 从句的名词也称外壳名词, 学术论文摘要中的外壳名词能够客观地表达作者立场, 在较短的语篇内实现摘要的人际功能, 常见的外壳名词有 *idea, effect, influence* 等 (刘芹、王心怡 55)。动词引导的评价性 *that* 从句被称为引述句, 根据不同引述来源分为自我引述句和他人引述句 (Charles 496-97)。

国外关于评价性 *that* 从句的研究多以海兰 (Ken Hyland) 和蔡 (Polly Tse) 建立的评价性 *that* 从句框架为基础 (130), 主要涉及不同学科对比 (Hyland, "Authority" 1091-12; Charles 492-518; Hyland and Jiang 1-23; Kim and Crosthwaite 1-14) 和学习者使用特点研究 (Hyland and Tse 123-39; Parkinson 428-42; Man and Chau 22-33)。跨学科研究结果显示, 相对于自然学科作者, 人文学科作者倾向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 更多使用评价性 *that* 从句 (Kim and Crosthwaite 9-10)。从评价来源来看, 人文学科作者常用生命主体 (如 *I, we, one*) 作为评价来源, 而自然学科作者则多使用非人主语 (如 *the results, the analysis, figure 1*) 或 *it* 外位结构 (如 *it was noted that...,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来增强评价来源的客观性 (Charles 503-504)。

国内对学术写作中评价性 *that* 从句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不同类型主语特征的分析 and 转述动词的研究。针对引述句主语的研究主要对比分析了中国硕士和国际学者对不同主语类型（包括抽象主体、隐藏主体、生命主体）的使用特征（武姜生 27-32；孙莉 15-21；鞠玉梅 926-36），还有一些研究仅分析了第一人称这类生命主体的特点（吴格奇，《学术论文》6-11；王月丽、徐宏亮 58-64）。转述动词的研究主要涉及不同学科对比（Hyland, “Authority” 1091-12）、相同学科的中外学者对比（刘永厚、司显柱 69-77），以及英语专业硕士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娄宝翠，《硕士论文》64-68；娄宝翠、邱梦瑶 67-73；刘应亮、魏依 66-76；唐玮、林正军 122-30），鲜有研究涉及主语和转述动词的搭配特征。

综上所述，尽管评价性 *that* 从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章的正文部分（Parkinson 428；Kim and Crosthwaite 4；Man and Chau 24；张军民 247；王月丽、徐宏亮 59；张立茵、陈新仁 124），很少涉及学术论文摘要中的评价性 *that* 从句，且目前学术论文中关于主语和谓语动词搭配使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以国际期刊论文摘要为参照语料，重点分析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 *that* 从句的使用特征。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中自我引述句的主体及主谓搭配有何特征？（2）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中他人引述句在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有何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自建两个语料库，即中国英语专业应用语言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摘要语料库（目标语料库）和国际期刊论文摘要语料库（参照语料库）。目标语料来自中国知网硕博学位论文子语料库，发表时间在 2010—2019 年，从中选取 100 篇硕士论文摘要，共计 52288 词。所选论文来自华中、华南、西南、东北等 20 多所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参考语料来源于《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等 10 个国际语言学核心期刊。由于期刊论文摘要篇幅普遍比硕士论文摘要篇幅短，为了保持两个语料库大小相当，我们选取了 300 篇 2010—2019 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摘要，共计 51354 词。经核实，所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均为单个作者独立撰写。

（二）语料库的建立与分析

为方便统计，我们先将选取的 400 份语料转换为纯文本格式并分别编号，再用 AntConc 软件检索出两个语料库中包含 *that* 的句子，人工剔除不属于评价性 *that* 从句的例子，如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等。由于学术写作规范中通常保留 *that*（Biber et al. 682），所以省略 *that* 的情况对本研究影响不大。然后，我们依据汤姆森（G. Thompson）和叶（Yiyun Ye）（369-70）、

海兰和蔡 (130), 以及查尔斯 (Maggie Charles) (497) 的分类框架统计出语料中的引述句, 其示例见表 1。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初步统计的结果由三名作者复核, 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确定最终分类结果。最后, 考虑到两个语料库的大小不同, 我们基于原始数据, 以每万词为单位进行词频标准化, 对比分析目标语料和参照语料中动词引导的评价性 *that* 从句, 进一步探究学习者评价性 *that* 从句的使用特征。

表 1 动词引导的评价性 *that* 从句分类

评价性 <i>that</i> 从句	动词分类	示例
自我引述句	语篇型, 如 tell, ask, argue, state	We <i>argue</i> that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especially the Skopos theory, can be an applicable guideline for translating activity as long as the Skopos is defined as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研究型, 如 find, show, demonstrate, observ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i>show</i> that writing proficiency of the two classes are identical at first.
	认知型, 如 believe, think, assume, consider	Thus quite a few students will <i>consider</i> that the teaching style of the teacher is boring.
他人引述句	积极意义, 如 agree, point out, accept, emphasize	Some experts <i>point out</i> that students commonly suffer from critical thinking deficiency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tensify it.
	消极意义, 如 suggest, indicate, attack, oppose	Therefore, the practice <i>indicates</i>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heuristic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s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
	中性意义, 如 show, reflect, examine, evaluate	In the interviews, interviewees also <i>showed</i>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cological listening teaching.

(注: 所有示例来自本研究硕士论文摘要语料)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查尔斯对引述句的划分 (497), 我们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自我引述句和他人引述句的使用情况, 总体分布特征见表 2。

表 2 自我引述句和他人引述句的使用频率分布 (每 10000 词)

引述句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 (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 (百分比)
自我引述句	167	31.97 (83.93%)	264	51.41 (91.98%)
他人引述句	32	6.12 (16.07%)	23	4.48 (8.02%)
总数	199	38.09 (100.00%)	287	55.89 (100.00%)

表 2 显示, 学习者和专家作者论文语料库中, 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他人引述句。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次上, 学习者的使用频率显著低于专家作者 ($\chi^2=23.72, p < .001$)。他

人引述句在两个语料库中出现频次都较低，且无显著差异 ($\chi^2=1.32, p>.05$)。

硕士论文摘要中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次低于期刊论文摘要，究其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在硕士论文写作中过于依赖其他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专家作者更偏好突出个人在研究过程中的贡献（娄宝翠、邱梦瑶 72；徐昉、龚晶 20）。他人引述句的使用频率在两个语料中都很低，这是由摘要体裁特征决定的。学术论文摘要主要用来凸显作者的研究，以便吸引读者、说服读者。大量使用他人引述句则会削弱摘要的可信度，降低摘要所描述研究的创新性。

为进一步研究两种引述句的使用特征，我们比较了所选语料中自我引述句主体与谓语动词的搭配特征以及他人引述句中动词的评价意义。

（一）自我引述句

自我引述句是一种直接表达作者立场和观点的话语资源，与评价主体紧密相关（张立茵、陈新仁 122）。主语和谓语的搭配使用也具有评价意义，作者选择不同的主语和谓语，既表明作者对评价事物的态度，又体现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引述句的主语也是作者构建其学术身份的重要资源（鞠玉梅 926-36）。

1. 自我引述句中的主体

自我引述句中的主体分为生命主体、抽象主体和隐藏主体（Hyland and Tse 130）。生命主体主要指作者，既包括第一人称单数形式（I）和复数形式（we），也包括作者自我指称形式（如the author, the writer）。抽象主体（如the findings, the results）作为自我引述句中主体类型的一种，指无生命的名词。隐藏主体（如it）指没有明确信息来源的句子。不同主体表明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传递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为揭示所选语料中自我引述句主体类型的分布特征，我们对其进行汇总，总体使用情况见表3。

表3 自我引述句中主体类型分布（每10000词）

主体类型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生命主体	17	3.25（10.18%）	36	7.01（13.64%）
抽象主体	109	20.85（65.28%）	202	39.33（76.52%）
隐藏主体	41	7.84（24.54%）	26	5.06（9.84%）
总数	167	31.94（100.00%）	264	51.40（100.00%）

表3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均倾向于使用抽象主体。抽象主体在硕士论文摘要中的频率显著低于其在期刊论文摘要中的频率 ($\chi^2=29.60, p<.001$)。硕士论文摘要中，位于其次的是隐藏主体，生命主体最少；而期刊论文摘要中生命主体其次，隐藏主体最少。自我引述句中，学习者使用生命主体类型的频率显著低于专家作者 ($\chi^2=7.16, p<.01$)。隐藏主体在学习者语料中的频率略高于专家作者，但无显著差异 ($\chi^2=3.10, p>.05$)。

抽象主体把评价来源归因于作者的发现,隐藏了作者是评价来源这一事实。这是一种隐藏作者身份的方式,直接让研究结果与读者对话,能够有效增强论文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Hyland, *Disciplinary Identities* 10-13)。抽象主体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最高,这一结果与帕金森(Jean Parkinson)(436),金(Chanhee Kim)和克罗思韦特(Peter Crosthwaite)(8-9)的发现一致,说明学习者和专家作者一样,在学术论文摘要中运用抽象主体弱化作者角色。例1和例2中的主语都为抽象主体(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se findings)。表面上具有“非人”特征的研究结果承担了命题责任,这在语言形式上淡化了语篇研究者的作用,符合学术论文写作追求客观的要求,容易与读者达成共识(武姜生29;张立茵、陈新仁126-27)。

例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such an approach wa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students' overall summarization performance of a narrative source text and that the students benefited to a greater extent in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than in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use. (期刊论文摘要2)

例2: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social science major students respect community contribution more th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 (硕士论文摘要5)

隐藏主体的使用扩大了评价来源,读者无法检测评价内容的真假,从而与读者产生距离。与专家作者相比,学习者较多使用隐藏主体来降低作者凸显度。学习者论文摘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隐藏主体是“it is/was found that...”,如例3所示。

例3: *It is found that* the first-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most frequently, which shows that professionals do not avoid presenting themselves in articles. (硕士论文摘要10)

例3中,被动句“*It is found that...*”起到让事实说话的作用,突出强调研究内容的重要性,体现作者对此命题的保留态度,同时减轻观点提出者的命题责任。隐藏主体的使用不仅增强了句式表达的多样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作者能见度,能有效避免使用生命主体表达观点时带来的主观性(Charles 510-13)。

第一人称单数形式“I”明确说明作者是观点发起者,承担观点持有者的责任。深入分析所选语料后,我们发现学习者论文摘要中没有使用“I”的情况,而专家作者使用“I”的频率较高。这一结果表明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不愿使用作者凸显度较高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I”,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Chen 7-8;鞠玉梅933;王月丽、徐宏亮61;娄宝翠、王莉95)。第一人称“I”表明作者在学术语篇中积极呈现个人观点,学习者可能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合作和谦逊思想的影响,倾向在学术写作中构建集体身份,并隐藏个人对研究成果的贡献,以增强所述观点的权威性(吴格奇,《学术论文》9)。此外,学习者不愿使用“I”的原因还包括缺乏正确指导、对学术英语写作规范的了解不够深入、学习者的个人偏好等(Hyland, “Authority” 1107)。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比专家作者更多使用“we”的原因。内涵式“we”能缓解“I”给学习者带来的心理压力,弱化学术文本中自我

的凸显度(唐青叶 6; 王月丽、徐宏亮 61)。但由于硕士论文是由学习者独立完成,使用“we”不利于建立平等的作者—读者关系,从而影响学习者构建可靠的学术研究者身份,如例 4。

例 4: In our research, we find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high-level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adopt English language style in Chinese abstracts and we ascribe the phenomenon to the influence of L2 on L1. (硕士论文摘要 22)

例 4 中,作者把第一人称复数形式“we”当作评价来源,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体现了作者的互动意识。但是在摘要中大量使用表集体声音的“we”,容易被误解为缺乏学术担当,不利于构建独立研究者的学术身份(王月丽、徐宏亮 61-62)。

2. 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

自我引述句中的动词分为研究型转述动词、语篇型转述动词和认知型转述动词三类(Hyland and Tse 130)。研究型转述动词表示具体的研究行为,包括描述研究结果的动词(如 notice, discover)和描述研究过程的动词(如 calculate, analyze)(Hyland, “Authority” 1101-1105);语篇型转述动词(如 conclude, report)表示语言行为的表达方式;认知型转述动词(如 believe, think)用来描述作者的心理活动。谓语动词的使用差异表明作者对评价内容的不同观点,与单独一个主语或谓语相比,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能传递更多信息。例如使用“I believe that...”和“the study shows that...”时,前者使用作者凸显度较高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做主语,并和表示作者心理特征的认知型动词“believe”搭配,说明研究结果的主观性较强;而后者使用作者命题责任较低的抽象主体“the study”做主语,并和描述研究结果的研究型转述动词“show”搭配使用,这种组合方式使研究结果显得更加科学可信。为进一步探究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学术论文摘要中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特征,我们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自我引述句中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组合的分布

主体类型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研究动词	认知动词	语篇动词	研究动词	认知动词	语篇动词
生命主体	6.60%	1.80%	1.80%	3.80%	0.80%	9.00%
抽象主体	57.50%	4.70%	3.00%	53.00%	5.00%	18.60%
隐藏主体	16.80%	3.60%	4.20%	4.50%	1.50%	3.80%
总占比	80.90%	10.10%	9.00%	61.30%	7.30%	31.40%

如表 4 所示,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在硕士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中使用最多。在硕士论文摘要中,位于其次的是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这种组合,其余主体类型和动词搭配的使用比例都低于 10.00%;而期刊论文摘要中,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使用比例位于其次,其余搭配的使用比例也均低于 10.00%。学习者搭配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数量占引述句使用总量的 3.00%,明显低于专家作者 18.60%的使用比例,这一特征与刘永厚、司

显柱的研究结果一致(73),说明学习者还不能熟练使用语篇动词。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在硕士论文中的比例略高于期刊论文。

研究型转述动词通常和抽象名词搭配使用,如“the finding shows that...”。抽象主体可以弱化作者的命题责任,研究动词能凸显研究过程或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学习者和专家作者都大量使用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因为这种组合可以提高学术表达的适当性、增强语篇的可读性,为读者接受作者的观点做铺垫。例如:

例 5: *The study proves that the image schema theory based on the embodied philosoph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硕士论文摘要 22)

例 6: *The results of a post-test indicated that the hands-on group had achieved a slightly greater improvement in domain vocabulary knowledge than the hands-off group.* (期刊论文摘要 38)

例 5 中,作者通过使用作者凸显度比较低的抽象主体“the study”做主语,把读者注意力聚焦到研究内容本身。研究型转述动词“prove”表明研究结论由作者通过分析、整理数据得出,增强了所表达观点的严谨性,凸显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更易与读者达成共识(吴格奇,《合法化语码》141-42)。例 6 通过前景化研究结果的方式,把抽象主体“the results”置于句首,凸显了研究结果的重要性。研究型转述动词“indicate”强调了语篇研究的结果,明确表明了作者立场。这种搭配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强了学术论文摘要的修辞效果。

进一步分析语料后,我们发现硕士论文语料只有 5 例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摘要描述作者研究成果和发现的重要场所,所以学习者较少使用语篇型转述动词,而多用研究型转述动词以展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Hyland and Tse 136-37)。此外,由于学习者学术写作经验相对不足,对学术规范了解不够深入,所以还无法熟练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来构建所属学科身份。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中,专家作者使用最多的动词为“suggest”,这一发现与娄宝翠的研究结果一致(《硕士论文》66)。“suggest”属于模糊限制语的范畴,通常表明作者的消极立场,如例 7 和例 8 所示。

例 7: *Triangulation with interview data suggests that the epistemology and research practice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can account for these frequencies patterns, and that writers are conscious of the need to situate oneself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by adhering to disciplinary writing conventions.* (期刊论文摘要 35)

例 8: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management of multiple texts and thei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es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for student writers, specifically relating to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include, the degree of explicitness needed in referring to other tex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dialogue and writer-reader relationship.* (期刊论文摘要 42)

例 7 和例 8 中,抽象主体“triangulation”和“the findings”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者能见度,语篇动词“suggest”委婉陈述了作者的观点,给读者留下商量的余地。这种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突出强调了研究内容的重要性,扩展了命题的协商空间,更易于读者接受作

者的观点。

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把评价来源转移到研究结果而非研究人员本身，这种方式有效隐藏了作者在语篇中的角色，减轻了作者语篇评价的责任（娄宝翠、王莉 96）。学习者比专家作者更多使用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避免明确表明个人立场，反映出学习者在表达研究成果时缺乏学术自信的特点，从而构建出一种避免与读者交流的学术写作新手身份（徐昉 62）。此外，学习者较多使用“it is found that...”结构，一方面，表明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存在句型使用单一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句式结构缺乏明确信息来源，过多使用会影响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凸显出程式化思维（武姜生 31；刘永厚、司显柱 71）。如：

例 9: *It is found that* high proficiency students employ more L1 for task management, while low proficiency students employ more L1 to discuss the task content meaning. (硕士论文摘要 48)

例 10: *It is also found that* transitions, hedges code glosses and frame markers are among the top ranked meta-discourse resources in term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硕士论文摘要 53)

例 9 和例 10 中，外位结构先行词“it”结构的使用将评价内容和态度主位化，这种刻意追求客观话语模式的表达隐藏了学习者的科研主体地位，过多使用也会降低论文摘要的可信度。

（二）他人引述句

他人引述句通过转述前人研究结果介绍研究背景，呈现已有研究成果，是将作者的研究与前人的发现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他人引述句的评价意义体现在转述动词，根据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类，分别表示积极意义、中性意义和消极意义（Thompson and Ye 372）。积极意义转述动词（如 demonstrate, prove）表明转述信息的真实性，说明作者对转述信息持肯定态度；中性意义转述动词（如 conceive, anticipate）用客观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并不涉及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评价态度；消极意义转述动词（如 imply, claim）表示作者不赞同转述内容，对其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为进一步分析他人引述句中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我们对其进行了统计，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5。

表 5 他人引述句中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分布特征

评价意义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积极意义	20	3.81 (62.50%)	7	1.21 (27.40%)
中性意义	4	0.76 (12.50%)	4	0.76 (17.30%)
消极意义	8	1.53 (25.00%)	12	2.43 (55.30%)
总数	32	6.1 (100%)	23	4.4 (100%)

表 5 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在积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 ($\chi^2 = 6.64$,

$p < .01$), 两者在中性意义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 ($\chi^2 = .00, p > .05$; $\chi^2 = .87, p > .05$)。进一步分析语料后, 硕士论文摘要中积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频率比期刊论文摘要更高, 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比例较低, 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孙迎晖 57; 娄宝翠, 《硕士论文》66; 张军民 248; 吴格奇, 《合法化语码》141; 唐玮、林正军 122)。一方面, 这说明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积极意义转述动词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从而构建起所属学科的身份, 表现出学习者强烈的学术身份构建意识 (鞠玉梅 934); 另一方面, 这也反映出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缺乏学术自信, 避免直接批评文献, 构建了学术写作新手身份特征。这一结果与娄宝翠所说关于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是中性意义转述动词的发现不一致 (《中英大学生》54), 究其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不同。娄宝翠研究的是本科生毕业论文正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 (50-55), 而本研究重点分析硕士生毕业论文摘要中的转述动词。

积极意义的转述动词被用来支持作者观点, 而当作者不同意转述内容时, 会用消极意义转述动词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分析转述动词的使用语境, 我们发现学习者有时忽略了这些转述动词的评价意义, 并且存在误用转述动词的现象, 即用消极意义转述动词表达作者的积极立场, 这一结果与娄宝翠 (《硕士论文》66) 和刘应亮、魏依 (73) 的发现基本一致。例如:

例 11: Some studies *claim* that pragmatic transfer exis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le others *show* that there is no pragmatic transfer at all. Thus, an empirical study is designed.... (硕士论文摘要 28)

例 12: The practic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ggests* that students under instructions of the same teachers using the sam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perform various learning achievements. (硕士论文摘要 18)

例 11 中, 抽象主体 “some studies” 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 “claim” 的组合, 间接表示作者不认同 “二语习得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语用迁移” 的观点, 后面作者又用中性意义转述动词 “show” 传达出 “二语习得过程中不存在语用迁移” 这种观点。通过阅读例 11 上下文内容, 我们发现作者其实支持语用迁移的存在, 并且描述了语用迁移的特征, 所以作者误用了表示消极意义的 “claim” 来表示积极意义, 同样也误用了表示中性意义的 “show” 来表示消极意义。“suggest” 是学术语篇中表示消极意义的高频转述动词 (Charles 511; Hyland and Jiang 17-20; 娄宝翠, 《硕士论文》66)。期刊论文摘要中, “suggest” 常与表示转折关系的连接词共同使用, 表示作者怀疑或者不赞同所转述的信息。例 12 中, 我们知道作者支持从句中表述的观点, 但由于缺乏对转述动词内涵意义的区分, 学习者误用了表消极意义的转述动词 “suggest”, 这样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增加了阅读障碍。这些例子表明学习者意识到使用不同转述动词可以增强句子的丰富度, 但他们未能精准掌握这些转述动词的语用功能, 忽略了不同转述动词在学术语篇中的评价意义, 这说明作为学术写作新手的学习者欠缺在学术语篇中恰当选择转述动词的能力 (王月丽、徐宏亮 62)。误用转述动

词不仅会影响作者立场的表达,而且还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同时也会降低文章可信度,影响学习者构建权威可靠的学术身份。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对比的方法,分析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 *that* 从句的引述特征。结果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都倾向于在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以降低作者凸显度,增强摘要的可信性。与专家作者相比,学习者较少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搭配以及消极意义转述动词。此外,学习者较多使用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这不仅扩大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表现出学习者缺乏学术自信的特点。学习者有时还存在着误用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现象,体现出学习者作为学术写作新手,欠缺在学术语篇中合理使用转述动词的意识和能力。

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在学术英语写作中,中国英语学习者应强化对摘要语体特征的认识,减少隐藏主体的使用,敢于批评前期研究以凸显本研究的创新性。在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重视语用环境,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与论文读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合理地运用语言资源实现论文摘要的交际目的。学术写作中的引述句不仅仅是对研究结果或者他人研究的陈述,还包含自己对转述内容的态度和评价立场。学习者可以通过借助语料库工具、分析期刊论文等方式观察引述句的实例,以探究引述句如何实现身份建构、与读者协商和语篇组织。今后的研究可以考察其他学科二语学习者学术论文中评价性资源的使用情况,并通过回溯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学术写作中评价性资源的使用特征。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iber, D.,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Pearson Education, 1999.
- Charles, Maggie.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ce in Reporting Clauses: Across 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ses."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27, no. 3, 2006, pp. 492-518.
- Chen, R. "Single Author Self-Referen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vol. 45, 2020, pp. 1-14.
- Hyland, K.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34, 2002, pp. 1091-12.
- . *Disciplinary Identities: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Academic Discourse*. Oxford UP, 2012.
- Hyland, K., and K. Jiang. "'We Believe That...': Changes in an Academic Stance Mark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38, no. 2, 2017, pp. 1-23.
- Hyland, K., and Polly Tse. "Hooking the Reader: A Corpus Study of Evaluative *That* in Abstract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 24, no. 2, 2005, pp. 123-39.
- Ju, Yumei. "The Subject Features of Reporting Clau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48, no. 6, 2016, pp. 926-36. [鞠玉梅:《学术写作中引述句的主

语特征与身份构建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8卷第6期，第926-36页。]

- Kim, C., and P. Crosthwaite.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Evaluative *That*: Expression of Stance via *That*-Clauses in Business and Medicine."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vol. 41, 2019, pp. 1-14.
- Li, X. "Mediating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Article Rhetorical Moves in Academic Translation: A Pilot Corpus-Based Study of Abstracts." *Lingua*, vol. 238, 2020, pp. 1-11.
- Liu, Qin, and Xinyi Wang.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the Use of Shell Nouns in the MS / ME Theses Abstract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2, 2016, pp. 52-60. [刘芹、王心怡:《理工科硕士论文英文摘要中的外壳名词使用研究》，载《外语界》2016年第6期，第52-60页。]
- Liu, Yingliang, and Yi Wei. "A Study on the Use of Reporting Verbs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MA Theses."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no. 2, 2021, pp. 66-76. [刘应亮、魏依:《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中转述动词使用研究》，载《二语写作》2021年第2期，第66-76页。]
- Liu, Yonghou, and Xianzhu Si. "A Contrastive Study of Academic Evalu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cholars: The Case of English Reporting Verbs in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9, no. 2, 2022, pp. 69-77. [刘永厚、司显柱:《中外学者学术评价能力对比研究——以国际发表中的英语转述动词为例》，载《中国外语》2022年第19卷第2期，第69-77页。]
- Lorés, R. "On RA Abstracts: From Rhetorical Structure to Thematic Organiza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 23, iss. 3, 2004, pp. 280-302.
- Lou, Baocui. "Reporting Verbs in the Learners' MA Thesi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4, no. 5, 2011, pp. 64-68. [娄宝翠:《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34卷第5期，第64-68页。]
- . "Reporting Verbs and Stance Expression in British and Chinese Undergraduates' Essay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vol. 34, no. 2, 2013, pp. 50-55. [娄宝翠:《中英大学生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及立场表达对比分析》，载《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34卷第2期，第50-55页。]
- Lou, Baocui, and Mengyao Qiu. "A Study of the Features of Reporting Evidentials in Chinese Learners' Academic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vol. 37, no. 6, 2020, pp. 67-73. [娄宝翠、邱梦瑶:《学习者英语学术写作报道据素使用特征研究》，载《外语研究》2020年第37卷第6期，第67-73页。]
- Lou, Baocui, and Li Wang. "Self-Mention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43, no. 1, 2020, pp. 93-99, 160. [娄宝翠、王莉:《学习者学术英语写作中自我指称语与作者身份构建》，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43卷第1期，第93-99, 160页。]
- Man, D., and M. Chau. "Learning to Evaluate through *That*-Clauses: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Learner Corpu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vol. 37, 2019, pp. 22-33.
- Parkinson, J. "Adopting Academic Values: Student Use of *That*-Complement Clauses in Academic Writing." *System*, vol. 41, no. 2, 2013, pp. 428-42.
- Sun, Li. "A Study of Chinese MA Students' Construction of Pragmatic Identities in English Thesis Abstract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5, 2015, pp. 15-21. [孙莉:《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5期，第15-21页。]
- Sun, Yinghui. "An Analysis of Citations Used in Introductions of Chinese MA Thes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30, no. 1, 2009, pp. 53-57, 69. [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载《外语教学》2009年第30卷第1期，第53-57, 69页。]
- Tang, Qingye. "Reporting in Academic Text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04, pp. 3-6. [唐青叶:《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2期，第3-6页。]
- Tang, Wei, and Zhengjun Lin. "A Meta-Functional Analysis of Citations in the English MA Theses in Linguistic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o. 3, 2022, pp. 122-30. [唐玮、林正军:《语言学方向英文硕士论文

- 中引语使用的元功能探析》，载《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2-30页。]
- Thompson, G., and Yiyun Ye. "Evaluation in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2, no. 4, 1991, pp. 365-82.
- Wang, Yueli, and Hongliang Xu.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the Use of First-Person Pronouns in Academic Writing and Writ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vol. 2, no. 3, 2019, pp. 58-64, 92-93. [王月丽、徐宏亮:《中国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第一人称使用发展特征与身份构建研究》，载《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年第2卷第3期，第58-64, 92-93页。]
- Wu, Geqi. "Self-mention and Author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6, no. 3, 2013, pp. 6-11, 127. [吴格奇:《学术论文作者自称与身份构建——一项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6卷第3期，第6-11, 127页。]
- . "Specialization of Legitimation Cod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3, no. 1, 2019, pp. 136-46. [吴格奇:《合法化语码理论的专门性及其在学术论文分析中的应用》，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年第3卷第1期，第136-46页。]
- Wu, Jiangsheng. "Analyzing the Subjects of Reporting Clauses in the Academic Papers of Chinese EF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7, no. 2, 2010, pp. 27-32. [武姜生:《大学生英语学术写作中引述句的主语特征》，载《中国外语》2010年第7卷第2期，第27-32页。]
- Xu, Fang. "A Corpus Study of Identity Chunks in Chinese Students'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11, pp. 57-63. [徐昉:《中国学生英语学术写作中身份语块的语料库研究》，载《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第57-63页。]
- Xu, Fang, and Jing Go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Evidentiality in L2 Academic Writing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7, no. 4, 2014, pp. 12-22, 159. [徐昉、龚晶:《二语学术写作言据性资源使用的实证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37卷第4期，第12-22, 159页。]
- Zhang, Junmin. "A Corpus-Based Study on Reporting Verbs in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vol. 39, no. 3, 2012, pp. 246-49. [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9卷第3期，第246-49页。]
- Zhang, Liyin, and Xinren Chen. "A Study on Citation Practices by Expert Writers as Evaluator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6, 2020, pp. 121-30, 151. [张立茵、陈新仁:《专家作为评价者的引用行为研究》，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6期，第121-30, 151页。]
- Zhao, Yongqing, et al. "English Abstracts of Literary Jour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 Move-Step Sequenc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vol. 36, no. 1, 2019, pp. 18-23. [赵永青等:《国际文学类期刊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语阶序列分析》，载《外语研究》2019年第36卷第1期，第18-23页。]

◇责任编辑: 陈忠平

基于COCA语料库的动词keep的扩展意义单位研究

◎ 骆雅莹 陈婵

内容提要: 在二语习得的热潮下, 语言学习不仅停留于词法和句法本身, 而且要关注语言所处的语境及由此所产生的整体性意义。本研究借助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 以动词keep为节点词来研究扩展意义单位, 分析了该词类联接特点及搭配词的语义倾向, 以及该词结合语境所体现的语义韵信息。研究发现, 动词keep能与形容词、副词、名词和介词等词性进行不同的类联接, 由此构成的句法结构非常丰富。该词与形容词搭配时, 搭配词体现了积极的语义倾向, 该语境体现了keep褒义的语义韵; 其搭配词也存在中性、消极的语义倾向。同时, 结合语境发现, keep一词还能体现中立及贬义的语义韵。鉴于此, 建议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词汇时应当结合其拓展意义单位展开考察辨析。

关键词: 扩展意义单位 语料库 keep 语义韵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2-0135-11

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3

Title: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 of the Verb “Keep” in COCA

Abstract: In the boom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not only focuses on morphology and syntax, but also on the context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overall meaning.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COCA, this study takes the verb “keep” as the node word to analyze the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 and the features of collocation, colligation, semantic preference and semantic prosody in the context. The study finds that “keep” can be connected with adjectives, adverbs, nouns, and prepositions, thus forming a very rich syntactic structure. In addition, when the word is matched with the adjective, the collocation reflects the positive semantic tendency, and the context reflects the positive semantic prosody of “keep.” In addition, its collocation words still have a neutral and negative semantic preference. Meanwhile, it is found that the word “keep” can also reflect neutral and derogatory semantic prosody. It is suggested that English learners should conduct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extended units of meaning when expanding vocabulary.

Keywords: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 corpus, keep, semantic prosody

Authors: Yaying Lu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Cha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近年来,二语习得中的词汇研究成为语料库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外语言学家不仅研究语言词法、句法及用法,而且更多地开始关注语言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整体性意义(濮建忠,《语料库》41),并借助语料库工具,在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下,对语言展开广泛的研究。扩展意义单位直观展现了语言使用横向的共选特征(Stubbs 309),该模型为学者们对语言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基础。

在英语中,谓动词在句中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系动词高频出现于各类文本,在贯穿句子结构,说明主语的身份、性质、特征等方面有其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扩展意义单位为模型,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检索,多角度全方位分析keep这一常见动词在充当系动词、实义动词时的搭配词、类联接、语义倾向,以及语义韵,以期对二语学习者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一、扩展意义单位

(一) 扩展意义单位概述

扩展意义单位是由辛克莱(J. Sinclair)在1996年基于共选理论提出的语言描述模型。该模型由意核、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五个部分组成。

其中“意核”是意义单位的核心,意义的扩展都以意核为中心向外延伸(濮建忠,《扩展意义》1)。费斯(J. R. Firth)认为搭配词是习惯性相伴的词,这体现了该词项在词汇层面上的组合关系;对搭配词进行分析是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及熟悉词汇使用的重要途径(182)。类联接指的是意核与周边成分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体现出该词项在语法层面上特别是句法上的组合关系。语义倾向是指搭配词的语义特征,反映了意核与周边词项的习惯性搭配,是对共现词项语义特征的概括。语义韵体现的是意核自身的语义特点,用来表达交际的态度。语义倾向和语义韵反映的是意核与搭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体现了意核与共现词项的语用特征。因此,扩展意义单位的五个组成部分实现了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的共选。

(二) 扩展意义单位研究现状

学者对扩展意义单位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辛克莱的研究。他通过对naked eye, true feelings, brook和place这4个意核的说明分析展示了扩展意义单位的结构成分(75-106)。国内许多学者借助语料库软件来分析特定意核词项与意核词块的语义韵,其中卫乃兴对比了commit, effect, cause在英语本族语语料库和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的语义韵特征,发现学生英语中有大量中间语搭配实例,它们虽然符合语法规则,但是违背了搭配规约,语义韵较弱(《学生英语》50-54)。陆军和卫乃兴用可比语料库和平行语

料库相结合的方法,从双语角度论证了语义韵在词汇、语法中起的作用,并从共选角度揭示了翻译对等之间的对应关系(424-36)。韩浩(78-81)以扩展意义单位为模型对英语当中的同义词进行对比辨析,还有对语言学习中的高频动词make等进行习得对比及教学启示研究(仲亚娟 49-52)。除对特定节点词的分析外,对节点词块的分析也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如韩雪、卢卫中对deal with和cope with英语同义词组习得进行了对比研究(14-17)。

学者们对扩展意义单位的大量研究都集中于高频动词、同义词及同义词组的辨析上,其中对于高频动词的辨析集中于实义动词以及make等词类语义较虚的轻动词,该类词是用于表达事件意义的功能词类。本文拟聚焦的节点词keep与现存文献研究所聚焦的轻动词make, take, have存在一些共性,特此对这两类词作简要辨析。keep与make等词可作实义动词与使役动词使用,当表示处于某个状态时,两者可以进行互换。除这两者外,keep还可作系动词使用,直接与形容词与副词相连。因此,keep一词在语法结构上更加活跃,用法更加多样,在语料库软件的辅助之下,对此类用法丰富的动词可做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试图借助COCA语料库对系动词keep进行扩展意义单位分析。

二、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1) keep一词在COCA语料库当中,其搭配及类联接有哪些特点?(2) keep一词在不同的搭配及类联接中表现出哪些语义韵的特点及其搭配词的语义倾向?(3) keep一词的扩展意义单位分析,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有何启发?

(二) 语料来源

本文借助COCA语料库进行分析。COCA即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是美国具有代表性且使用较为广泛的大型英语语料库,语料库包含超过10亿字的文本,来自口语、小说、流行杂志、报纸、学术文本等8种文本类型,涵盖广泛,并在类别间呈均匀平衡分布,能够为本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语料。

(三) 研究步骤

本研究语料库部分的操作主要分为四步:首先,在COCA语料库界面检索keep一词,并设定跨距(span)为-4/+4考察这一范围内该词所出现的搭配词。其中跨距是指节点词左右词项构成的语境,跨距长度界定要视所研究文本语域等特点因素而定,将跨距界定为-4/+4或-5/+5是最适宜的(Jones and Sinclair 15-61);其次,具体查询keep一词所在的语境信息,

分析考察该词的类联接特点，由于索引行数量庞大，本文随机抽取了其中的 200 条索引行，人工考察后建立类联接，加以统计形成表格；再次，分析 keep 一词在搭配词语义倾向方面的特点；最后，考察随机抽取的 200 条索引行，统计语义韵信息并形成表格。

三、动词 keep 的扩展意义单位分析

在 COCA 语料库中输入 keep 作为索引词进行分析，根据索引行分别对其搭配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进行探讨分析，进一步探索 keep 的扩展意义。

(一) 语域分布

表 1 keep 在 COCA 语料库中的语域分布表

类别	频次	占比
博客	60335	15.05%
网站	52239	13.03%
电视/电影	86604	21.60%
口语	46859	11.69%
小说	48797	12.17%
杂志	52874	13.18%
新闻	39236	9.78%
学术文章	14046	3.50%
总频数	400990	100%

表 1 的统计结果显示：首先，keep 一词在八大体裁中，在电视电影当中的占比最高，占 21.60%；其次是在博客中，可见该词在口语和网络用词当中非常常见，说明这个单词的使用场合比较随意；再次，学术文章当中的使用频次在八大体裁中占比最低，说明该词在书面语体当中的使用频次较低；最后，keep 一词在新闻当中的占比较低，占 9.78%，再次佐证了该词多使用于非正式语体；为英语学习者在不同文体写作当中使用该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 搭配词分析

如费斯所说：“应该通过一个词所拥有的同伴来认识它。”(179) 即欲知其词，先知其伴。学习一个单词，不仅要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还要知道它的组合、搭配和韵律，并且要在特定的语境中学习。首先，在 COCA 语料库中，搜索 keep，设置跨距为 -4/+4，按照搭配频率列出前 15 个显著搭配词，如表 2 所示。

表2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15位搭配词

序号	搭配词	词频
1	try	17839
2	eye	16982
3	mind	15456
4	alive	8672
5	track	7211
6	safe	6140
7	secret	5990
8	quiet	3629
9	promise	3470
10	shut	3237
11	pace	2779
12	distance	2127
13	healthy	1875
14	straight	1620
15	walking	1388

按照词性对表2中keep的搭配词进行分类,可细分为动词性搭配,如try, shut等;名词性搭配,包括普通名词搭配,如eye, mind, track, secret, mouth, pace, distance等,和动名词搭配,如walking等;形容词性搭配如alive, safe, quiet, healthy;副词性搭配如straight等。

通过具体分析发现,eye, mind, mouth, pace, walking, straight等词都与人的身体部位或是行动类有关,搭配词义偏主观性。而其中alive, safe, quiet, healthy等形容词性的搭配也和人的状态有关,这与系动词所搭配的表语表达主语的身份、状态与特征这一说法相一致。另外,通过搭配分析可知与keep相搭配的词汇大多属于具体词汇,虽仍存在promise这类抽象词汇,但总体上具体词汇多于抽象词汇。

(三) 类联接分析

不论是语义韵还是语义倾向都与语法结构息息相关(卫乃兴,《语义韵研究》300-307)。因此,研究一个词不仅要从词法入手,分析该词的搭配,更从句法入手,研究该词的语法结构,对该词进行类联接分析。类联接指的是意核与周边成分所形成的语法结构,通过分析随机抽取的200条keep的检索行发现,与keep有关的类联接主要有七大类型,如表3所示:

1. KEEP+ADJ接形容词; 2. KEEP+NOUN+ADJ接名词和形容词; 3. KEEP+NOUN+ADV接名词和副词; 4. KEEP+NOUN+VERB-ing接名词和动名词; 5. KEEP+NOUN+VERB-en接名词和动词分词; 6. KEEP+NOUN+PREP接名词和介词; 7. KEEP+PREP+NOUN接介词和名词。

表3 keep在COCA语料库中的类联接分布

类联接	频数	索引行
KEEP + ADJ	15456	So, I decided to keep quiet about it, until now
		because they keep alive in the heart of the black man
KEEP+ NOUN+ ADJ	3436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keep kids safe
		The No. 1 thing is to keep people healthy and to keep them strong
KEEP+ NOUN+ ADV	2980	I'm glad you're around to help us keep things straight
		The purpose is to keep people together and connect in the spirit of Burning Man
KEEP + NOUN +VERB-ing	3378	He is experienced enough to keep things running
KEEP +NOUN +VERB-en		We don't need a specific issue to keep people engaged
KEEP+NOUN+PREP	16401	Challeng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around us
KEEP+PREP+NOUN	11798	but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many of the problems we solve today were solvable yesterday

由表3可知, keep一词的类联接有七大类型, 类联接强度在七大主要类型中分布不均衡, 其中主要以KEEP+ADJ和KEEP+NOUN+PREP/KEEP+PREP+NOUN为主, 主要和keep pace with和keep in mind这两个固定搭配有关。

首先, 在KEEP+ADJ类型的类联接中, keep一词为系动词, 与后面的形容词构成主系表结构, 该词的词义被虚化, 用于表达状态的持续, 如keep quiet用于表达安静状态的持续, keep alive用于表达活跃状态的维持。其次, 在KEEP+NOUN系列的类联接中, keep一词为及物动词, 词义为“使……保持(某种状态)”, 构成主谓宾宾补的结构。如表3索引行中keep people healthy用于表达使人们保持健康的这种状态。其中, 在KEEP+(N) +V-ing中, keep一词作为实义动词, 表示为连续不断地做某事, 如keep things running表达维持事物的持续运转。

(四) 语义倾向分析

语义倾向和语义韵是词汇意义得以扩展、延伸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 语义倾向是指节点词的搭配词所呈现的语义特征, 研究对象是搭配词, 反映了意核与周边词项的习惯性搭配。根据keep一词的七大类联接类型, 在COCA语料库中, 以keep为节点词, 搜索搭配词, 提取各词性搭配词的前5位, 如表4、表5所示:

表4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5位搭配词的语义倾向表

节点词	+PREP	语义倾向	+ADJ	语义倾向
keep	in	中性	alive	积极
	from	消极	safe	积极
	on	中性	warm	积极
	to	积极	busy	消极
	out	消极	clean	积极

表5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5位搭配词的语义倾向表

节点词	+VERB	语义倾向	+ADV	语义倾向
keep	try	积极	straight	中性
	shut	中性	tight	中性
	inform	中性	low	中性
	struggle	积极	upright	中性
	lock	中性	firmly	积极

通过分析keep一词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性搭配词可知，该词的语义倾向有积极、中性和消极三种类型，其中大部分为中性词，占45%，其次是积极词，占40%，消极词占15%。因此keep一词倾向于与中性词共现，来保持主语状态和特征。在与形容词搭配时，也倾向于与积极词共现，同时也存在一些介词如keep from（隐瞒）等表达出消极的语义倾向。

（五）语义韵分析

语义韵体现的是意核自身的语义特点，用来表达交际的态度，强调的是搭配时节点词所呈现的态度。根据所搭配词的不同语义倾向，节点词所体现的语义韵也不同，同时，在不同的类联接中语义韵也不尽相同。

1. 褒义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ADJ类联接时，节点词keep在动词性质上表现为系动词，主系表的结构决定了在此类联接下keep的语义韵主要取决于后面所搭配的形容词的语义倾向。而在该类联接下，该词主要和积极的形容词搭配，keep表现为“保证、保持、持续”等词义。

表6 KEEP+ADJ类联接在COCA语料库中的索引行(部分)

节点词	ADJ	频率	索引行
	quiet	1332	...I found my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I basically had to keep quiet ...
	warm	1167	...don't even think about building a fire to keep warm or cook your food...
KEEP	alive	369	...to move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to keep alive the hope and dream of freedom...
	good	198	...have them covered close, and they will keep good for several years...
	safe	110	...to invest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safe our employees...

例1: The task that has fallen to us as Americans is to move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to keep alive the hope and dream of freedom.

例2: Then put them in a wide-mouth jar, and pour the vinegar over; have them covered close, and they will keep good for several years.

例3: The company is allowing us to invest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safe our employees.

以上三个例子都通过KEEP+ADJ的类联接方式, keep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形容词搭配,使得keep表达了褒义的语义韵。例1中,除形容词外,还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名词alive、hope、freedom搭配,“让自由的希望和梦想永存”。例2中,keep同样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形容词good搭配,“保持好几年的良好状态”。例3中,keep与safe搭配,使得keep表达出了“保证”的正面意义,“保证我们顾客的安全”。

2. 中立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NOUN+/ADJ/ADV/VERB-ing/VERB-en,因后面与名词搭配,节点词“keep”在此处表现出实义动词的含义,而该类联接着重描述主语所对应的状态和动作,在此类联接下,节点词keep偏向描述客观现象,从而体现出中立的语义韵。

表7 KEEP+NOUN系列类联接在COCA语料库中的索引行(部分)

节点词	NOUN+(ADV/ ADJ/VERB-ing/en)	词频	索引行
	things	2318	...once your own children start to arrive and try to keep things consistent...
	people	1907	...and choose and keep people in their homes...
KEEP	reading	440	...If they don't appreciate it they don't need to keep reading...
	secrets	391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in my life that doesn't keep secrets from me...
	prices	266	...so there's increasing pressure to keep prices low...

例4: If they don't appreciate it they don't need to keep reading.

例 5: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in my life that doesn't keep secrets from me, and I owe you the same.

例 6: So, there's increasing pressure to keep prices low and to give readers more for their money.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通过KEEP+NOUN (VERB-ing), KEEP+NOUN, KEEP+NOUN+ADJ的三种类联接方式, 通过和名词搭配, 使得keep客观描述该名词的特征、状态以及物品。keep在该类型的类联接中体现出的意义为“继续、保守、维持”, 体现了中立客观的语义韵。例 4 中, 和动名词reading搭配, 表现为维持做某事的状态, 即持续阅读; 例 5 中, 和名词secrets搭配, 保守秘密; 例 6 中, 和名词prices、形容词low搭配, 构成了主谓宾宾补的结构, 意为保持低价, 以上keep都体现为客观描述, 体现了节点词keep中立的语义韵。

3. 贬义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PREP的类联接时, 其后的介词本身为虚词, 无实义, 通过与实义动词keep搭配, 从而引申出了不尽相同的搭配义, 其大多数为贬义的语义韵。如表 7 所示:

表 7 KEEP+PREP 系列类联接在 COCA 语料库中的索引行 (部分)

节点词	PREP	词频	索引行
KEEP	from	2944	...The simplest way to keep from having to use them should be...
	out	564	...that churches and other houses of worship should keep out of politics....
	away	513	...and everyone warned their kids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poison plants....
	off	104	...But the characters aren't just pretty faces who can't keep off each other....
	after	81	...We learn that he named the dog, he was forced to keep after hitting him....

例 7: The simplest way to keep from having to use them should be to not enter into a foreclosure situ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lways prioritize your house payments.

例 8: And most 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that churches and other houses of worship should keep out of politics.

例 9: Everyone warned their kids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poison plants.

以上三个例子通过KEEP+PREP的类联接方式, 通过实义动词keep与介词搭配, 从而使得keep产生新的语义韵, 且其语义韵为贬义。例 7 中keep与介词from搭配, 产生了“避免”的语义。例 8 中keep与介词out、of搭配, 意为置身事外、杜绝、隔绝。例 9 中keep与介词away搭配, 意味远离。节点词keep与以上介词搭配, 使此处的keep意为“隔绝、避免”、(因不好的事) 而保持距离之意, 从而在该语境下产生了贬义的语义韵。

本研究借助COCA语料库，以动词keep为节点词来分析扩展意义单位，分别研究了该词在语料库当中的语域分布，该词所出现的搭配词、类联接特点，搭配词的语义倾向方面的特点，以及在不同的类联接类型下，该词结合语境所体现语义韵信息。通过统计信息及分析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1. 在语域（register）分布上，keep一词多用于口头语，极少用于正式严谨的学术文章写作中；

2. 在搭配（collocation）上，keep一词大多与人的身体部位或是行动类有关，搭配词义偏主观性，且相搭配的具体词汇多于抽象词汇；

3. 在类联接上，keep一词有KEEP+ADJ接形容词；KEEP+NOUN（+ADJ/+ADV/+NOUN/+VERB-en）；KEEP（+NOUN）+PREP三大类型，七种子类型。其中keep为实义动词，在和形容词搭配时，为系动词。

4. 在语义倾向上，keep一词在和形容词搭配时，表现出倾向于积极的语义倾向，在和名词搭配时，倾向于中性语义倾向，而在和介词建立类联接时，出现消极的语义倾向。

5. 在语义韵上，keep一词在使用KEEP+ADJ类联接时，其语义韵主要取决于后面所搭配的形容词的语义倾向，表现为“保证、保持、持续”等义；在使用KEEP+NOUN+ADJ/ADV等类联接时，节点词keep着重于描述主语所对应的状态和动作，偏向描述客观现象，从而体现出中立的语义韵；而在使用KEEP+PREP的类联接时，实义动词keep通过与虚词搭配，从而引申出了不尽相同的搭配义，在相对应的语境下，大多数keep体现了贬义的语义韵。

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扩展意义单位的学习，发现语义趋向和语义韵，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语用能力。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Firth, J. R. *Selected Papers of J.R. Firth 1952-59*. Edited by F. R. Palmer, Longmans, 1968.

Han, Hao. "Analysis of English Synony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Units of Mea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Highest Degree Language."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no. 8, 2016, pp. 78-81. [韩浩：《扩展意义单位视角下英语同义词辨析——以最高程度语为例》，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第78-81页。]

Han, Xue, and Weizhong Lu.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Synonym Acquisition: A Case Study of DEAL WITH and COPE WITH."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no. 10, 2020, pp. 14-17. [韩雪、卢卫中：《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同义词组习得对比研究——以DEAL WITH和COPE WITH为例》，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0期，第14-17页。]

Jones, S., and J. Sinclair. "English Lexical Collocations: A Study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ahiers de Lexicologie*, no. 2, 1974, pp. 15-61.

Lu, Jun, and Naixing Wei. "A Corpus-based Contractive Study of the Patterning Featur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Equival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3, 2012, pp. 424-36, 480-81. [陆军、卫乃

- 兴:《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下的英汉翻译对等型式构成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第424-36,480-81页。
- Pu, Jianzhong. "Corpora and Unified Study of Language."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2, 2010, pp. 41-44, 127. [濮建忠:《语料库与语言一元化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1-44,127页。]
- .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l of Extended Units of Meani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2, 2020, pp. 1-8, 112. [濮建忠:《扩展意义单位模型再解读》,载《外语研究》2020年第2期,第1-8,112页。]
- Sinclair, J. "The Search for Units of Meaning." *Textus*, no. 4, 1996, pp. 75-106.
- Stubbs, M. *Words and Phrases: Corpus Stud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Blackwell, 2001.
- Wei, Naixing. "A Gene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emantic Prosod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 2002, pp. 300-307. [卫乃兴:《语义韵研究的一般方法》,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300-307页。]
- .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Semantic Prosodies in Learner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5, 2006, pp. 50-54, 112. [卫乃兴:《基于语料库学生英语中的语义韵对比研究》,载《外语学刊》2006年第5期,第50-54,112页。]
- Zhong, Yajua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High-Frequency Verbs in Chinese Learners'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Unit of Meaning: With 'MAKE' as an Example." *Jiangsu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o. 2, 2019, pp. 49-52. [仲亚娟:《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下的动词习得对比研究及教学启示——以高频动词MAKE为例》,载《江苏高职教育》2019年第2期,第49-52页。]

◇责任编辑:易佳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语义认知研究

◎ 李华丽

内容提要:“肥”“瘦”本指人的外貌特征,但书论话语中,这两个概念最为频繁典型。研究表明,“肥”“瘦”作为书论概念,表示笔画的粗细与劲道、字的大小及所占空间等,本身均无情感上的褒贬倾向;“肥”概念进入书论话语晚于“瘦”;两个概念基于人的认知体验,通过隐喻、转喻机制获得基本意义,再通过联想与类比,结合具体书法语境,完成其在线意义建构。

关键词: 书论话语 “肥”“瘦” 意义建构 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2-0146-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汉语书论话语隐喻分析的‘书法’认知模式研究”(21YBA150);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拓展课认知翻译能力培养研究”(HNJG-2021-0764)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湖南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4

Title: A Cognitive Study of Calligraphic Concepts “Fei” (fat) and “Shou” (thin) a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Abstract: “Fei” (fat) and “shou” (thin) are commonly used to describe a person’s appearance, but in calligraphic texts, these two concepts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frequent and typical. This study shows that, as calligraphic concepts, “fei” and “shou” generally refer to the thickness and strength of strokes, the size and the spac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neither with emotional tendency. The calligraphic concept “fei” appears later than “shou”. Based on cognitive experiences as well a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mapped by metaphor and metonymy, “fei” and “shou” obtain their respective basic meanings, which are further constructed on-line through association and analogy according to their calligraphic contexts.

Keywords: calligraphic discourse, “fei” (fat), “shou” (th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ognitive mechanism

Author: Huali Li,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China.

书论话语承载书法思想、书法理念、学书途径、书家特色、书法意境等各个方面内容,包含大量描写人物的概念,如“瘦健”“遒劲”“温婉”“精明”“丰腴”“婉媚”“风流”“俊朗”“痴肥”“端庄”“谨严”“温和”“素朴”“简约”“敦厚”等。其中以描述人体形体特征的“肥”“瘦”概念出现极为频繁。那么,“肥”“瘦”两个概念的初始意义究竟是什么?经典书论中包含“肥”“瘦”的相关概念及其主要的内涵意义是什么?“肥”“瘦”概念如何进行意义建构?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三个具体问题。

文献显示,将“肥”“瘦”用以品评书法滥觞于魏晋时期,这在之后对书法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江波对“肥”“瘦”的历史演变及二者的时代性和主观性进行了阐释(33-37)。李传君从唐前中期书法“肥”“瘦”取向的审美传承与异化入手,分析唐宋各时段书法的“肥”“瘦”风尚的联系、发展与嬗变,以及背后隐含着的社会因素和审美内涵(76-80)。“以人喻书”的书法传统源远流长,上述研究均围绕此进行探讨,为人们更好地认识书法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奠定了基础。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以频繁出现的“肥”“瘦”概念为切入点,尝试对书论话语的意义构建提供认知阐释,有助于丰富前人研究,促进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与欣赏。

一、“肥”“瘦”概念的语义溯源

《古代汉语词典》中“肥”的词义除了表示古国名和姓氏外,还有以下三项:①肌肉丰满,脂肪多。《礼记·礼运》:“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②丰厚、富足。《礼记·礼运》:“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③土地肥沃。《国语·晋语九》:“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张双禄、殷国光 363)

三个语义项中,“肥”分别用于形容人的肢体外貌丰满、土地肥沃和抽象层面的富足,均与书法没有关联。

《说文解字》对“肥”的解析如下:会意字,会人肌肉丰满之意(许慎 1039)。原义为人胖、脂肪多,如张志和《渔歌子》:“桃花流水鳜鱼肥。”该义又可延伸为土地肥沃,或者衣裳、鞋袜宽大。

可见,“肥”这个概念最初用来形容人的外貌特征,而用来形容物的特征或者更抽象的客体对象均为人的经验在概念层面的映射所致。书论话语中最值得回味的“痴肥”词条未在以上两部著作中收录。

《古代汉语词典》中“瘦”的语义条目比“肥”更多,五条词义如下:

①肌肉不丰满。《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

②草木、流水等细小、光线等微弱。《齐民要术·种麻》：“截雨脚即种者，地湿，麻生瘦；待白背者，麻生肥。”③土地瘠薄。《戴肖望挽词》：“水肥应返钓，田瘦合归犁。”④拘紧、不舒展。卫恒《四体书势》：“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⑤消损。李清照《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张双棣、殷国光 1371）

其中，第一条依然是形容外貌特征，但没有受限于人的外貌特征，而与书法相关的语义“拘紧、不舒展”被列为第四条，固定在字典条目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书论话语中反复出现的“瘦硬”词条，在此有收录，表示“笔画细削有力”，并附有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一句作为例证。而《说文解字》中“瘦”的语义是肌肉不丰满，后延伸到指细小、不茁壮，也指字体细而有力（许慎 1300）。如宋徽宗赵佶创造的书法字体“瘦金体”，其特点就是瘦直挺拔。这说明“瘦”比“肥”更早地被运用于书论话语当中。

事实上，“瘦”和“肥”在各类话语中均有使用，且其意义扩张机制均与隐喻、转喻有关。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语料库，bcc.blcu.edu.cn/）中，根据单一来源的多领域数据对“肥”与“瘦”进行对比搜索，结果显示“肥”为133856频次，“瘦”为98257频次。由于数量巨大，又缺乏相关的语义标注手段，因此我们以人工阅读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多数“肥”与“瘦”语料表达的是其基本意义，即人身体的肌肉丰满与否或者土地肥沃与否等。但也有诸多其他意义，如：

例1：借减员之机“肥”个人私利。（《人民日报》）

例2：我要给钱包瘦身！（微博）

例3：镇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费提供种子、专用肥并负责试销，收益归农户，损失由政府承担。（《人民日报》）

例4：管理食堂是个“肥差”，但管了12年食堂、每年经手近百万元经费的孙全周，家中最值钱的也不过疗养院奖励的一台冰箱。（《人民日报》）

上述例子中的“肥”与“瘦”均在新的语篇中具备了新的意义，有的进行了转类，如“肥”个人私利”和“瘦身”，其中的“肥”“瘦”不再表达身体丰满或者土地肥沃与否，而是在这些基本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与转喻机制，表达“使个人的利益变大或变小”之义。“专用肥”中的肥，也进行了转类，表达“能使土地肥沃的物质”之义，类似的还有“石灰肥”等。“肥差”在语料库中共出现了76次，由于差事可以提供的好处越多就越是肥差事，这一特征与身体越丰满人就越肥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其意义的建构也主要借助隐喻的认知机制。

鉴于书论话语中曾出现“痴肥”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在BCC语料库中利用篇章检索“痴肥”与“肥痴”字条，均有不同数量的显示，但总体数量不多。其中，现代汉语无“肥痴”字条，古代汉语中有31条。下面任意选用几条“肥痴”出现的语境如下：“古今的英雄豪杰虽不尽是尖嘴缩腮，却也定有三分奇怪面貌，出人头地一步，决不是寻常肥痴可比”（《后

西游记》集藏/小说)；“饲粮常少患肥痴，僵卧廊间甘伏雌”(《晚晴簃诗汇》诗藏/诗集)；“若论美，北人见惯肥痴，若睹南妆，袅袅娜娜，自易生怜”(《两交婚小传》集藏/小说)；“木龙体肥痴，重千余斤”(《陶庵梦忆》史藏/志存记录)。以上出现的“肥痴”，均表示人或者动物的体型庞大、肥胖，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其语义色彩以贬义居多。同样，在BCC语料库中搜索“瘦硬”字条，共出现有456项之多，主要出现在书法、绘画、文学作品中，意义主要与人物描述相关。

以上关于“肥”“瘦”基本义项和使用语境的检索表明，“瘦”的语义涵盖范围更广，其义项多于“肥”，《古代汉语词典》、《说文解字》和语料库中均有用来表示书法特征的义项或者语例；相反，“肥”在《古代汉语词典》、《说文解字》中却没有义项用于书法特征的描述，这说明“瘦”更早用于书论话语当中；另外，BCC语料中显示，包含“瘦”概念的词条“瘦硬”出现频次远远高于包含“肥”概念的词条“肥痴”或者“痴肥”。下面以《历代书法论文选》为语料来源，统计“肥”“瘦”概念的使用情况并就其书法审美内涵作分析。

二、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审美内涵

“肥”“瘦”概念在书法家的谈话录或谈艺摘录、评论家对书法作品的介绍与鉴赏、中国历代书法论文，甚至诗作中均有出现，其中以古代书论话语中的使用最为典型。在众多书论之中，黄简编辑的《历代书法论文选》作为经典书论集，收录了清代以前著名书论文章69家95篇，共40余万字，包括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清代刘熙载的《书概》等。《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作为《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补充，虽然也收录了一些古代重要书论文献，但从重要程度及影响力来说，不及后者。本文之后选用的例子均来自《历代书法论文选》。

现代汉语中，“肥”“瘦”往往用来形容人体外形。从审美的角度看，“肥”“瘦”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褒贬不一。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女子以肥为美；现代社会，瘦成了人们追赶的潮流。那么，在书法审美中，“肥”“瘦”用以描述字的外形特征，具备什么样的内涵意义？是以“肥”为美还是以“瘦”为美？这是统计与分析时需要同时关注的问题。

对《历代书法论文选》进行搜索统计，结果显示包含“肥”“瘦”的概念分别为105个和90个，其中不包括重复的概念或单独使用的“肥”“瘦”概念。在书论话语中，“肥”为“龟临洞穴，没而有余”，“瘦”为“鹤立乔松，长而不足”(黄简268)，本身并无褒贬的感情倾向。但从所收集的例子使用语境判断，“肥”“瘦”感情色彩大致可以划分如下：

表1 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及情感倾向

名称	褒义	贬义
肥	肥美、肥泽、丰肥、肥劲、肥纤	肥厚、肥钝、痴肥、肥俗、肥瘠、肥浊、秣肥、肥圆、肥弱、肥软、熊肥、肥重、长肥、肥长、肥密、肥臃、肥艳
瘦	瘦硬、硬瘦、瘦紧、瘦健、瘦劲、瘦峭	枯瘦、疏瘦、瘦浑、长瘦、瘦怯

从上述概念大部分的使用语境看，“肥”与“瘦”相对，指字的大小，其所占空间；“肥”偶尔与“细”相对，指笔画的粗细。在包含“肥”的22个概念中，“痴肥”仅出现一次，出现频率最低；“肥钝”出现三次，从使用语境来看，意义同“肥臃”；“长肥”与“肥长”同义，“肥”指笔画粗细程度，与“长”概念结合用以表达字体的形状和粗细大小；“肥劲”与“瘦劲”意义相对。“瘦”用以描述字的大小，如“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黄简46），“胡书体肥，钟书体瘦”（182）等。包含“瘦”的11个概念中，“瘦硬”出现频率最高，“瘦硬”与“硬瘦”语义相同，使用意义基本相同，侧重点略有差异。整体来看，“瘦”与“肥”意义基本相对，除表格中的概念外多为单用。

如前所证，“瘦”较之“肥”更早地被运用在书论话语中。在BCC语料库中，“瘦硬”出现的频次高于“痴肥”，在这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从书论话语的使用情况统计来看，“肥”和“瘦”两个概念本身不存在褒贬意义，比如“太肥则质浊、太瘦则形枯”（黄简566）。正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书法中也强调阴阳调和，有肥有瘦，中和适度，但“肥”“瘦”与其他词搭配后就有了褒贬色彩，尤其以笔画的“肥”“瘦”区别书写风格、品评书作时常带有或褒或贬的审美判断。如：

例5：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182）

人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同期有另一位被称为孔明的隐士胡昭，他出生于公元162年的颍川，其书作豪迈大气。同时期的钟繇被誉为“小楷之父”，其书作小巧瘦硬。从例5的话语语境看，“肥”“瘦”没有褒贬的情感倾向，二者各有其美，两位书家也各有千秋。

例6：风姿宕往每乏苍劲，笔力苍劲辄少风姿，书趋沉着，忌似苏灵芝辈肥软。（580）

苏灵芝是唐代书法家，可与同时代李邕和颜真卿媲美，其书写的《易州铁像颂》现为国家级文物，存于河北易县（图1）。从此处的语境看，例6中的“肥软”具有笔画粗大、软弱无力的审美内涵，是书家在创作时需要避开的极端情况。

例7：欧、褚诸家提空笔作书，体皆瘦硬。（581）

例8：子通亦善书，瘦怯于父。薛纯陀亦效询草，伤于肥钝，乃通之亚也。（191）

欧阳询精通书法，以“欧体”著称于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通”是欧阳通，即欧阳询的儿子，父子被后人称为“大小欧阳”。下面对比欧阳父子的代表作品如下：



▲图1 苏灵芝《易州铁像颂》



▲图2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銘》



▲图3 欧阳通《道因法师碑》

图2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中，汉字笔画如例7中所言，比较瘦硬，给人刚劲有力的视觉效果，明显区别于世人熟知的颜真卿作品的“丰腴雄浑”“结体宽博”“大刀阔斧”。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则在笔画瘦劲这一点上更甚于其父欧阳询，因而更具险峻之势。例8用“瘦怯”这一概念形容其字，明显表达了欧阳通作品瘦得过度而水平不及其父的情感倾向。同时学习欧阳询的薛纯陀，其书作与欧阳询的书作相比，则肥钝有加。

书法作品的审美主要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品质两个维度进行(Shi 485)。“肥”“瘦”主要与书法作品的形式层面有关。从上述书作看，欧阳通的“瘦怯”与苏灵芝的“肥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瘦怯”与“肥软”使用的语境看，二者是“肥”“瘦”两个审美的极端，书法创作中都应该避免。“肥”“瘦”之辩显示出人们认知书法作品时，其笔画、结构两个外在形式的视觉效果，应该居于中庸状态，尤其是笔画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这与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的。

三、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进行意义建构时需要结合书法语境，调用人与书法两个认知域的知识，与其他话语类型中的“肥”“瘦”概念一样，也主要运用隐喻、转喻两种认知机制完成。

（一）“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隐喻机制

“肥”“瘦”概念通过人与书法的相似性进行隐喻映射。概念系统是冰山，语言系统是冰山的一角。将人体的知识结构映射到抽象的书法作品这一过程说明，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是书法艺术概念化的语言表征，反映了思维的隐喻性特征。人们总是借助相对熟悉的事物来理解相对陌生的事物。从人对认知规律体验来看，人的形体结构与形象生来就伴随左右，为人所熟知。人在婴幼儿阶段往往首先认知的是自己的身体部位。对于成年人来说，认知也通常是推己及人，不仅涉及人的身体结构、外形特征，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精神品质等方面。在对社会进行认知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对自身的认识作为媒介，进而认识其他事物。由此，“肥”“瘦”概念原本用来形容人的形体外貌特征，之后进入书论话语用以描述汉字的特征，具有体验基础，让人们可以将自己熟知的人体知识结构映射到作为文化产物的书法作品中，帮助理解书法。

从外形特征来看，人与书作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书作中的汉字被概念化为站立的人，其具体映射路径如下：

表2 人与汉字的隐喻映射关系

源域：人	目标域：汉字
头	上部笔画
脚	下部笔画
臂/腿	左/右笔画
血液	笔画的用墨浓淡
躯干	主体架构
筋脉与肌肉	笔画的粗细

上述映射表明，人与书作中的汉字存在形体上自上而下的对应性与相似性，而“肥”“瘦”作为人的外形特征概念，适用于人的头、脚、手、躯干等各个部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体验，因此必须借助隐喻的方式进行认知。书论话语中，这种情况尤其普遍。书作中的汉字与人的形体结构两个事物间存在的相似性是隐喻映射的前提条件。用以描写人的“肥”“瘦”概念转为书论概念，是隐喻机制起作用。

（二）“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转喻机制

将“肥”“瘦”概念映射到书作中的汉字是以转喻机制为基础的。“肥”“瘦”概念是人的外貌特征概念，要产生作用首先需要激活人这一对象的百科知识，即通过凸显人的部分形体特征的转喻机制而起作用。

转喻作为认知方式，是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者与其他事物的特殊联系来理解和指代事物整体，由此及彼，强调事物间的临近性、连续性与关联性（Lakoff and Johnson 40）。换

言之，转喻是一种参照点现象，通常由代表转喻的词语作为参照点，为接近欲表达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转喻的普遍存在是因为我们寻找参照点的能力与生俱来。束定芳在2019年11月东北师大“认知研习班”上曾说，表达人类概念系统的语言基本上是转喻性的，如head for，“唱歌需要好嗓子”等。选择一个好的转喻词汇可以很容易地唤起一个难以命名或者表达的目标（Langacker 199）。以点代面是转喻的特点，书论话语也不例外。以点代面，需要结合宏观和具体语境，做出合乎常理的想象与推断。整体来看，转喻以小见大，以临近见本体。消极地讲，因为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表达能力，所以人们不得不使用转喻。积极地看，转喻可以使表达委婉、形象、言简意赅，达到有效的认知和交际目标。

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首先激活与之相关的人的形象，因此是“人的外貌特征”转喻“人”，是部分转喻整体。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与书法汉字的隐喻映射。而在隐喻映射的作用下，“肥”“瘦”成为专门的书论概念后，又进一步分两个阶段体现转喻性思维特征。首先“肥”“瘦”作为书法作品中众多属性特征之一，转喻某书法作品给人的整体印象，如前面提到的“胡书体肥，钟书体瘦”，胡书和钟书显然不止“肥”“瘦”两个特征，但由于是最突出的特征，因此可以分别概括两个书体的整体特征，属于部分代整体。在此基础上，“肥”“瘦”可以再转喻某种书法门类，用以唤起难以命名的部分书法属性特征。

可见，“肥”“瘦”概念首先借助隐喻认知机制由人概念转为书论概念，然后借助转喻机制，经由部分代整体转喻某个书体。反言之，“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隐喻机制又是在转喻机制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虽然隐喻与转喻是两个互相区别的认知机制，前者最明显的特征是反映不同认知域间的映射关系，后者则是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一种凸显关系，通常是反映同一个认知域中的临近关系，但在意义建构中二者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张辛未、赵秀凤认为转喻和隐喻的互动和协同过程是基于想象或虚拟的隐喻场景来完成的（36-44）。书论话语中，与“肥”“瘦”类似的“以人喻书”等属性特征，均需要读者借想象进入虚拟的隐喻场景，把场景中所涉及的转喻、隐喻及其情境中隐含的态度、评价、逻辑推理等一并映射到目标域，用以理解和评价抽象而复杂的书法现象或者书法作品。

（三）“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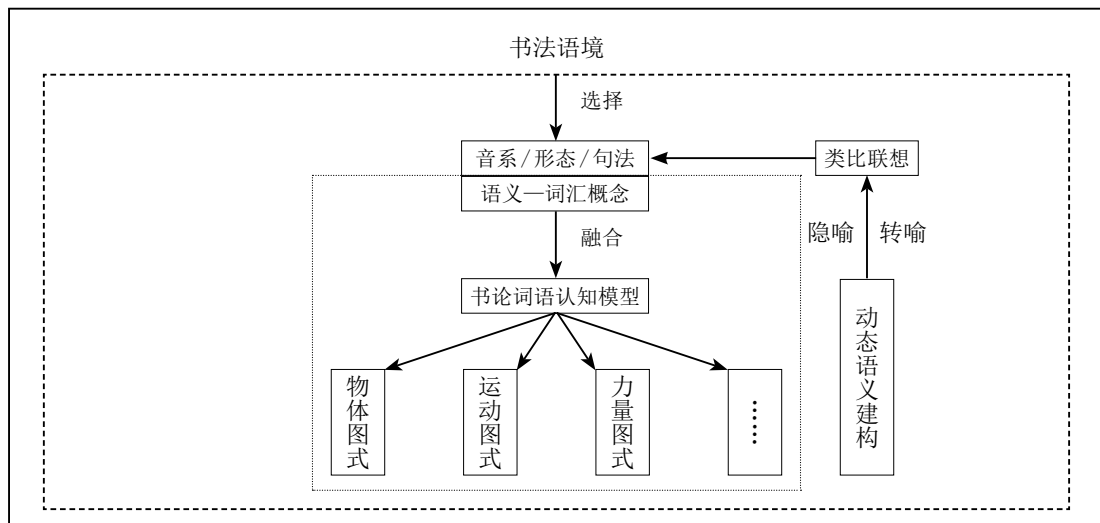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意义建构需要结合百科知识，经过隐、转喻机制，进入心理空间，结合语境进行加工。下面以“痴肥”为例分析“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过程。朱和羹的《临池心解》中有“楷法用墨欲腴，用笔欲圆转而有劲；乃墨沉痴肥，绝无锋颖，似龟鳖之缩项足”（黄简 739），用“似龟鳖之缩项足”来说明“痴肥”的意义，确实非常形象。但前面的研究已经说明，“肥”概念表示“肌肉丰满，脂肪多”之义最初出现在《礼记·礼运》中，用来形容人的外貌特征。由于人在认知体验中的图式性特征，“肥”用来形容物的特征或者更抽象的客体对象均为人的经验在概念层面的映射所致。

由于“痴肥”包含“肥”概念，因此已经通过隐喻、转喻机制获得了“人”概念的相

关意义。“痴”的基本义项有天真、疯癫、着迷、不慧等，即在人的认知域中，“痴”的意思是呆傻、不聪明，或者为发呆，佛家用语里表愚昧无知。“肥”的三个义项前面已经介绍过，“痴”与“肥”的基本意义是构建人的形象的基础，再基于人的形象产生联想，同时激发情感反应。尽管前面已经论述了人和书法作品的汉字存在对应关系，书论话语中的“痴肥”概念意义却不同于其在人这一认知域中的意义。在人的认知域中，“痴肥”表示人的外表肥胖，看起来没精神，因而给人痴呆感；书法认知域中，“痴肥”表示字的笔画很粗，不精干，因而给人感觉不灵活、缺乏活力。

可见，在书论概念“痴肥”的语义构建过程中，关于人相貌的知识结构和汉字的笔画知识结构都会被激活，并且在人脑中形成二者复杂的匹配活动。从跨域的角度看，这是将源域人的属性向目标域书法中汉字的结构属性进行映射。但在此过程中，不是所有人的属性都被映射到书法当中，而是有选择的，其选择的前提和限制条件是“楷法用墨”这一书法语境。“痴肥”出现在书法域后，“不聪明”等含义会被过滤，只留下“粗大且没有精神”的含义。然后，基于书法中书体门类的背景知识进行具体的形象构建，从而获得在线的意义，激发对应的情感反应，达到对书法域中“痴肥”的正确理解。“痴肥”所出现的具体语境说明，楷书在书写时用墨浓，用笔劲大，因而字的笔画“粗大”，相比别的书体，比如草书，缺少了一些飘逸。

总之，书论话语的意义构建是动态的，需要借助联想或者想象的机制，在体验的基础上，主要熔合认知模式中的物体图式、运动图式、力量图式和其他审美图式进行，拟构书论概念的意义建构图式如图4所示：



▲图4 书论概念动态意义建构机制

如图4所示,在书论话语的意义建构中,书法语境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肥”“瘦”在书论话语与其他领域意义建构过程中最大的不同之处。书论话语的意义建构首先需要激活人的知识框架。就“肥”“瘦”而言,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物质形式的触发机制。首先触发人这一对象的百科知识,其中物体图式起主要作用。然后在隐喻、转喻机制的作用下,人和书法两个不相关但具有类似属性特征的认知域被并置起来,通过联想和类比,完成了书论概念的意义建构,进而完成书法作品的审美与欣赏。书法是美的艺术,艺术不能用客观的量化标准进行科学衡量。因此,相比其他领域,书论话语“肥”“瘦”的语义建构过程中,联想的作用更为明显,而联想中人们对美的感知能力更是非常重要。

对“肥”“瘦”两个概念意义追根溯源,我们发现其初始意义均与人相关,但根据书论话语中二者出现的语境,其意义均与汉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有关,并且本身未含褒贬的情感倾向。作为书论概念的“肥”“瘦”,基于人的认知体验,经由思维的隐喻和转喻机制获得基本意义,然后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依靠所使用的大小语境,尤其是书法这一大语境,以及人和书法两个空间的百科知识,在心理空间中在线进行意义的建构。“痴肥”个例分析表明,意义构建过程中,心理空间中的概念映射机制需要首先激活关于人这一客观对象的相貌与形体知识结构、汉字的结构笔画和书体门类等知识结构,结合语境进行具体的形象构建,并激发出对应的情感反应,从而达到“痴肥”这一概念在书法域中的正确理解。这也表明以人论书,尤其是以人的相貌来论字的结构形态受到语言表达的局限,反映了人的认知特征与体验基础。因此,在意义建构过程中,需将人的空间与书法艺术空间联系起来。

书论话语的意义研究对于书法的理念、思想、特色等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本文的发现表明,对书法作品进行欣赏,远不止于掌握几个词汇,而是需要调用人的认知机制,激活大脑储存的百科知识,结合具体的语境,从而达到审美的目的。因此,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的调查分析与意义建构探讨是有助于书法审美的一种尝试,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Huang, Jian. *Classic Calligraphic Texts in History*.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1979. [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Jiang, Bo. "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Past and Present Fei and Shou' in Ancient Calligraphic Criticism." *Ar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no. 5, 2001, pp. 33-37. [江波:《古代书法批评之“肥瘦古今”现象研究》,载《书画艺术》2001年第5期,第33-37页。]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U of Chicago P, 1980.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Li, Chuanjun.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Fei' and 'Shou' of Calligraph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terary Review*, no. 10, 2015, pp. 76-80. [李传君:《唐宋时期书法“肥瘦”取向的审美内涵及其演变》,载《文艺评论》2015年第10期,第76-80页。]

Shi, Xiongbo. "As if one Witnessed the Creation: Rethinking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no. 2, 2020, pp. 485-505.

Xu, Shen. *Exploring and Paraphrasing Chinese Words*. Collated by Songyuan Ma,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2014. [许慎:《说文解字》,马松源整理。北京:线装书局,2014。]

Zhang, Shuanglu, and Guoguang Y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2nd edi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张双禄、殷国光:《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Zhang, Xinwei, and Xiufeng Zhao. "A Study of Multimodal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Cartoon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2016, pp. 36-44. [张辛未、赵秀凤:《反腐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转喻和隐喻研究》,载《外语界》2016年第4期,第36-44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微信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